

炎黄春秋

第 9 期
2005年

**阎明复：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
——将军的中共党员身份考略**

抗战中的中国海军

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论司马迁冤狱

目 录

春秋笔

- 1 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杜 光
9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秦维宪

亲历记

- 15 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
——将军的中共党员身份考略.....阎明复
20 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龚子荣

往事录

- 24 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荆其柱
30 抗战中的中国海军.....任保军 慕 安
36 三五九旅南征记.....王人广

沉思录

- 42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袁伟时
45 城乡身份推算.....吴 思

一家言

- 47 “中国式”思维杂拾.....李 普

品书斋

- 50 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
——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王也扬

怀人篇

- 52 芮杏文问计于民.....钟朋荣
54 我的父亲程子华.....程海燕
59 著名音乐教育家江定仙.....陈宜平
63 蓝翎的坎坷人生.....李 音

古镇台

- 68 论司马迁冤狱.....戚 文
73 严复仕途乖蹇之谜.....李 钧

编读窗

- 79 读者来信摘登.....本刊编辑部

顾 问：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镏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 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 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4.80元

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 杜 光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它在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痛。探究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总结它的沉痛教训,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迄今未能进行。本文记述当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如何由整风转入反右及反右不断扩大的进程,意在提供一些素材,希望它能对总结反右的历史教训有所裨益。

中央高级党校在转入反右运动后,参加运动的学工人员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通班(学员为司局级干部,共898人)和新闻班(学员为各省市相当于厅局级的新闻单位负责人,共94人),这是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主体,由校党委直接领导;第二部分是师资训练班(学员为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理论教师,及党委理论工作部门干部,共538人),由师训部的分党委具体负责;第三部分是高级党校自身的教职员,由校党委责成机关党委负责领导。本文介绍的,主要是普通班、新闻班的整风反右情况(当时高级党校学员还有三个班次:学员为省部军级领导干部的研究班,共50人;学员为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新疆班,共44人;学员为各地理论教师的短期训练班,共462人。反右开始后,研究班有十来位学员参加校党委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工作,其余学员和新疆班学员只是参加学习讨论和全校大会,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短训班则在7月按计划毕业离校,未参加反右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

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此之前,高级党校已在全校传达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自3月16日至4月底,全校学工人员利用党日(每周半天)和晚上,学习这两个讲话。4月26日,校党委决定自5月3日开始,各班学员停课2-3周,集中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但是,贯彻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势必打乱原定的教学计划。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侯维煜(兼党委第二书记)经过反复研究,拟订了一个“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并在5月7日晚上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因为自1948年至1953年初,刘少奇一直是高级党校前身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杨献珍、侯维煜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向刘少奇请示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就意味着中央批准,这已经成了惯例。这次杨、侯向刘少奇汇报“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后,刘少奇赞成把整风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特别嘱咐杨、侯注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的问题。他说:怎样避免苏联那样只有计划性而没有灵活性多样性,使人民生活丰富多彩呢?“一个办法是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场,”“不只商业有自由市场,而且还要有地下工厂”,“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农业上还要有家庭副业、自留地”。“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醒大家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根据刘少奇的讲话,杨献珍、侯维煜修订了整风计划,停止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的教学计划,改为围绕整风的主题,学习社会主义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经济理论和政策,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具体划分四个步骤:从5月3日到7月13日,用三周时间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用四周时间从理论上政策上研究当前人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矛盾;接着四周以党群关系为中心,研究当前人民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结合检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最后一周写学习心得整风笔记。

为了配合整风学习,高级党校邀请了七位领导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向学员作了八个专题报告,报告人和时间、题目依次是:

5月21日,薛暮桥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几个问题》;

5月23日、24日,骆耕漠讲《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和《经济核算》;

5月25日、27日,6月14日,邓子恢讲《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5月31日,刘子久讲《工资问题》;

6月4日,姚依林讲《商业问题》;

6月7日,宋劭文讲《积累与消费的问题》;

6月13日,许涤新讲《关于资产阶级问题》。

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大鸣大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5月15日,毛泽

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点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漫天大火。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杨献珍、侯维煜继续执行原定计划的决心,他们仍在一心一意地贯彻业经刘少奇批准的“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

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关注,大家议论纷纷,在小组会上、宿舍里、饭桌上、礼堂里,到处都在谈论。除了密切注意报上关于鸣放的消息外,很多学员还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参观大字报和自由论坛。面对如火如荼的鸣放和纷至沓来的批评,有的学员担心“反革命分子会利用反官僚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利用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有的学员感到委屈,“现在是四面围攻,好像两块钢板夹块肉”,有的甚至把形势比喻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学员认为“这些意见完全违背了和风细雨、从团结出发的精神”,“这样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这些反应,表现了这些身处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对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抵触与担心。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对大鸣大放表示赞赏,认为“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学员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还有些学员对鸣放中的某些观点抱有同感,如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合作化违背了自愿原则,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村紧张,等等。校党委及时

地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整风简报》，陆续上报中央。

6月上旬，有的省市负责人向中央和高级党校建议让学员提前毕业回原工作岗位去，因为下面既要坚持工作，又要领导反右派，十分紧张，亟需这些领导干部回去参加本单位反右派的领导工作。高级党校通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示刘少奇后，于6月15日决定普通班、新闻班、研究班、新疆班提前毕业，师资部、短训班则仍按原计划到7月下旬毕业。这个决定公布后，这几个班的学员纷纷会客访友、购置行囊、摄影留念，准备离校。党校行政处也立即着手为学员购买车票机票，组织车辆，准备送站。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变故，打断了提前毕业的部署，并且很快便把党校的整风转上反右的轨道。

事情是这样的：高级党校为了帮助学员了解当前整风反右的形势，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来校作报告。为了使他们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党校把每期《整风简报》送给他们，供他们准备报告时参考。彭真、杨尚昆已先后于5月28日、6月17日来作过报告，按照计划，在学员离校前还要请陆定一、康生来校作报告。6月17日晚上，陆定一带了发给他的《整风简报》去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此前大概没有看过《整风简报》（报送的每期简报有他一份），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大为吃惊，他认为高级党校学员的这些思想动态反映的不是小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它反映了党内存在的严重右倾思想。对这些错误思想，不能采取做大报告的办法来解决，一定要发动群众，开展批评，明辨是非，不能让他们带着这些错误观点回去。毛泽东当时有没有在高级党校学员中抓右派分子的思想，现在已经无法查考了，但是，他的谈话成了高级党校学员由整风转向反右的转折点，却是可以断定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书记处于6月19日专门开会讨论，决定全校学员都留校继续整风，所有课程都停下来，原定的大报告一律取消，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开展大讨论，不解决问题不能回去。

杨献珍、侯维煜在列席书记处会议后，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

传达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研究贯彻的具体措施。杨献珍在会上说：“党外的右倾思想都放出来了，党内还没有，只有高级党校暴露出很多右倾思想。”“社会上右派的思想，我们这里都有。”

中央关于学员留校继续整风的决定传达后，引起了学员的普遍不安。赞成留下的只是少数，多数情绪比较勉强，无可奈何。他们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既然中央决定了，留下就留下吧”。有的学员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认为“历来整风都是号召大家提意见，结果谁的意见提得多，挨整也最凶。”“把随便发牢骚的话也当成真实的思想来整。”个别学员指责“中央这一手办得很拙劣”（陕西省委统战部长王文良）。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学员和两位苏联专家。这给大家带来一时的兴奋，但没有消除普遍的不安。

6月25日，校党委发布新的整风学习计划，要求全校学工人员以进一步深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以20天时间（7月1日至20日）讨论在前一时期学习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性、方针性较强的八个问题：①关于党的整风运动；②关于当前反右派斗争的问题；③关于三反肃反；④关于社会主义革命；⑤关于社会主义建设；⑥关于党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⑦关于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⑧关于党的领导与党内生活的一些问题。计划要求：通过对上述八个问题的讨论，“开展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杨献珍、侯维煜自列席6月19日的书记处会议后，已感到高级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斗争势在必行。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在7月初决定把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二人作为反右对象来批判。

王谭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他在1956年夏季入学考试时所写的论文《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心得》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颇为令人惊诧的见解。如他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或缺乏联系当前革命实际发展作出对革命更有现实意义的自我批评，就是自我批评不足。”联系到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怎

么能光说王明同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对于“高饶联盟”问题，他也提出类似的质问：“何以只说高的一面而领导上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呢？”他进一步指出：“中央在有些或说在不少的问题上是只讲‘过关斩将’，不讲‘败走麦城’；也有‘讲过去不讲现在’和‘避重就轻’的不良倾向。”他问道：“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决不能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看法上借机翘尾巴。”并且尖锐地指出：“把自己领导的一切事业都说成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光辉发展也是有危险性的。”

能够这么大胆、这么尖锐地批评党中央，而且矛头直指毛泽东，确实表现了王谭的不同凡响的见识和勇气。但在当时看来，这无异是大逆不道的谬论。因此，教务处在评阅学员试卷时，便把这份论文抽出来送到侯维煜那里。侯维煜沉吟良久，叫人把论文打印出来分发给校党委全体委员。所以，这是一个早已备案的对象。但是，如果没有反右派运动，也许最后批判一下也就过去了。

不过，王谭之所以被列为反右对象，还不只是入学试卷所反映的观点。他在1957年1月哲学学习结束时所写的《思想总结》里，提出十点“批评提要”，主张“要炼得出这一种‘评上’的政治品质来。”“决不放下党在批评方面已经给的一切权利，做到敢于批评任何一个人。”他把某些占据领导岗位的干部描述为“对马列主义妄作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活动的人们”，“形形色色的‘一点论’和对什么都采取‘唯一主义’的人们”，“抱有‘伪君子之风’和‘阿谀之风’的人们”，“存心在人民胜利的老堆上‘扒功劳’和碰到人们作支援的财政开支就‘挥金如土’的人们”，“用了‘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所谓策术，把人们变作‘井中之蛙，只见片天’的人们”，“老搞报喜不报忧，‘要什么报告就做什么报告’和‘假报告’来骗党的人们”，“以合乎‘孤意’为则的用人行事，搞什么‘家天下’的人们”，“唯我独尊自专和‘甘作独夫’的人们”，“‘阿Q气’的人们”等等。鸣放开始后，有学员评论人民大学林希翎、北京大学谭天荣的演讲都是毒草，他说：“也许几万年后会成为鲜花。”

对王谭的批判是7月中旬开始的。7月11

日，校党委正式通知支委会对他的“错误思想”开展批判。从7月19日起，王谭所在支部开了两天半支部大会，批判他的思想“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王谭拒绝接受。27日早晨他对正在举行支委扩大会的十几位同志说：“我要向党声明，我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开一百次会我也要这样说。”“开全校大会，我欢迎；登报纸，我哈哈大笑。”“王谭是共产主义者，到哪里也要这样说。”“你们查吧！我王谭就是这样一块共产党员的骨头。”“毛主席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批判，如果说提意见等于攻击，又是系统性的、逻辑性的，我不能同意。”“说我放肆，我是在党内放肆；说我目空一切，狂妄自大，随便提问题，我五体投地；说我别有用心，这和我王谭毫无关系。”他声明除承认“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外，对其他批判一概拒绝。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王谭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可悲之处。他的声明被认为是“顽抗到底”的表现，从7月30日至8月15日，曾多次召开联支大会和全校大会，对他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王谭被迫在8月27日写出一份题为《一定认错，一定悔改》的检讨书，承认自己是“党内异乎寻常的不满分子”，“党内的老右派分子”，“反动透顶的反党分子”。他终于低下了那高傲的头。但他的检讨仍被批判为只不过是“三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对自己的罪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他继续在9月中旬召开的联支大会上受到批判。

另一个反右的对象是徐盈。徐盈在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他被列为批判对象并最终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根据有三：一是同储安平等人的关系；二是主张“新闻自由”；三是所谓“第三条路线”的思想。

在这三条原因中，第二三条都是在开展批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初的根据其实就是第一条。作为一个有地位的名记者，徐盈的交游很广，而同他最密切的则是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等。储、浦等曾夸赞他是“非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鸣放开始后，徐盈每个星期天回家，常常去探望储安平，无所不谈。7月1日《人民日报》点了储

安平、浦熙修的名,作为他们的密友,徐盈的右派嫌疑也就确定无疑了。

徐盈的新闻观点,集中表现为“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主张恢复新闻出版事业的自由竞争,认为“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的出版、发行及销路”。他认为今天的记者都是“小媳妇,到处碰钉子”,所以提出记者应当有采访新闻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官方的约束和限制。他认为“同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民间办报”,就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就像帝王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他说:旧社会的同人报纸向反动政府“争取新闻自由,有进步作用”,“文人论政,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他还竭力提倡“尊重报人”,认为党对一些老报人安排不适当,使他们“有潜力不能发挥”,“过去记者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很有用处。”

徐盈在解放战争期间除担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外,还兼任《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新路》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这两个杂志在当时是第三条路线的主要舆论阵地,徐盈这个时期在《大公报》和这两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难免带有第三条路线的痕迹。第三条路线是那个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股思潮,徐盈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生活,有第三条路线思想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反右那样的政治条件下,它却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徐盈的一条“罪状”。

对徐盈的批判略后于王谭,批判徐盈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8月15日召开的。接着,连续召开了六次有五个支部学员参加的联支大会。在9月12日

的最后一次全校大会上,徐盈被迫承认自己是“章罗联盟在新闻战线上反党集团的策划人和军师。”

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思想上,对普通班、新闻班这些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还是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7月22日,他们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王谭、徐盈。另外两名学员,因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被认为有右倾错误思想,应当适当批判,但不划为右派,杨、侯称之为“标兵”:一个是肖鲁,入学前是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另一个是王善玲(女),入学前是劳动部的副司长。报告上送后,邓小平召见杨献珍、侯维煜。在谈到肖鲁时,邓小平说: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那怎么行?他还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邓小平的指示,杨献珍、侯维煜别无选择地要执行。8月初,党内印发了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使全国反右斗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高级党校也加大了反右运动的力度。为了加强领导(同时



20世纪50年代的中央高级党校礼堂,全校性的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实事求是

第 74 期

1957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刊编辑委员会编

(本期两版)

关于肖鲁问题的性质

——惠锡礼同志1957年9月6日在批判肖鲁大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根据同学们的意見，本报特将惠锡礼同志在大会上的一些發言稿，供大家參考。

个人主义和放我不管的严重程度，也可以看出他的阶级立场和对党的态度。

肖鲁在历史上曾接受过党的审查和处分。

1948年在太行整风时，他受到了审查。1953年，党对他隐瞒在白区工作时的历史进行了审查。

1948年在太行整风时，他受到了审查。1953年，党对他隐瞒在白区工作时的历史进行了审查。1948年在太行整风时，他受到了审查。1953年，党对他隐瞒在白区工作时的历史进行了审查。

肖鲁对党的干部政策不满。他一向高傲自大，自恃聪明能干，热衷于名誉地位，斤斤计较于待遇。他自以为入党不久就作了比较负责的工作，现在在海员工会国际部担任部长是“大材小用”。他愿为过去领导他的同志，现在的职位比他

肖鲁的出身和歷史

肖鲁出身于破落地主和反动军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被我们判处徒刑，现在在劳动改造。肖鲁入党虽然将近二十年，但是原来的阶级立场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向极为严重，最我界限极为模糊。在两次结婚的问题上，表现了放我不管。1942年未结婚前正式同意，他就和一个政治面貌不清的大地主的女儿结了婚；结婚之后，组织上曾对他作了检讨。1943年组织上对他这个要人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并且责令他们离了婚。以后他又和这个女人复了婚。1950年他

的斗争。

我们所以把肖鲁这个有将近二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定为党内的右派分子，是由于我们了解到他在资产阶级反动派进攻期间，反对党的领导，丑化党的干部，而反对党的进步和大喊要求共产党的高保福之流却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与右派非唯，为右派辩护；和右派一同否定我们工作中的成就，反对社会主义，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与此同时，我们还从他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对党的一贯不当中，暴露了他的反动思想来源和本質。因此，对于肖鲁这样一个有将近二十年党龄的共

关于肖鲁问题的性质，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不正确的認識，曾认为他的问题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当时所以这样認識，是由于我们对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認識不足，没有深刻认识到反右派斗争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党内的严重危险性認識不够，对机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人，尤其是对像肖鲁这样的敌人不善于識別。虽然也看到了他的问题的严重性，但因他是有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把他划为右派，不免有些心软，下不了手，存在温情主义。因此，我们就未能及时地認識他右派思想的本质。

这一时期，经过联文大会、支部大会和小组会进一步的深入揭发、批判和斗争，我们逐渐克服了温情主义，进一步認識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本质。现在我们支部的全体同志一致认为肖鲁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我们和肖鲁

反右时党校刊物上批判肖鲁的文章

也是为了分担责任），杨献珍、侯维煜从研究班选调了十来个学员，参加反右领导小组。8月17日，党委第48次会议初步确定，在全校各部班学员中划9人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谭、徐盈、赵节、高朗），新闻班2人（尤力、姚北桦），师训部3人（龙纯璋、沈锐、黄维忠）。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出席会议的书记们批评了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彭真则在插话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在中央书记处的强大压力下，杨献珍、侯维煜不得不对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作出新的估计和部署，但他们在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在8月28日的党委第51次会议上，杨献珍说：“右派要搞出，但面不要太宽，既要从严，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气。”

但是，既然像肖鲁这样的“标兵”已被突破，那么其他情况相似的学员就不得不跟着倒霉，原来作为右倾思想只须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现在很多都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来斗争。以肖鲁为例，他的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上鸣放的一些观点表示同情或赞成，如主张取消高校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主张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

让资本家去经营；同意给资本家20年定息；认为公布的胡风三批材料说服力不强；北大清华的有些大字报不好反驳；有些人可能是我们过去把人家整得太厉害了，因此他才出来发发牢骚。这些问题，本来都是作为右倾思想的典型来批判，但8月23日邓小平定性之后，问题便不一样了。肖鲁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惠锡礼在9月6日的全校学员大会上说：“经过进一步的深入揭发、批判和斗争，我们逐渐克服了温情主义，进一步认识了肖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本质。我们支部的全体同志一致认为肖鲁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肖鲁与社会上的右派气味相投，情感相通，一唱一和，互相呼应，这不是反党、不是向党进攻又是什么呢？”这里的“逐渐克服了温情主义”一句话，道出了学员们在肖鲁问题上的勉强和无奈。

从8月下旬开始，不仅在普通班、新闻班，而且在师训部和教职员中，都进入了揭发批判斗争右派分子的高潮。9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党内右派分子与党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惋惜心软，下不了手。

这个指示使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温。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高级党校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很多重点对象在支部大会批判后,还组织三至五个支部的联支大会甚至全校学员大会来批判。这些学员究竟有什么观点,以致一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并且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呢?现在试举普通班几个“右派分子”的材料,来考察当年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丁景才(原为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科所所长)认为:“解放以来工农业剪刀差扩大了”;统购统销卡得太紧,使农村副业萎缩;供销社“与民争利”,使农民收入减少,生活降低。他批评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如果合作化慢一些,规模小一些,增产就会多些”,“如果允许农民退社,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会退出”。他还认为“思想改造不能靠运动来解决问题”,“至今还有人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说明靠运动解决问题是粗糙的”。

刘汉仁(原为长春市检察院副院长)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曾挨整,对此十分不满,“一提起42年整风就气愤”。他说:“你们说42年整风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我看整风不整风照样打胜仗。”他认为“党内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岗的品质很不好,为什么要提拔他呢?”“三反运动只反了贪污浪费,没有反官僚主义,只有两反,没有三反。”“三反运动是以官僚

主义来反贪污浪费。”他也批评农业合作化冒进,不应该反右倾保守思想。

石天行(原为江西省委工业部第二副部长)说:“几年来发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损失太大,风都是从上面往下刮的,一级比一级大,不仅思想批判,而且要组织服从,不随风倒不行。这是一种片面性,根源在于‘好大喜功’。”“上面的缺点,都归结为情况的变化上,是辩证法;有了缺点和错误,只批评下面。”“头上长角不容易。不长角还好,长了角不仅会锯掉角,而且会掉脑袋。”他批评党内选举只搞“等额选举”,“不许活动,不许竞选”,是“形式主义”。他说:“党内有这样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左’的材料,并且还都有数目字!”

刘晓晔(原为人民日报社农村工作部副主任)认为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以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他主张“要破除迷信,不要对杰出人物的革命领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论当作万应灵药。迷信革命领袖,迷信革命理论,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问题是毛主席一个人搞起来的。他想搞什么,就能搞起什么来。”“一个人的聪明是有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也有错误。”他还



反“右派”的标语赫然出现在1957年国庆游行队伍中

认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鸣放开始后,他曾向别人推荐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刘德焜(原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批评“三反”运动“不符合群众路线”,是“大规模的逼供信”;批评中央在肃反运动中“对敌情的估计不够科学”,结果“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墙和沟”。他认为“中央缺乏自我批评”,毛泽东“有时火气太大,不冷静”,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领导“要求过急,欲速则不达”,“又要犯错误”。

齐佩轩(原为财政部国际财务司司长)认为:财经会议的处理不公平;“八大”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国务院应有“党外副总理”;“合作化冒进了”;“当前农民生活困苦”,“工农生活悬殊”;“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村老百姓普遍不满”。他主张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张生强(原为甘肃省定西专署专员)批评“肃反扩大化”,认为“搞运动就容易出错”。认为“1955年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农村粮食紧张是人为的,应适当开放粮食市场。”他还说:党内缺乏民主,“没有人敢讲反面话。”

这些学员大部分是1938年前后入党的老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整风中所提的意见,是完全符合整风的精神和要求的。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肃反、反胡风等问题的批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认为党内缺乏民主,毛泽东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更是恰中肯綮的切肤之言。这些不乏真知灼见的批评,表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关切和爱护,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味呢?可惜,他们最终都成为“引蛇出洞”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党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一个政党连有二十来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善意批评都听不进去,甚至对这些实际上都是优秀党员的批评者进行严酷的惩处,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丁景才(见前)和师训部学员陈友伟(原为华东师大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于9月16日、19日相继自杀。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学员杨赓(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又自杀身亡。这些不幸事件

丝毫也没有影响波涛汹涌的反右狂澜,运动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按照党内的传统观念,丁、陈、杨三人被视为党的叛徒,开除党籍。

进入11月以后,凡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都已在全校学员大会或几个支部的联支大会上进行了揭发批判;还有一些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学员也在支部或小组的范围内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运动已进入尾声的11月11日,周恩来到校向惊魂未定的学员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结尾时勉励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好好改造,将来还可以回到党内来,为党工作。对于这些不幸的学员来说,这是一次充满悲凉的安慰。

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

学员反右结束时,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也已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1958年4月才结束,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503人的6.4%。

1979年春节前后,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为全国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级党校学员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得到改正。但是,他们最宝贵的年华却都已经在社会最底层消耗掉了。反右运动使共产党丧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社会上丧失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更大的损失是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破坏了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助长了一种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和谄媚事上、相互提防的恶劣风气,大大加强了专制的极权体制,以致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遗憾的是,反右、文革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对党的腐蚀侵害,至今仍未很好扭转。这是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因此,总结从反右到文革的惨重教训,从中吸取有益的鉴戒,应成为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再讳疾忌医了。

(责任编辑 李晨)

反张春桥的 “胡守钧小集团”

• 秦维宪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成全了一批阴谋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多年来在“好学生”柯庆施的教诲下韬光养晦,以展“宏图”。这时,张见时机成熟,伙同姚文元与江青遥相呼应,顺利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并很快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后,猛然杀个回马枪,煽动上海群众造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妄图打倒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自己取而代之。1966年11月9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的示威游行中横空出世,不久,相继发生安亭卧轨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件。

11月11日,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抵安亭站。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5条意见。然而,上海市长曹荻秋深知张春桥在30年代

的根底,一眼看穿他乘乱夺权的阴谋,遂公开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作为拥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也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

但是,曹荻秋和“赤卫队”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支持夺上海市委的权。

1月4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抵上海处理文革大事。次日,“工总司”、“红革全”等众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向上海市委进攻的《告上海人民书》。8日,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9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自此,“一月风暴”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张、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这时,复旦大学内无书可读的大学生们好奇地望着天翻地覆的人间荒诞剧。他们尤其关注在台上的风云人物,胡守钧仔细翻看刊有张春桥讲话的传单,陷入沉思之中。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他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

胡守钧1944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一个沙洲,并在那儿度过了苦难的童年。60年代中期,胡守钧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随着视野的开阔,他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变化,凡事喜欢“反着想”。38年后,花甲之年的胡守钧冷静地说:“在‘一月风暴’中,我首先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张春桥的狰狞面目,有一个从怀疑、反感到抵制的过程。”

张春桥自吹自擂，叫嚷毛主席同意他当上海人民公社第一书记，终于激怒了“孙悟空”。于是，大上海刮起了一场剪除妖魔的风暴

胡守钧将自己怀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想法讲给同学们听，他还跑到上海市图书馆，查阅 30 年代的报刊。当他们掌握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以及他阳奉阴违的多次讲话后，一致担心毛泽东没有识别身旁的奸佞。

1967 年 1 月 22 日晚，胡守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听说张春桥、姚文元当晚 9 点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代表。胡守钧拉住这位同学混进了接见会场。

会上张春桥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一番继续向基层夺权的“战斗任务”，突然话锋一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一落，全场炸开了锅。胡守钧和那位同学极为反感，愤怒地看着这幕闹剧。

1 月 23 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

与此同时，胡守钧也在紧急行动，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他们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战斗方案。最后，大伙提出下款署名时，胡守钧说：“咱们就叫孙悟空吧！”

是日夜晚，寒风呼啸，胡守钧等人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开向北站、外



1978 年底出狱时的胡守钧

滩、南京路、淮海路……凡是看到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便针锋相对地贴上“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等标语，后面一律署名“孙悟空”。瞬时，上海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倒张运动，在上海拉开了帷幕。

“孙悟空”在复旦两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并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全市倒张大会；张春桥狗急跳墙，派出特务和军队，一纸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使“孙悟空”们抱恨终生

一浪高过一浪的倒张运动，犹如利剑直刺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找来了游雪涛（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要他密切注意这两天发生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

“孙悟空”的行动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红卫兵组织在推波助澜，将倒张运动推向高潮。复旦这时成立了炮打张春桥的总司令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蜂拥而至。1 月 26 日深夜，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揪徐景贤计划。1 月 28 日凌晨 1 时，大学生们抓住了徐景贤押到复旦去看大字报，并逼他交待张春桥的阴谋。

张春桥获悉徐景贤落到红卫兵手里，马上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去企图抢回徐景贤。

张春桥的强硬手段，激怒了“孙悟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当天晚上，倒张掀起第一个高潮。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不仅揭了张春桥 30 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而且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那个岁月讲究历史清白和红色血统论，这两炮轰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要害。

与此同时，“孙悟空”在复旦大学召开 20000 多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胡守钧

作为“孙悟空”首领作了重点发言。他历数了张春桥的丑恶历史,剖析了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后说:“同学们,张春桥是个铁腕人物,我们反对他可能会坐牢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愿为真理而献身!”全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并在胡守钧带领下宣誓“不打倒张春桥誓不罢休!”

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再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这天外校来了更多的大学生。胡守钧在会上号召全市各群众组织抛弃一切分歧,共同对敌。会上决定,联合上海各高校学生,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全市倒张大会。

可是,“孙悟空”及其他高校学生的行动,全被混入复旦的游雪涛“扫雷纵队”侦察到手,并连夜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亲自拟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与北京的王力联系,王力迅速征得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于30日凌晨5点向上海发电:“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目,一切后果应由反张春桥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使全市大会毁于一旦。

顿时,张春桥、姚文元无比兴奋,王洪文调动大队人马包围复旦,抢回了徐景贤。徐景贤一自由,马上反扑,指挥宣传车开上街头……

“文革”初期,由“孙悟空”发端的可歌可泣的炮打张春桥运动,就这么悲壮地被镇压了。

张春桥公开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背后却指示徐景贤秋后算账。于是,“清队”和“一打三反”,仿佛两条凶猛的毒蛇,死死缠住了胡守钧

张春桥扫除了飞黄腾达的障碍,2月5日,在人民广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上海市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后因毛泽东反对这个称呼,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等因“功勋显著”,也荣升副主任,其他保张春桥有功之人,全得到了升迁。

张春桥多次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表态,不

追究炮打者的责任,暗中却等待时机,欲把“孙悟空”置于死地。

1968年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清理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运动,把中国人民推向更深的灾难之中。张春桥暗示徐景贤:“特别不能让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漏网!”徐景贤心领神会,立即组成了“03”专案组,开始搜集“孙悟空”去年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胡守钧被他们列为“复旦头号变色龙”。

风声一天天紧起来,“孙悟空”的许多成员都潜往外地避风头,胡守钧也乘客轮溯长江而上,去名山大川踏青。4月6日,胡守钧获悉复旦的学生安然无恙,旋悄悄回到上海,他刚踏进市郊一位“孙悟空”成员家门,就被埋伏已久的“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押回复旦,宣布隔离审查。

胡守钧被囚的“牛棚”是一间学生宿舍,一张双层铁床,床下躺着一条乌黑的铁链,墙上溅着斑斑血迹。几天前,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就在这里被活活打死。“清队”期间,复旦有几百名师生遭囚禁,胡守钧耳闻目睹好几位学生被逼自杀:5月的一天深夜,对面楼上一个学生跳楼自杀,可偏偏折断了腿,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久久地回



红卫兵在上海外滩散发传单



上海人民广场庆祝“一月革命”大会

荡；几天后又一位学生跳楼轻生，整个头颅陷进了胸腔……

由于胡守钧是市里的要犯，对他的看管格外严，专案组成员对他进行车轮大战，妄想精神上摧垮他。然而胡守钧抱定宗旨，炮打张春桥没有错，自己不是反革命小集团头子。于是，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纸上抄毛主席语录，权当“交代”。

胡守钧开始设法逃走。7月的一天黄昏，胡守钧上厕所，一位专门守候的同学趁看管人员不备，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帮他逃走的方法。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胡守钧说要去锄草，避开看管人员，溜进楼后的乱草堆里。然后迅速钻过篱笆，把衣服举过头游过臭河浜，爬上岸疾步奔向对面汽车站，等候的同学给了他一笔钱和粮票，胡守钧上车离开上海，躲在江苏阳澄湖畔一个农民家里，又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流亡。

1970年初，全国开始了骇人听闻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共九大之后，荣升政治局委员，留在北京搞“文革”，他们担心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再次“后院起火”，遂下决心将“孙悟空”一网打尽。

张春桥明确指示徐景贤：复旦是上海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由徐景贤、王秀珍等亲自抓。徐景贤等立即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揪炮打无产阶

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解放日报》《文汇报》于2月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云：“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历史的反革命，不大注意现行的反革命；只注意公开的活动，不大注意地下的阴谋活动。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还会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长出来。……”35年后，我们再看这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是徐景贤操纵舆论，针对“孙悟空”的。

“孙悟空”的“元凶”胡守钧尚未落网，

张春桥明确表示“我一天看不到复旦的消息，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是年春节，姗姗迟来。胡守钧因长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罗地网，他于大年初三返回上海，与一位同学在市区吃罢晚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复旦，刚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宣布隔离审查。这次，胡守钧被单个关在一间小房里，门窗钉上铁条，看守人员全是三代红出身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文攻武卫队员，他们互相监督，谁也不与胡守钧讲话。一日三班倒，每班6人，18条大汉看管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

胡守钧落网后，“孙悟空”的其他成员一一被五花大绑地从各地押回复旦。徐景贤兴奋得赶紧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战绩，并在他们的指示下，正式将“孙悟空”打成“胡守钧小集团”，在上海作为头号现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发、批判。

徐景贤在胡守钧被关后一个月，召开了专案人员会议，讨论给“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定什么罪名。会上在徐景贤的提示下，胡案的罪名上升到反毛主席。那年月反对毛主席是要砍脑袋的，不久前，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就在人民广场宣布几名反对毛主席的青年被判处死刑。

专案人员秉承徐景贤的旨意，直扑胡守钧宿舍，将他从中学起开始写的日记笔记、私人信件

和照片悉数抄出,选出其中“过硬”的材料。胡守钧在大学一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大意是说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深为导师锲而不舍的学习意志所感动。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一事无成。末了他在日记下面画了一把宝剑,右边写下了“宝剑作证人”,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有感。这分明是一句自勉的话,专案人员却硬说胡守钧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钧在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背面题了“踏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中间是“行万里路”。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霸占全世界!此乃徐景贤亲笔题的按语,在当时名噪天下。

专案人员还向“孙悟空”其他成员发动袭击,抄出一本《暗房摄影技术》,就说他们在研究“暗杀技术”;同学之间的私人信件,便被定为“特务单线联系”;有人谈论汽车号码,就是要“暗害中央首长”;有人报名去军垦农场,就是“打入军队刺探情报”……一时,讨胡的战报、通令、大字报满天飞。上海市委还专门印发了20多万份《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单位,均卷入了这场大批判。

胡守钧及其同伴,断然逃不脱更大的厄运。

1970年10月20日,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声讨大会,胡守钧被逮捕;1975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10年徒刑。张春桥、王洪文原打算杀掉的“元凶”死里逃生

胡守钧被隔离后,在8个月中被批斗了二百余次,每天吃饭、睡觉前,看管人员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稍有不服,即拳打脚踢。徐景贤还下令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去复旦参观批胡展览会,看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回去便揪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转眼秋天到了。一天上午,市里来了一位“大人物”审讯胡守钧,要他老实交待罪行。

“我没有罪”,胡守钧昂首大声回答,“我就是炮打过张春桥,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上海无人不知,用不着交待。”

“你真是个顽固的现行反革命啊!”

“反对张春桥,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只要活着,就要告你们!”

“放肆!”“大人物”拍桌站起吼道,“你别做梦,现在杀人权下放到省市一级了,用不着报中央批的。告诉你,不用公判,从隔离室拉出去就可以杀掉!杀了你,看你告什么状?”

神秘的“大人物”归去不久,张春桥从北京来电,指示上海方面召开公审胡守钧大会。10月20日下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讨胡大会,全市各大学、中学、电影院、剧场、音乐厅、俱乐部作分会会场,上百万人听拉线实况广播。

遍体鳞伤、脸色苍白的胡守钧被押往会场。沿途戒备森严,会场内外更是布满了军人、警察、民兵,两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押着胡守钧做着“喷气式”奔上示众台。

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张春桥麾下的大将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等等。有上海头面人物压阵,工、农、兵、红卫兵诸界革命群众“代表”一个个跳到台上声讨“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胡守钧逮捕法办。接着,一位公检法“代表”展开一方白纸,厉声宣布逮捕令。两个警察对胡守钧上了手铐、脚镣,拖上囚车。王洪文望着胡守钧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呵斥:“哼,这就是反对春桥同志的下场!”会后,张春桥欣喜若狂地称赞爪牙们,说这次公审大会开得好!

胡守钧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整整关押了5年。奇怪的是判决迟迟不下来,胡守钧不知道张春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监狱里过着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与胡守钧关在一个“铁笼子”里的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他因忍受不了折磨,神经错乱了,白天,他呆呆地抓着铁杆,悲哀地叫爹喊娘,黑夜,他爬在地上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叫声,更要命的是他天天用一只袋子装自己的大便,然后咬着在地上一圈圈爬,涂得满地都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胡守钧一方面悉心照顾难友一方面锻炼身体,看书、思考学术问题,用牙膏皮做工艺品等,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思维。

在这段非凡的日子里,胡守钧差点被杀头。

张春桥一直将胡守钧作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曾密令爪牙枪毙他。然而,即使当时没有民主与法制,但形式上的判决程序还是要的;也多亏了有一些正直之士,尽力保护过胡守钧这样的政治犯。当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所谓的“胡守钧小集团”案上,曾提出过异议,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承办人员甚至反对判刑。消息传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那里,他们声色俱厉地训斥承办人员:“胡守钧反对春桥同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当诛,现在判他10年徒刑是少的了。你们顶着不办,是什么立场?这是违背十大政治路线的!”(这时中共十大已开过,张春桥荣升政治局常委)

马、徐、王的高压,市高级法院如何抵挡得住?1975年5月,胡守钧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徒刑,旋被关进上海市监狱。胡守钧被判后天天喊冤,高呼自己反对张春桥没有错。

1976年1月,胡守钧被押送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胡守钧身穿单薄的衣衫,戴着手铐,在风雨交加的隆冬,走向皖南山区。途中,胡守钧满腔悲愤,口吟《西行》词一首:

水寒山瘦气萧森,
云暗日蔽天低沉。
恨难消,愁更深,
风声雨声欲断魂。
千古奇冤无门诉,
国事家事岂堪闻。
翘首望断天涯路,
天涯路,何处是归程?

胡守钧在军天湖劳改农场,边承受重体力劳动“改造”,边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申诉材料,但都石沉大海。一晃9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中午,胡守钧看到管教人员随手扔掉的一张《安徽日报》,发现新闻中中央领导人有了变化,于是又一遍遍写申诉材料。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一公开,胡守钧就呈送了一大袋申诉信。胡案因影响太大,复旦党委协同公安局和法院,联合调查了两年,直到197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才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受政治迫害。宣告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彻底

平反。”被关押8年之久,九死一生的胡守钧又回到洒满阳光的复旦校园。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这一大冤案,涉及面之广,受牵连者之众令人吃惊。直接与“孙悟空”炮打张春桥有关者近千人;上海各行各业揪出的“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小集团”不下万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是突出的一例。1968年,胡守钧因认识蒋孔阳的女儿,去他家借过几本书。当胡守钧“案发”时,蒋孔阳被作为“长胡子”的阶级敌人,他的家被指控为“孙悟空”的黑据点,蒋孔阳被隔离审查。胡守钧平反后,大批受牵连者一一找到胡守钧,要他提供证明材料,供自己平反之用,胡守钧一时应接不暇。其实,胡守钧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近几年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居然还有人告诉他,自己曾因胡案而坐了几年牢。

胡守钧在武汉的全家成了大反革命家属。胡守钧被隔离后,他的老父亲被赶到襄阳农村,唯一的妹妹去孝感插队,因为有个反革命哥哥,她成了集体户中最后的留守者,与之相伴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家中只剩下胡母一个人,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去,被迫从汉口搬到武昌。可是不久胡守钧的反革命判决书寄到了新居的里委会,胡母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孤独地蜗居在一间破屋里,整天流着泪想儿子,差点哭瞎了眼睛。在胡守钧被关的8年中,他一次也不忍心叫父母去看自己,也不敢直接给家人写信,怕信封上那刺目的寄信人地址,会给家里招灾惹祸。多亏了汉口老家的邻居小魏,胡守钧的每封家信都由他代为转送给胡母。胡守钧一出狱,第一件事就是用他平反的补助费,买了套当时十分紧俏的中学自学丛书寄给小魏,以表达对这位患难之交的由衷感激。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今天,当中国在奔向现代化之际,每一个有良知有民族尊严有人道精神的中国人,都在反思那场民族浩劫,探索民主与法治的艰难道路,从而永远杜绝这类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

3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阶下囚今天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著名的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

——将军的中共党员身份考略

● 阎明复

编者按：

今年10月15日是张学良将军逝世四周年。为缅怀这位“千古功臣”，我们特发表阎明复的这篇回忆。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是张学良将军的挚友和幕僚。张将军在美国定居后，阎明复和他的姐姐阎明光曾多次去夏威夷看望张将军夫妇。

2001年9月底，从报上看到张学良将军患肺炎住院抢救的消息，我们全家十分着急。后来又听说老人家的病情有所缓解，大家都为之欣慰不已。然而，10月12日清晨3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原来是张将军的公子张闾琳打来的，说他父亲病危，希望我们能去夏威夷。接着他又发来传真，希望阎明复和吴克良能到夏威夷和他们一起渡过这段艰难时间。

我的父亲阎宝航过去在东北军工作，和张将军一家私交甚好，两家关系也非常亲密，所以我们自小都以子侄辈尊称张将军夫妇为大伯、大妈，对闾琳、闾瑛也以同辈相称，宛如家人。

自10月12日以来国内报纸上不断报道张学良将军病情恶化的消息，不少将军旧部的子女、东北元老的后代及北京校友会的校友都纷纷打电话向我了解汉公的病情。我告诉他们我将去



张学良遗像

美国看望张大伯，他们都要我转达向将军的问候。

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张学良大伯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十分悲痛。汉公的亲朋好友的后代和东大的老校友又托我带上他们的挽联、唁电、挽带等以表达他们对汉公的悼念。

16日我们拿到美国的签证和机票，上午明光三姐也从上海飞抵北京。下午我们去三〇一医院看望了吕正操老人。吕老已96岁高龄，身体很好，只是腿脚走动不便。我告诉他明天我们就动身去参加张学良将军的葬礼，吕老托我们向汉公

的亲属转达他的慰问，希望将军在国外的亲属常回家乡看看。

10月17日下午2时50分我们乘坐日航班机去东京，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上午9时许安抵夏威夷，下榻希尔顿酒店。当天下午，闾琳来看望我们。闾琳和我同岁，都是1931年出生的。1936年他父亲发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才六岁多。为了避免发生不测，将军把他送到国外，一去多年，没有学习中文的机会。因此他不会说汉语，我们谈话时，由克良翻译。闾琳向我们介绍了追悼会和葬礼安排的情况，接着我们又一起去假日酒店，看望下榻在那里的汉公的大女儿闾瑛大



本文作者看望张学良将军(2002年在夏威夷张将军寓所)

姐,她是大伯和于凤至所生,那年已80多岁了,但身体健康,思路敏捷,我们向她表达了亲切的慰问。随后,我们同阎瑛大姐又一起乘车去张学森家。学森是张将军的五弟,我们称他五叔。五叔一家住在夏威夷,他的女儿阎衡、阎芝平时就照顾大伯、大妈的生活。特别是阎芝为了照顾两位老人,辞去了在台湾的工作。阎衡住在香港,但经常回夏威夷看望大伯、大妈。阎衡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在五叔家谈了很多,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国内各界熟悉和知道大伯的人,在闻听噩耗后举行各种悼念活动的情况。

当晚,我们又和赵荔女士共进晚餐。赵荔是赵一荻夫人的侄孙女,多年来一直照顾两位老人。赵荔向我们介绍了丧事安排的情况:公祭仪式在夏威夷波扶域殡仪馆举行,由台湾的周联华牧师主持。周牧师是大伯的老朋友,在台湾的时候,大伯、大妈同蒋介石老先生夫妇同在凯歌教堂作礼拜时,就是周牧师主持的。

据了解波扶域殡仪馆比较狭窄,无法悬挂挽联和挽幛,而我又从国内带来不少将军的亲朋好友为表达对将军的哀思书写的挽联、挽幛。于是,我同阎瑛姐弟商量,提出我想请汉公家属共进晚

餐,借晚餐的机会举行一次追思会。这个建议她们认为非常好。当天下午我们就到花店订了七个花圈,分别代表杨尚昆主席的子女杨绍明、杨李,张治中将军的公子张一纯,张学良将军的二弟张学铭的夫人及亲属,高存信将军的夫人白竟凡及亲属,东北元老的后人和阎宝航的子女。接着我们又赶到阿拉蒙饭店的皇苑餐厅预订了22日晚上举行晚餐的餐厅和供追思会用的一座可容纳50多人的大厅,将我们从国内带来的挽联、挽幛展示在大厅里。

19日中午,我们又同大伯的四弟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她的女婿贾八一、儿子张超群共进午餐。席间八一谈到张汉公生前最后一段日子的情况。八一说,他从10月4日起就一直守护在老人身边,在这之前老人身体一直很好。5月大伯101岁寿诞大家向他祝贺时,他还谈笑风生,精神很好,宴会上唱了一段京戏“武家坡”,回家后兴犹未尽,又唱了一遍。八一说,我岳母回北京去,临行前请大伯为她题字,老人爽快答应了,拿起笔来写了“爱人如己”四个大字。谁知这四个字竟成了将军一生的绝笔。

后来,八一告诉我们,张将军住院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支付,开始抢救时住在特护室,拔管后就转移到普通病房。病房很小,只能放一张病床和几把椅子,有人来看望他时,还得移动椅子才能靠近他的床前。这家医院条件比较差,赵一荻生病时也住在这家医院,发烧三天都没有人发现。这次张将军住院,护士沈萍曾建议换一家条件较好的医院没有被采纳,只好仍然送到这里。

19日晚六时,甯恩诚的女儿甯克勤、克莉邀请我们到她家共进晚餐。专程从沈阳来夏威夷参加汉公葬礼的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副校长王宛如也参加了晚宴。席间,大家回顾了甯恩承老人为东北大学的复校费尽了心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甯老的努力,东大复校是不可能的。赫校长介绍了东大师生沉痛悼念张学良老校长的感人情景,并说他们带来了追悼会的录像光盘、照片、东大师生们送的挽联、挽幛,以及他们准备在校园中修建的汉公纪念堂的设计草图。他们还赶印了有老校长肖像的纪念封。

22日下午6时左右,张学良将军追思会在阿拉蒙安娜饭店的会议厅举行。从各地专程来夏威夷参加葬礼的汉公的亲朋好友,闻讯赶来采访的《世界日报》《星岛日报》《联合报》的记者,共50多人。

追思会由我主持。我说,张汉公逝世的噩耗传来,家乡的父老乡亲、汉公生前亲朋好友的后代无不万分悲痛。大家纷纷托我向汉公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追思会上东大赫校长介绍了学校师生对老校长的深厚感情,并播放了来夏威夷之前赶制的反映学校师生悼念老校长的光盘,只见伴随着沉重的哀乐声,一队队老师学生到老校长遗像前三鞠躬,看到灵堂外挂在树上的一排排学生亲手做的千纸鹤时都泣不成声。赫校长还展示了东大师生送的挽幛,把东大师生悼念活动的相册送给了张闾瑛,并把专为老校长逝世印制的纪念邮资封分送与会的全体人员。赫校长还介绍了学校准备修建的汉卿馆的规划。王副校长向大家宣读了我们带来的东北乡亲的唁电、挽联,其中有张将军生前友好、东北爱国志士子弟连夜制作的挽联“千古青史铭伟业,万里神州盼归魂”,以及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挽幛“功勋盖世天下同悲,名垂青史光启后人”。谢雪萍夫人向张闾瑛转交了沈阳大帅府纪念馆悼念汉公的长幅书卷。接着,闾瑛和闾琳先后代表家属讲话,对东北父老乡亲真情地悼念父亲表示深切的感谢。

参加追思会的林渊泉回忆说,张老先生1946年刚到台湾的时候,看守宪兵有100多人。他是1948年被派到先生身边的,当时十八岁。那时对张先生看管很严。他有时陪先生时间长了,就会受到长官的训斥和询问。1988年张先生恢复自由之前,看守他的宪兵吃饭的时候还有四桌人。林渊泉跟老先生50多年,直到他离开台湾。林渊泉说,张老先生十分怀念家乡,曾经有三次提到要我陪

他回大陆。第一次是1992年在台湾时说的。第二次是1997年我来夏威夷看望他时,他叫我单独推轮椅陪他到外边散步,他用手指着大海对面很远的地方说,我想去那边,你陪我去。第三次是1998年,他在散步的时候又说要去大陆看看。只是夫人怕他身体不行,一直未能如愿。林先生还说,张学良老先生常常讲起东北大学,说办大学不容易,沈阳现在还有东北大学,想回去看看,看看东北家乡。在大伯身边工作7年、负责照顾二位老人生活起居的护士沈萍含着泪水回忆说:老人家非常爱学习,每天都要我给他读报、读杂志。他还非常关心人,每次推他坐轮椅出去散步,遇到路边有椅子的地方,他就要停下来,让我坐下歇会儿,怕我累着。老人家对东北大学很有感情,散步的时候,特别戴上东大送给他的有学校标志的遮阳帽,常常说想回家乡看看。

10月23日清晨7时左右,天空晴朗,却出现了一道漂亮的彩虹。我赶快拿相机拍下这一奇景,心想这是为汉公最后送行的壮观一幕。上午8时半我们乘车到夏威夷波扶域殡仪馆。公祭大厅呈“八”字形,中央安放张汉公的紫铜棺。棺



亲友们悼念张将军的挽联

木上摆着衬托在白色的满天星花丛中由 101 朵深红色玫瑰花编织成的大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献给我们的亲爱的父亲和祖父”。大厅的两面墙边摆放着上百个花圈,左侧放着江泽民主席敬送的花圈,旁边依次摆放着李瑞环、王兆国、何鲁丽、吕正操、万国权、孙孚凌及中国驻美大使馆和国内有关人士、单位的花圈。灵柩右侧依次摆放着蒋宋美龄、蒋方良、陈水扁、吕秀莲、连战和连方、张俊雄送的花圈。公祭大厅左侧座位前几排大都是国内来的客人,右侧前排就坐的有蒋老夫人的代表、台湾妇联总会秘书长辜严倬云、台湾政府代表田宏茂一行等。

9 时 30 分,几位殡仪工作人员将紫铜棺的前半部分的盖子打开,张学良将军的遗容呈现在眼前。将军安详地躺在白色丝缎镶衬的棺中,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这是他一百岁生日的时候,赵夫人亲自给他买的,系着红色的领带,头上戴着赵夫人亲手钩织的朝夕不离的黑色无沿帽。将军遗容平静。公祭开始,张将军的 50 多位亲属在灵柩前排成五行,按照中国的习俗跪下行三叩礼。应邀参加追悼会的客人们先后到灵前向将军鞠躬告别。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驻美大使馆临时代办何亚非一行专程从华盛顿赶来,在将军的灵柩前三鞠躬,表示悼念并向阎瑛、阎琳等家属表示慰问。我和明光、克良也走到灵柩前,代表家父阎宝航的亲属向大伯三鞠躬,表达我们深切的哀思。10 时,公祭大厅大门打开,有近 500 名自愿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先后走进大厅,向张学良将军的遗体鞠躬告别。他们中间有白发老人,有来自中国年轻的学子,有华人,也有外国朋友,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也有团体的代表。我们的老朋友、孙科先生的亲属陈志昆老先生和夫人也来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华人青年,手捧素白色花朵的小花盆,将花盆献到汉公的灵前,深深地鞠躬默哀,久久不愿离去。

10 时 50 分,周联华牧师宣布公祭仪式开始并进行祈祷,唱圣歌,证道致词。周牧师请女歌唱家唱圣歌“无上的恩典”后,大家起立唱圣歌“万古磐石歌”第一和第三段。唱毕,汉公的长女张阎瑛致答谢辞。她说:“今天这么多嘉宾到这儿为家父送行,家父在天之灵看到一定会很高兴。我要说对主的感谢,也对各位朋友的感谢,你

们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接着阎琳用英语说:“今天大家都说我父亲是个爱国无私的人,我要说的,是他的另一面。我知道我父亲是一个热情和有爱心的人。他说他当不了医生,就是因为看不了别人受苦。他看到小孩就很喜爱,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孙子都很爱。所以大家也都爱他。家里人感到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幽默的和有爱心的老人。”随后,周牧师宣布公祭仪式结束,家属们走到紫铜棺前,向老人家三鞠躬。殡仪馆工作人员将棺盖合上封棺。汉公的孙子扶灵送上灵车。

夏威夷的东海岸,有一处绿树覆盖、青草如茵的幽静地方,三面环山,面向大海,这就是著名的神殿之谷纪念陵园。张学良将军的五弟张学森就安葬在这里。三年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夫人亲自到这里选定了一个坐西朝东的地势极好的山坡。北面不远有一座寺庙,不时传来庙里的钟声。两位老人决定买下这个小山坡,修建一个墓地,作为两个人相依半个多世纪的最后归宿。他们相约,不论谁先走,对方都要经常来看望。为此,从墓地的大门沿着山坡修了一段宽三米、长十五米的可以行驶汽车的路,通到十平方米左右的平台。平台的南壁上刻着圣经中的一段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沿着平台的西侧、南侧的山坡修了一条轮椅可以行走的小道,一直通向更高的、面积约有十平方米的第二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西面坡上竖立着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平台西侧有一个长方形的石桌,石桌下面就是通向墓室的石门。两年前,即 2000 年 6 月赵夫人先行安葬在这里,今天,汉公正向这里走来,和夫人同归一处。

中午一时许,一辆白色的灵车在长长的车队的护送下,缓缓地驶进陵园,停在墓地的大铁门前。周联华牧师和汉公的儿孙们站在车道的两旁,殡葬工人抬着铜棺,沿着坡路缓缓走到墓室前的灵堂。汉公的灵柩前和沿着山坡的小路两侧都摆放着他的家人、亲属和各界人士送的花圈,从坡下一直延伸到墓地。铜棺放置在平台上后,老人的子女、亲属和送殡的人又一批一批的向灵柩鞠躬致意,直到殡葬工人把汉公的灵柩移放到墓室、安置在赵一荻夫人的棺木旁,葬礼才宣告结束。当我们离开陵园时,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

突然一个遐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山坡上最高处张将军和夫人长眠处的平台，一直沿山坡往下走到大门，弯曲的坡道像“张”字偏旁的“弓”字，而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如今都长眠在“弓”字形的墓地里，不正好汇合成一个“张”字吗？似乎是在提醒世人永远不忘这里是张将军的长眠之地。这个突然的遐想使我们这些怀着对汉公无限悲痛思念的人，又为两位老人在历尽悲壮坎坷的人生之路后，能拥有这样一处安静祥和、山海交融的吉祥之地作为他们的长眠安息之所而感到一丝欣慰。愿两位老人在天之灵安息。

10月25日早晨，阎琳夫妇又来酒店看望我们。我告诉阎琳，东北乡亲十分怀念汉公，那里也是你们的家，家乡父老对汉公遗物非常珍惜，这些遗物都是属于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妥善处理保存，不要让它流失。阎琳表示非常感谢我们的提醒，说这几天已经有不少人都希望能得到汉公的遗物作为纪念，他说，他们会珍惜妥善处理的。他又说，老人生前生活十分俭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生前用的家具已送给当地老人院，追悼会上悬挂的一张将军的遗像是阎琳儿子用电脑把他爷爷几张照片合成的，有纪念价值，他托我带回国内转送东北大学。阎琳还说，他母亲生前在浙江省有一块地产，杭州市政府也曾发给她

“土地所有证”，这次也将复印件交给我，请有关机关帮助处理。分别时，我再三对阎琳说，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大伯虽然走了，希望你们能经常回家看看。

10月26日早晨8时我们离开夏威夷回国了。短短几天，在这里我们经历了无限悲痛与哀思，永别了，敬爱的大伯和大妈！

28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明光三姐去看望了吕正操老人，向他汇报了参加张将军葬礼的经过，其中谈到我对汉公国共两党关系的看法。我说，张学良将军是国民党领导下的高级将领，现在台湾的民进党执政的政府都承认这个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张汉公是国民军的退休将领。这样看才能理解，为什么汉公去世后台湾政府颁发了对他的褒奖令，并派出代表出席汉公的葬礼。而对于我们中共来说，张汉公是我们的亲密朋友，被我们誉为“千古功臣”，但从党的政策角度来看，他只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吕正操老人没有直接答复我的话，但是他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没有看到过确实的材料也不好回答。海峡两岸的出版物上都有过关于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我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曾对我说起，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是我们所关心的。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黎曾经就这件事去访问过叶帅，宋黎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黎把和叶帅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保险箱里。宋黎说，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我问他，（下转第53页）



张将军的灵柩送往墓地

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

• 龚子荣

编者按：龚子荣同志于20世纪30年代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共青团，1934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经监狱秘密党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得以无条件释放。出狱后，他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国前是我晋西南、晋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威信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文革一开始即被诬陷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今年9月21日是龚老的十年忌辰，特此摘发他的遗作，以资纪念。

1914年5月，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4岁时，父亲任职于盐务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我随父亲到了太原，1930年考入成成中学，一直读到1934年春。

成成中学是一所充满革命活力的学校，当年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蒙下，我热切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激起救亡图存的意念和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33年秋，同学张积玉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不久担任太原市社联执委会委员。1934年初，我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被捕经过

1934年4月30日晚上，社联盟员分四路上街散发张贴纪念“红五一”的传单，我的任务是到各学校传达社联指示，并送发社联编印的刊物《红旗》和《穷人报》。同我住在一起的社联盟员阎伟和王伦在公安局附近散发传单，写粉笔标语时，王伦被警察抓住，阎伟逃脱立即回到住所，见我未归，匆忙写下“我们走了”的纸条，压在桌上的煤油灯下，提醒我的注意。当晚我12时以后



龚子荣、桑一伟夫妇（摄于1957年）

才回到住所,极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灯下的纸条。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警察已破门而入,即被押走,房间里有一箱子社联文件也被抄走。次日天刚亮,阎伟和龚元恭又回到住所找我,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逮捕。

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开进公安总局,被分别投入拘留所,三四平方米的监房,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睡在腐烂破裂的地板上,老鼠满地窜来窜去,竟咬破了我的脚跟。每餐一碗小米饭,一片咸菜,一支筷子(是反动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在审讯中,反动派出示从我住所抄去的一箱子《红旗》刊物和印刷用具,以及我写的一份自传材料,认定我参加了社联,并说社联就是共产党。我辩解说:社联不是共产党,它的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相符合的。这一辩解,激怒了反动派,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狠命地打我嘴巴,打得我满口鲜血直流。以后多次审讯,追问后台共产党。他们得不到口供,屡屡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我的两手鼓起很高的血泡,两臂全然失去知觉;他们还施行坐老虎凳刑罚,垫了四块砖,我当即昏厥。几经严刑拷打,我患了“血伤寒病”。鼻孔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想趁机逼供,穷追不舍,还说要用踩杆子的特重刑具来诈唬,我没有被他们吓倒,就是闭口不答。我虽吃尽了苦头,他们却没得到任何东西。直到5月底,公安局将我们转押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时我20岁。

在地方法院看守所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将我们社联的几个人提出揪到囚车上,押进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经过公安局的多次审讯,到这里等待判决。

第二天清早,警察打开监牢的门锁,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一露面,大家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外面的情况。半年前被捕的成成中学老师张衡宇也关在这里。他先问我们的被捕经过,后向我们介绍这里的内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多次的接触中,他考

察我们每个人被捕的具体细节,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审讯中的表现。张衡宇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在成中任教时,他热情启发和指引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被捕后,他和狱外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建立起看守所党(中共)支部,对政治犯热情帮助,关怀备至。他还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争取工作,使看守能帮助我们做事,给我们送来报纸和书籍。在看守所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学外语,还积极组织别人学习。他规定我先学两本书,李达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内容深奥,极其难啃,幸有他的辅导,才略有粗浅的理解。联系在学生运动和社联活动中一些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受益较多。不久,张衡宇老师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共青团团籍,并指定我作发展阎伟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同敌人常有面对面的斗争。如有个叛徒和我们同关在一所监房内,他表现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气愤不过,要揪出这个叛徒,教训教训他。张衡宇老师劝阻大家不要动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卖组织和自己同志的罪恶,指责他在敌人面前屈辱投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大家对他丑恶的嘴脸嗤之以鼻。反动当局怕他再遭政治犯们的围攻,将他调往别处。这一番斗争,是一堂具体而又生动的政治课。

还有一次是反动派的司法部长来狱中“视察”,看守所所长毕恭毕敬地为他开路,指手划脚地要我们政治犯全体出来。这位傲慢的官老爷慢条斯理地似乎要开口训话。这个场面使我不知所措,难道甘愿听他训话不成?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张衡宇、白炳喜、张建古三人机智地从我们行列中跨前一步,严肃地向这位官老爷提出质问:看守所为什么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限制探视,不照料病号,没有卫生设施,不许看报纸;继而揭发看守所所长克扣囚粮,监房尽吃霉粮,饭不足量,每餐只一片咸菜等情况。他们三人态度沉着,据理以争,侃侃而谈,使得看守所所长惊慌不安。这位威风凛凛的司法部长无言以对,只好支支吾吾尴尬而去。他们三人在统治者面前大义凛然,令我衷心地佩服,这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

活机智和善于言词的能力。

我们向司法部长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无解决之意。我们决定成立绝食斗争委员会,由张衡宇、白炳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组成,发动绝食斗争。当时提出的条件有这么六条:不吃霉小米,生一炉火供大家使用,订一份报纸,取消夜间上锁规定,要求洗澡,能与来探视的人当面交谈。看守所所长亲自出面劝说复食,我们强硬拒绝,一再表示,不答复要求,决不复食,并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报,由社会公论。绝食坚持六天六夜,看守所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由看守所所长签名盖章,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绝食斗争胜利了。宣告复食的那天,当局担来两桶鸡蛋挂面。

这一年5月,我们在狱中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我在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了十八个月,经过几次审判,最后判我三年徒刑,当时我22岁。

在反省院的斗争

按国民党刑法规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1936年2月,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四人被转押到反省院。

为了软化政治犯,反省院的生活确实比其他监狱要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馒头、米饭,还有一碗菜,能够洗澡。在思想上,他们企图瓦解和动摇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们相信伪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进入反省院的监房,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个叛徒的自白,内容极其反动,全篇尽是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自白悔过,很明显是示范给入院政治犯作样板的。我们刚住进,院方就要我们写自白书。一个同志在厕所里偷偷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写损害党及悔过的话。我们决定按在公安总局时的供词写。我当时写的是:“14岁以前念私塾和小学,14岁随父亲到山西,失学一年,15岁读高小两年,17岁考入成成中学,读初中三年,20岁上高中。1934年因参加学术团体社联被捕。我认为社联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是相符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与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监房。

反省院规定,不准政治犯在房内谈话。我们就等巡视的看守走过后交谈;晚上睡在床上,就同挨近的人交谈,看守打开灯时装睡,看守关灯走后再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给我介绍反省院敌人统治和政治犯的状况,再就是详细考察了解我参加社联、被捕、审讯,和在看守所的斗争、工作、学习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

反省院内的秘密党(中共)支部,一方面是针对院方对政治犯所实施的欺骗软化的反革命企图,着重揭露其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加强政治犯的团结教育,提高觉悟,加强斗争意识,坚定革命信心。党支部对在被捕后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分别吸收入党、入团;对少数同志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或个人经历复杂的,视为亲密战友,受到同样信任,吸收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对一时表现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向我们靠拢,积极参加斗争;对被捕后表现不好,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关心团结的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参加斗争或者保持中立,而不变成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逐步加强,团结了政治犯的大多数,使敌人的反动措施、阴险企图受到了及时揭发和沉重的打击。

反省院找政治犯个别谈话,是常有的事。我们谈后回来和大家交换意见,互通情况。一次管理主任找我谈话,先是训斥我为何不好好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后要我背诵总理遗嘱。我东拉西扯地背不下来,遭到责骂。他还说,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涂,毫无悔过之意,你想不想出院?难道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最后罚我站两小时。回到房间,阎春荣嘱我要特别小心,院方必将对你严加监视。

如何应付写考核文章,是我们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气节的问题。院方要政治犯写出院宣言。阎春荣写的是:“我是国师学生,不幸入狱。如准出院,当回家自谋职业,自谋出路。”我写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后,继续上高中,如父亲允许,再上大学。”院方要求写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我就有选择地照抄《三民主义十二讲》里面孙中山说的一些话,应付了事。要求写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认识,我就写我没有参加

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

1936年七八月间,阎春荣向我宣布:组织上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员。从那时起,在阎春荣领导下进行党的活动,我更加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里的学习也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在阎春荣的领导下,我们三两个人一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院方所讲的三民主义进行批判。我把大家批判讨论的问题,用文字追记下来,形成批判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提纲。按照规定,凡文件、稿件必须及时埋藏在后院土堆里。我因一时疏忽,开饭时间一到,来不及转移,仍放在口袋里。不料被楼上的管理主任窥察到,立即派纠察队员来搜抄我口袋里的稿件,马上就给我上了手铐,押入禁闭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向同志们表示:“杀我的头,也不会牵连别人。”第二天即将我押送看守所。

加判五年徒刑

1936年11月初,因从我身上搜出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文稿,就将我从反省院押进看守所交法院审判。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在原判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并申言不许我上诉。判决后,就押进第一监狱执行。一进门,就给我钉上脚镣。不几天,监狱党(中共)组织负责人高举来到我身边,我向他讲了反省院的情况,他要我第一步申言有病,请求到病号监,目的是解掉脚镣;第二步争取到监狱工厂去,那里普通犯较多,可帮助他做些工作。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到了病号监,两个月后下了脚镣刑具。我与田士俊同住一个监房,我们之间谈话较多,我想他是代表组织考察我的。月余后,高举特来和我谈话,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回想在被捕的几年中,在看守所由张衡宇恢复我的共青团籍,在反省院由阎春荣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到第一监狱由高举恢复我的党籍。党组织对考察和接受一名共产党员如此严格、慎重、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重爱惜,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强。我决心利用服刑期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接触普通犯人中作社会调查,以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以便深刻

理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这样理论和实际结合,可以给自己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不以坐监狱为苦,相反,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感到很有意义。

1936年秋,山西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日军侵入绥远(省),直逼山西。日本侵略者已经成为对阎锡山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联共抗日,别无出路。1936年10月20日,彭雪枫到达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阎锡山正式谈判,建立了与阎锡山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山西当局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阎锡山应允政治犯出监抗日的要求,但不允许从监狱直接出去,要经过他所创办的训导院。

在训导院结束了三年的牢狱生活

阎锡山办训导院的目的,是想对这批政治犯灌输他的一套理论,妄图使这批人出院后为他所用。我们进训导院的目的,是争取早日出院抗日。

训导院规定进行军事训练,为出狱抗战作准备,大家都积极参加。此外,我们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书籍,根本不去过问阎锡山的那些理论。党支部组织我们作抗日宣传,我们曾排练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我扮演剧中的小伙计拉胡琴,裴世昌当主角,高首善扮演小姑娘,演出很成功。

我们出训导院后,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我去党训班前,工委副书记林枫同志给我开介绍信时,要我把名字龚允济改为龚子荣,从此我就叫龚子荣了。

我从1934年4月30日被捕进监狱,到1937年8月中旬出训导院,共三年零三个月,我的“革命大学”至此结束了。从此,我这个龚子荣紧跟着党,步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又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磨炼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工作上的失误,但我始终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于党的事业。“文革”十年浩劫,炼狱般的考验,以致我双目失明,但我仍然要坚强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责任编辑 舒元璋)

面对“九一八”： 尴尬的“国联”

● 荆其柱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沈阳东北方向一声巨响,几个日本军人将南满铁路二米长的一根钢轨炸断了,随后枪杀几个中国乞丐,给他们换上中国士兵军装。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与此同时,日军向东三省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不几日即占领了东三省大部。

“九一八”事变中,中方军队严守不抵抗命令,但与日方进行了反复交涉。日方说,这是由于中方军人炸毁了南满铁路,日军不得不自卫。对此,中方给予坚决反驳。

事实上,对日本人的阴谋,中国政府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觉察,有所判断。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时说,“最近我获得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内忧外患交迫,时局重大,中日诸问题,务须稳健处理。”

事变发生后,9月19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电报,称,“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处理,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张学良在此前后,对全军下达了不得抵抗的命令。

“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军遵照上边指令,凡日军强行进入之地,均退让而出。日军却更加蛮横,所到之处,奸掠杀烧,极为残酷,田庐为墟,市井无存。

日本国内一派狂热不堪的“胜利”气氛,但也有一种冷静的思考。日本帝国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针对日本官方的满洲事件系由中国军人炸坏铁路而引发的说法,给予了强烈质疑。在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学生与一些政党的反战游行。

辽、吉失陷后,张学良警觉起来,迅即放弃了不抵抗政策,在东北人民的要求下,他开始在黑、辽、吉三省地区改组、重建抗日政权,调整了东北军抗日部队的建制,千方百计集资组织、派遣东北义勇军,组织了十多次大的军事行动,与日军及其组织的伪军、汉奸傀儡政权对峙,长达1年3个月之久。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对日抗争,其中有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卓越的抗日将领。东北的抗日与1937年的全民抗战相衔接。

日本的全球战争策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的阴谋,有远因,也有近因。

远因是日本为了将与清朝政府签署的满蒙权益永久化。这种权益1923年已经到期。自获权伊始,日本倾全国之力强化在东三省的政治经济侵略,其满铁株氏会社是由日本政府经营的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其组成包括了日本政府的所有机构及军队,经济规模已经深入到东三省的矿业、交通、运输、海运、港口、钢铁、铁路、机械、造

船、煤炭、农垦等几乎所有产业。在这些地区驻有大量的军队。至于日本早已占领的朝鲜,成了其侵略中国的大后方。

近因是,长期把持东北的张作霖觉察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开始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并开始与西方国家交往,这些举措给极欲独霸东北的日本人火上浇油,认为是对他们根本利益的侵犯。于是在19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人没想到的是,28岁的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利诱与威胁,立即向中央政府靠拢,于同年12月果断“易帜”,表示东北三省与中国的南方是一个国家、一个整体。至此,日本决计不惜任何手段,以十分凶险的用心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阐述了侵略方略:“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日方至今也不承认,然其所作所为与之——印合)

1930年2月7日上午9时,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即东方会议)确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会上,这些阴谋家们一是策划“以华制华”的策略,挑动张学良与南京决裂,从中渔利;二是挑动东北军的新旧二派对立,以制造内乱;第三,日本要策动地方骚乱,资助各地土匪,干扰东北军,干扰地方管理。事后证明,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概出于此。在堂堂国家内阁会议上竟有如此阴谋与计划,其国格之低下,其政格之卑鄙,让今天的人们瞠目结舌。

《田中奏折》与这次东方会议确定了对中国和东南亚进行侵略的总方针。

由日本一手策划与密谋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是日本为发动对华侵略所制造的借口。只要中方干涉,日军即可以此为由大批进入出事地区,事端即可扩大。然而,中方觉察到此



国联调查团调查南满铁路被炸情况

事件是日本人设置的陷阱,未入圈套。

1930年,外强虎视眈眈,中国的军阀内乱依然不止。新军阀蒋、冯、阎大战开始,身居中华民国要职的张学良调15万精锐部队入关,平息了这场内乱,却直接导致东北军力空虚。日军趁虚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国际联盟的调停

“九一八”后的第二天,消息传到了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于1920年1月10日宣告成立的。

国联设立行政院、大会、秘书处和常设国际法院,它的基本宗旨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各国之间发生争端要提交给国联理事会进行仲裁和调解;必要时可以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换句话说,国联保证保护其成员免遭侵略。国联第二个宗旨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促进国际合作。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国联解决了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如瑞典和芬兰的奥兰群岛之争,立陶宛和波兰的维尔纽斯之争,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摩苏尔之争等,这些工作很有成效。

“九一八”后的第二天,国际联盟理事会开

会,主席里拉克斯在开幕词中,质问日本代表此事。日方代表表示这是一个地方事件,尚未得到日本政府所述情况。里拉克斯对日方代表很不满意,告诫日本代表说,日本政府应该从速采取必要处理,恢复平稳状态。下午,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表示,此事件应该由日本方面负责,“中方挑衅”之说,乃是日本方面借此为武力占领中国城池的口实。

21日,施肇基正式要求国联对日军占领满洲一事予以禁止。严肃指出,破坏世界和平、侵犯中国领土,责任全在日本。各国代表均表赞同,日方代表一再强辩。

22日,国联理事会主席里拉克斯代表理事会,向中日两国政府给予紧急警告,希望双方停止一切行动。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同意;日方代表说要等待本国的训令,不予承认。同日,理事会又提出方案,要求中日两方代表采取适当方式促使本国政府立即撤退军队,以保证两国居民与财产安全。中国代表称,此决议为采取各种办法的第一步,请国联主席持公正态度进行调查。会上,英国代表薛西尔公爵要求日本代表向国联提供此事件的报告,并对日方迟迟不提供报告表示惊异。

同日,中国代表提出声明,要求国联“阻止此种情势的扩大危及国际间和平,同时恢复原来状况。并确定中国所受之损失,应得的赔偿性质及数目。”

23日,国联行政院主席勒尔电告中国外交部,说明国联的态度。并已经将此事通告美国政府。美国国务卿同意国联的态度。

25日,面对国联一致的态度,日本想回避与国联全体的冲突。其代表称,日本政府预备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施肇基表示,日本已占领中国领土,中日直接交涉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并再次要求国联令日军撤回18日前的位置。

29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30日形成了理事会正式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即日撤退军队,在10月3日前撤退完毕,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施肇基立即表示,日军应在10月3日前全部退出,并应将所占领土交还中国政府。他提请理事会注意,日军活动并未停止,其行动与国联理事会的和平解决意愿截然相反,国联应制止

日军。日方代表芳泽又编造谎言,称日侨要求日军保护,故而不能撤军。

自从9月30日决议后,中国政府代表及时向国联递交日军在东北行动情况报告达41件,报告日军不断的军事行动。施肇基代表还指出,日本企图将东北军的飞机掠为己有,是非法的,因为这不是战争中的俘获。施代表的报告得到了德国驻沈阳领事的证实。

10月12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10月13日形成再次决议:认定由于日本未执行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国联有必要采取断然急切手段来解决。针对日本方面多次提及保护侨民而不撤军的借口,国联主席专门致电张学良将军。张学良收到后,特别嘱咐下属:“1,对日本人住所及学校严加保护,对上下学小学生也要给予保护;二,对骂日本人,须严厉取缔;三,日本人与洋车夫间为车资争论时,抑制车夫……”

然而日方代表对此又生枝端,他们提出,冲突由中日两国之间交涉解决,要求“先交涉、后撤军”。中国代表立即激烈反对,国联的理事国代表也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不先撤军,“先交涉”,将导致日军永远不撤军。

国际公理已由国联决议申明,欧美各理事国一一为中国鸣不平,许多与会代表说,世界大多数的政治家能够静听日本代表在国际会议的胡言乱语,而没有急切果断的制裁,真是不可思议。

10月22日,国联再召开大会,英国代表薛尔西称,“日本尤其应该反省自己受到国联制裁的原因,就是日本无端地侵犯中国,致成为20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的绝大污点。”此话一出,全场大鼓掌。日本大使芳泽面呈灰白,态度甚窘。接着大会主席白理安称,对于日本“先交涉、后撤军”的要求,国联大会不能承认。

10月24日下午,国联理事会续开大会,以13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代表)的表决结果,要求日本务必于11月16日前撤军完毕。此决议再次为日本方面寻找借口而否决,使国联10月24日的决议又变成了一张废纸。

在这期间,日军不停地在东北对银行、关税、邮政进行掠抢,成立伪组织、伪政权。同时,日军已经指向辽宁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锦州,指向山海关,指向长城,指向天津,指向上海,威胁南京,

完成了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准备。

对于日军频频的军事行动,欧洲的政治家已经激愤不已。英国殖民副大臣马甘说,“苟和平解决不能维持,则有极大之战事,不仅限于东北一隅。”

对此情态已经难以对付的国联主席私下对中国代表施肇基说,如果日本侵犯锦州,世界舆论必将要求国联采取最强硬行动,国联54个国家的大使将撤离东京,美国也会参加。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辽宁的临时省政府所在地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愤慨地说,“中华民国在东北南部的行政机关,在‘九一八’以前还存在着,现在已经被取消。所以美国政府否认一切以武力劫持的非法行为。”国联行政院表示,日本除侵略东三省以外,还到中国东南地区进行侵略与破坏。日军向上海集结,炮击南京。国联行政院再次警告日本立即停止攻击行动,保护租界安全,以最近国联行政院建议解决争端。对此,日本全部拒绝。

1932年1月,日本借口日本僧人与华人打斗致死,进攻上海。日本竟然将上海的公共租借地作为日军登陆地,致使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状态。

1932年2月19日,国联行政院长愤怒斥责日本代表。随后,国联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六次特别大会,一再要求日本遵守国联决议,撤退军队。

对国联一而再,再而三的决议,日本拒不执行,与国联对抗。

国联调查团的结论

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筹备赴远东调查团,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原政务次长李顿为团长,成员有美国欧战时运输司令、少将麦考易,法国欧战前驻华部队参谋长克劳德,德国殖民地专家希尼,意大利伯爵、曾任驻德国公使的马克提,中、日各一名代表,以及秘书若干。

调查团首到日本,日方政府首脑对这个调查团竭力奉迎,以博好感。

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一·二八”后的上

海。中国政府自然十分重视,以为是伸张正义、复我领土的一个机会。

新闻界主席史量才在迎接调查团时表示,相信调查团“必能给予全世界热望和平的人们以正直的答复”。

随后,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上海转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的事实及在东北的暴行,东北黑、吉、辽政府秘书长联名致调查团,表示了对国联的期待。

调查团在上海视察了战区,所见之地墙坍壁倒,遍地瓦砾;炮痕弹迹密如蜂窝,战争惨状触目皆是。调查团成员多为军人出身,自然知道这里战事惨烈,极为震惊,用调查团的话来讲,此战事的程度与欧战时期的法国西部大战相当。

一些居住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及宗教界人士专程拜访调查团,控诉日军暴行。

3月26日,调查团到达南京,会见了当时政府的外交、行政院等方面的人士,蒋介石接待了调查团一行。随后,调查团从南京至武汉,再由武汉经济南、天津,转赴北平。一路上,中国各界人士向调查团揭露日军侵略行径。

4月9日,调查团到达北平,东西长安街挂满旗帜。在调查团下榻的北京饭店,两丈宽的巨幅白布,上书中文,下书英文,一落到地。文为“欢迎公正严明的国联调查团”、“中国人民为公理而死,绝不承认丧权辱国之条约”等等。

在北平,张学良将军与各行政主管分别会见调查团,向调查团介绍了情况。闻国联调查团来北平,东北各地申诉信如雪片纷至,调查团突破了日本人的重重障碍,到沈阳和吉林进行实地考察,会见大批民众,参观了北大营。

调查团赴沈阳前,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作了大量的粉饰与伪装,甚至将正在中立医院疗伤的北大营100多名官兵,以移居他处为名加以杀害。最后,日本人干脆拒绝调查团进入黑龙江,不让调查团与中国抗日将领马占山会面。

调查团历6个月之久,编制了11万余字的文件。10月4日返回欧洲。

1933年2月18日国联召开大会,确认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再次确认了日本的侵略责任。日本忿忿然,表示要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

决议,要求国联各盟国无论在法律与事实上,均不承认日本拼凑的伪满洲组织,不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国际组织及各项国际联盟的公约,并在会议上驱逐了伪满洲国的所谓“观察员”。

25日,日本正式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据实大量地揭穿日军的侵略罪行,但调查资料有限,语言也多有含糊。国联抨击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虽代表盟约与道义,但也杂有一些私念,即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侵扰。这种现实让中国人清醒起来,对国联的作用有了重新的估计。

迷梦中的觉醒

国联主席曾经对中国代表表示,如果日本拒绝国联的决议,不从侵略地撤军,54个国家将与日本绝交。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没有作到这一点。

国联曾经宣布要对日本断绝商务来往,实行经济封锁,甚至武力干涉,最终,都由于各自的实际利益而未实行。

在国联1931年9月30日的决议为日本拒绝后,中国代表施肇基曾经动情地表示,“中国是国联忠实会员,而且信任国联,我的国家则如轮船,藉此而下碇,深信凭国联条约可以从暴风雨中驶出。国联的条约是和平大厦的栋梁,如果折断,这个大厦就会崩溃。”

施肇基的演说让国联理事国代表无不动容。

时隔一年,即1932年9月27日,继任国联中国代表的颜惠庆博士,密电张学良,称中日纷争,“中国虽有理由,但目前国联各国对日不采取强压手段,故该问题解决的有效办法,即由张将军与华北各将领及民众一致团结,与义勇军合作,在东北全境迅速举行大反攻。”

日本依然视国际公理于无物,一意孤行,攻城掠地,无所顾忌。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进攻上海时,遭到了中方十九路军的猛烈抵抗与打击。日本代表立即火烧火燎地要求国联进行调停,唯恐中国军队的反击造成更大损失。这种矛盾嘴脸,引得国联许多理事国和许多委员极大不满与嘲笑。

李顿调查团报告公布后,国联各理事国对日

本再次进行急风暴雨式的抨击,许多国家的代表要求国联必须不作任何保留、无所犹豫,以坚定公正与庄严的态度,采取果断的行动,不能以含混的态度处之;要求各列强国家援助中国;要求国联再次重申,日本所制造的“九一八”事件以来大规模的占领与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日本所说的自卫;满洲国是日本所制造的;同时要求国联加强制裁力量,保证有关决议的执行。

在如此强烈的国际公约决议与舆论面前,日本仍然蛮横无理地拒绝与对抗。发动起来了的日本战争机器,已经碾碎了国际和平的愿望与条约,轰轰然地碾向亚洲以及全球和平的土地。

中国人民在苦难与血泊中等待,得到了真实的教训,即:中国的民族解放要依靠自己,不可能依赖外人。

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抨击

“九一八”后,日军侵略事件成了国联日复一日的重要议题;同样,也成了国际舆论焦点。国际各大新闻社、各重要媒体,以极大的注意力,以公正的眼光,以历史的深度,关注着中国,不断地揭示、抨击、嘲笑日本的所作所为。其报道之频繁,介绍文章之多,其语言之尖刻,分析之深入,情理之深远,是一场空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舆论风暴。

1931年9月26日的《纽约晚报》称:“日本人著现代欧洲之衣冠,然未改变古时之野蛮习惯,其突然以武力进攻沈阳,此种狡诈、不顾国际信义的行为,犹如日本古代的酋长。”

《世界新闻社》10月10日评述,张学良自九一八后,在锦州建立临时省政府,“而日军复出断然之手段,派飞机至锦州上空,抛撒传单,宣称张学良有负东三省民众,日军以保护良民为自己职责,不承认张氏政府,故不得不推翻其公署。抛撒传单之后,以十二架飞机再扔下七十余枚炸弹。”

同年10月15日《世界新闻社》载一名记者评述:“眼下东三省所遭受的事变,其意为日本已经决定阴谋吞并东三省,日本的帝国主义计划,处心积虑,由来已久。”

11月26日《纽约电讯报》称:“日本破坏对

美国及其他国家之条约，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日本如果拥有进攻中国的权利，则美国及其他各国也可以进攻日本、炸毁日本城市、推翻日本政府、屠杀日本数千国民。”

《每日先驱报》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征服中国，

已下定决心。中国有伟大之内部力量，缓缓发动，与之周旋。其结论是，日本侵略中国，最终之结果并非胜利，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自杀也。”

1932年3月，《泰晤士报》社论论及上海事件，标题为《日本反抗世界》。

1933年英国《观察报》称，“今日世界最为可怕最为危险的事，是日本集中其势力重心巩固其从朝鲜到长城的大陆势力。日本现在已经超越其原来的目标和欲望，前进不已，不惜集全世界非议于一身。我们必须反对‘满洲国’，日本人或许能够顺应理性，或者再驶入盲途，使日本铸下绝顶之错误。则不可避免的结果，将使日本自身万劫不复也。”

1932年瑞士某报纸，要求国联应采取更强硬态度，称“国联已经正式宣布日本违犯公约，实行了侵犯而开战端，在公法上为有罪。国联纵不能以武器助中国，也应以精神助中国。日本如果退出国联，我们应当欢送之，联盟宁无日本以存，也胜于为日本而自杀。”

1933年1月6日，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科里尔周刊》发表负责讲话，称“日本似一爆炸最强烈的火药，一旦点着，势将向全世界爆炸，日本的狂妄心理，可以向国联或任何国联数国轰炸也。”

1933年英国前财长施诺登在《曼彻斯特报》著文，揭露日本的侵略亚洲野心，“日本征服了中国，就可以控制了世界最富庶国家的资源，就可以一蹴而成远东的主人翁。日本帝国主义者



国联行政院开会讨论中国东北问题

的野心如果继续发展，将会激起全世界的战争……”

时至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报道与政治家的评论，不能不说，这是国际正义与人道精神抨击日本侵略行为的一场全球风暴。这些文字牢牢地将日本的战争罪行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

结束语

日本的侵略行动未能制止，国联令人失望。各国认为中国的利益不能得到国联的保障，其他国家也只有发展军事以图自保。至此国联的约束能力已低至极点。从这个意义讲，日本的野心导致了国际联盟的衰落。英国至今发行的教科书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摧毁了国际联盟，还引发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对外扩张欲望。

“九一八”，中国没有忘记，国际也没有忘记。历历在案的历史与记录在每个正直的人面前，在每个承担国际道义责任的国家面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基于中日两国长久历史与未来和平相处的必要基础。但在一些日本右翼领导人眼里，不忘的“前事”，仍然是当年的侵略衣钵；后事之“师”，正是那些被供奉着的罪犯。

今日之日本，是否承认了战争的责任？是否清算了战争的责任？

记住历史，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 李晨）

抗战中的中国海军

● 任保军 慕 安

自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政府昏庸、外国侵略、内战连绵,中国海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建设和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艇 120 余艘,总吨位不足 7 万吨,而且普遍质量差,服役时间长,其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巡洋舰排水量为 4300 吨,已有近 40 年的舰龄。而这一期间,日本海军迅速发展,到侵华战争前实力已接近美英,共有舰艇 308 艘,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水上飞机母舰、潜水艇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等大型舰艇,总吨位达 120 余万吨,拥有舰载和陆基飞机 1000 余架。中日海军实力悬殊极大。面对强敌,弱小的中国海军,保持与发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和民族气节,与强大的日本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篇章。

突袭日军旗舰“出云”号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战役爆发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分别向闸北、虹口、江湾等地进攻。中国海军由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指挥驻沪海军部队参战。

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中国海军决定以鱼雷快艇突袭停泊在上海外滩的日本侵华海军舰队旗舰“出云”号,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江阴电雷学校鱼雷快艇大队副大队长安其邦率两艘鱼雷快艇执行这一任务。

“出云”号是日本海军侵华作战的司令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和一些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住在舰上,安全防护非常严密。因此突袭“出云”号的难度极大,危险性也很高。安其邦领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了官兵素质较高、作战性能相对较好的“史 102”号(艇长胡

敬瑞)和“史 171”号(艇长刘功棣)两艘鱼雷快艇。8 月 14 日晚,安其邦率两艘快艇隐蔽出航,但“史 171”号艇途中发生故障,安其邦和艇长胡敬瑞驾驶“史 102”号艇继续向上海方向挺进,于 15 日晚按原定计划到达上海龙华码头。

快艇一靠岸,安其邦和胡敬瑞在友军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侦查了“出云”号停泊的具体位置及江面的情况。此时修复后的“史 171”号艇也赶到上海。经研究认为,外滩江面窄,航道复杂,停泊的外国军舰、商船较多,于是决定由“史 102”号单艇出击。

16 日晚,夜幕笼罩江面。在安其邦、胡敬瑞的带领下,“史 102”号艇高速冲过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驱逐舰和英、法、意等国军舰,在距“出云”号 300 米左右的江面,以顶角 50 度向其瞄准,连续发射 2 枚鱼雷后,迅速转舵回航。由于“出云”号周围防护严密,鱼雷未能直接命中目标,但雷体爆炸使其受到一定创伤。“出云”号和其他日舰一时慌了手脚,以各种舰炮向“史 102”艇猛轰,“史 102”艇多处中弹搁浅。日艇前来搜索,安其邦和官兵泅水隐蔽在码头下面。日军走后,官兵拆下艇上能带走的武器装备,被事先安排的接应人员救走。

8 月 20 日,日军进行报复。中国海军驻沪各机关和所属单位先后被日机炸毁。正在江南造船所修理的“永键”号炮舰被炸沉没。这是抗战中中国海军损失的第一艘军舰。

中国海军没有屈服。9 月 28 日,中国海军获悉日本海、陆军和外交首脑在“出云”号上召开军事会议,海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和一批军政高官住在“出云”号上,决定再次袭击“出云”号。

此次袭击决定改用水雷攻击。布雷兵王宜升、陈兰藩自告奋勇积极请战。当晚,他俩携带3具水雷泅水靠近“出云”号,准备破除防雷网时,惊动日军,王、陈二人引爆水雷后,迅速撤离。水雷炸伤了“出云”号的尾部及周围4艘铁驳船和一艘小火轮。此后,中国海军又两次用水雷袭击“出云”号,但都未能成功。

战前,日方分析认为中国海军根本不可能对日本海军构成威胁。而“史102”号鱼雷快艇敢于对“出云”号发动鱼雷攻击,中国海军士兵敢于泅水用水雷对日舰进攻,让日本海军大为震惊。1982年,日本《世界的舰船》杂志第二期刊登了瀨名尧彦《扬子江上的战斗》的回忆文章,称“史102”号鱼雷快艇对“出云”号发动的鱼雷攻击,“是中国海军唯一的一次积极攻击手段”。

中日海军一场惨烈的海空对战

为防止日本舰队溯江西上进攻南京,中国海军在江阴以大量沉船、石料在长江上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阻塞线,日本舰艇无法越雷池半步,只好派飞机对江阴要塞和中国海军舰艇进行轰炸。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平海”、“宁海”、“逸仙”、“建康”等主力舰艇,与地面防空炮火配合,与日本海军飞机展开了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海空对战,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海空对战。

1937年8月16日,日本海军飞机开始分批向中国海军各舰进行空袭,“平海”、“宁海”、“逸仙”、“建康”四舰列阵用高射炮、高射机枪与江阴要塞的地面防空炮火构成火力网对空射击。22日,日本海军出动12架飞机再次袭扰江阴,从不同方向肆意对中国海军舰艇投弹、扫射攻击。中国海

军舰艇和地面炮火猛烈还击。“宁海”舰枪炮官陈嘉榘、枪炮员刘崇瑞紧紧盯住一架俯冲的日本飞机,突然同时开火,日机拖着长长的黑烟栽进了长江里。这是中国海军在抗战中打下的第一架日本飞机,也是中国海军史上以舰艇炮火打下的第一架飞机。

恼羞成怒的日本海军连忙抽调100余架飞机,对中国海军舰艇进行残酷的报复性打击。9月22日,日本两个航空队出动飞机34架次,对中国海军舰艇进行长达6个小时的密集轰炸。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海军第一舰队旗舰“平海”号和击落日本飞机的主力战舰“宁海”号。“平海”号舰长高宪申冒着弹雨指挥官兵奋起抗敌,腰部受伤,但他忍着剧痛,坚持指挥全舰官兵对日机作战,直到打退日机进攻为止。一等炮兵周兆发被弹片击中,伤势非常严重,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战位,直到接替他的炮手赶来,才倒在甲板上壮烈殉国。是役,“平海”舰发射高射炮弹265发,高射机枪子弹4000余发,与兄弟舰艇击落击伤日机5架。但“平海”、“宁海”两舰也受重创。

第二天,日军侦察机发现中国海军舰队依然阵容严整,于是气急败坏地出动飞机90架次,对“平海”、“宁海”两舰进行轰炸。中国海军官兵以血肉之躯向日军发起了最顽强的抗击。高射炮弹打完了,就用练习弹打,练习弹打完了,就用高



1937年9月23日,宁海舰于江阴血战中,战至炮弹告竭中弹下沉

射机枪、冲锋枪打……“宁海”舰机关枪指挥官刘馥双手提起炽热的无架机枪向日机猛烈开火,双手烫出一层血泡竟全然不知;“平海”舰枪炮上士陈永相被炸得面部血肉模糊,仍然不离开岗位……“平海”舰中弹倾斜,中国海军官兵全无畏惧,继续向日机射击,直到把炮弹打光为止。军舰倾斜20多度时,官兵才把舰上炮械和重要部件拆下来撤离。这次战斗,中国海军击落日机4架,击伤多架,而“平海”、“宁海”两舰相继沉没。

一位特许观战的外国顾问看了这场血战之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中,在欧洲战场上,也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恶战。

9月25日,“逸仙”舰在江阴执行防守任务。突然16架日机猛扑过来,对“逸仙”舰轮番轰炸,官兵们用仅存的几枚炮弹击落了两架日机后,中弹倾覆。“建康”号奉命前往救援,遭十几架日机围攻,“建康”舰用数挺高射机枪猛烈抵抗,但舰体8处中弹,迅速沉没。之后,“楚有”舰、“应瑞”舰及“青天”、“湖鹏”、“湖鹗”、“江宁”等艇在与日机激战后,相继被炸沉没。不久,中国海军主力舰艇损失殆尽,但中国海军官兵并没有屈服。他们把被击沉、击伤舰艇上的舰炮拆置到岸上,组成炮队继续对日军作战。

唯一的舰对舰海战,中国海军取胜

虽然中国海军根本无法与日本海军相抗衡,但装备陈旧、武器落后的中国海军,却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在广东沿海与强于自己数倍的日本舰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海战并取得了胜利。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派遣部分舰艇和飞机侵入华南,企图对中国实施封锁。当时,国外援华物资80%都是从香港、广东沿海进入国内的,广东沿海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最重要的物资补给线。1937年8月,中国海军在广东主要港口实施阻塞工程,共沉船158艘,雇用民船布设水雷,并派出舰艇在各港口担任警戒。当时,中国海军在广东只有“肇和”、“海周”、“海虎”、“江大”、“舞凤”、“海维”等少数舰艇。吨位最大的“肇和”舰,排水量2600吨,1909年由英国建造,已有近30年的舰龄,且以烧煤炭为动力,装备、武器相当老旧,其它的都是小型舰艇,力量薄

弱。

为了切断援华补给线,日本海军从1937年9月开始向广东发起进攻。9月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东沙群岛。13日,日本海军在大鹏湾登陆。为了配合陆地进攻,14日拂晓,一支日本海军舰队向虎门方向袭来。中国海军利用沉船阻塞线、水雷防线和岛屿,依托岸炮,巧妙迎敌。当日本海军舰队接近虎门时,“肇和”、“海周”等舰展开作战队形,迎着日本舰队冲了过去。日本舰队司令官松井不屑一顾地说:中国烧煤的舰艇出来了,他们怎么还敢与强大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对抗?日本舰队的大口径火炮向中国舰队开火,但中国海军官兵毫不畏惧地开炮还击。此时,日本舰队已经进入了岸炮的射击范围,虎门炮台迅速向日本舰队猛烈开炮,火力支援“肇和”、“海周”等舰。霎时间,海面上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日本舰队对突如其来的岸炮打击不知所措,一时慌了手脚。突然,隐蔽在一侧的中国海军鱼雷快艇、炮艇高速冲向日本舰队,近距离向日舰发动鱼雷、火炮攻击。很快一艘日本驱逐舰中弹起火,冒起了浓浓的黑烟,其它三艘日本军舰也不同程度的受伤。见大势已去的日本舰队,只好护着起火的驱逐舰仓皇逃走了。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的海战,中国海军舰艇击退了日舰的进攻,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此后,日本海军再也不敢以舰艇向广东沿海进犯,而凭借空中优势,对中国海军舰艇及沿岸设施进行轰炸。“肇和”、“海周”、“海虎”、“江大”、“舞凤”、“海维”等舰艇相继被炸沉没。

中国海军与敌短兵相接鏖战12天

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退守武汉。长江下游的田家镇成为扼守武汉至关重要的一道防线。为了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中国海军拆除了从九江到田家镇的所有航行标志,沿江布设水雷1000余具;设立田家镇炮台。炮队以彭瀛为队长,共有海军官兵197人。

1938年9月18日,两艘日舰驶到田家镇附近活动,田家镇炮台的海军官兵奋起炮击,两艘日舰先后中弹逃走。20日清晨,6艘日军舰艇掩

护 11 艘汽艇向田家镇扑来,企图深入雷区扫雷。田家镇炮台的中国海军官兵,冒着炮火英勇抗击。日军又增派了驱逐舰、炮舰各 2 艘前来支援。10 余艘日舰集中炮火向田家镇炮台猛轰,弹丸般的田家镇立即火光冲天,爆炸声连成一片。队长彭瀛带领官兵冒着猛烈的炮火,依托阵地工事,向江面上的日舰不停地发炮。激战竟日,日军无法靠近雷区。

第二天天还没亮,14 艘日军汽艇企图乘中国海军官兵不注意进入雷区排雷。当日军汽艇靠近雷区时,田家镇炮台突然开火,密集的炮火一下子就击沉汽艇 8 艘,其余 6 艘连忙逃了回去。9 月 22 日,日军 10 余艘浅水炮舰和驱逐舰掩护大批汽艇再犯田家镇。中国海军官兵沉着应战,越战越勇,炸沉 4 艘日军汽艇,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海军的嚣张气焰。

日本海军屡犯田家镇炮台受挫,遂改向攻占了长江南岸的富池口,北岸的田家镇炮台失去策应,完全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28 日,日军 20 余艘汽艇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向田家镇再次发起了疯狂的进攻,炮台的主要工事全部被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 1000 余人强行登陆,扑向田家镇炮台。中国海军炮队官兵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几次冲上了田家镇炮台阵地,中国海军官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硬是把日军打了下去。当晚 7 时,日军向田家镇炮台发起总攻,中国海军炮队官兵伤亡惨重。至此,炮台与外界通信全部中断,弹药消耗殆尽,炮台官兵流着泪撤出田家镇炮台。29 日凌晨田家镇沦陷。

日军向田家镇进攻期间,平均每天向田家镇炮台发射炮弹 500 多发,日机总共投弹在 1000 枚以上,炮台

的所有掩体、工事全部被炸毁。田家镇被日军围困后,炮台上弹药得不到补充,缺少食物,没有饮用水。就是在这样残酷、恶劣的条件下,不足 200 人的中国海军炮队官兵与数倍于己的日军鏖战了 12 天,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才奉命在友军的帮助下撤离了田家镇。

中国海军布雷队让日军闻风丧胆

日军攻占武汉以后,掌握了长江的控制权。中国海军决定在长江展开敌后水雷游击战,切断日军侵华战争的后勤补给线。

1940 年初,中国海军成立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以刘得浦上校为总队长,下设 5 个中队,11 个分队,在湖口至芜湖段开创第一布雷游击区。之后又开创了第二、第三布雷游击区。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长江上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消耗与反消耗的殊死斗争。

1940 年 1 月下旬,各布雷队进入任务区,在友军的配合支援下,白天化装潜入江边侦察,晚上雇请民工运送水雷到江边实施布雷。1 月 20 日,海军布雷队发现日军舰艇在贵池一带江面活动频繁,于当晚在贵池两河口布下漂雷 15 具,一艘日军汽艇触雷沉没,艇上 10 多名日军毙命,多人受伤。次日,又有一艘日军运输舰在贵池、大通



海军布雷队登艇出发



被炸沉的日本舰艇

间触雷沉没。至2月初,仅10几天的时间就先后有日海军运输舰、汽艇、运输船在长江中游相继触雷沉没。

日军的失利增加了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的信心和勇气。2月18日夜,海军布雷队官兵冒着大雪,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湖口江段迅速布下漂雷77具。第二天一早,一艘满载日本步兵的运输船触雷沉没,当即炸死日军140余人,伤40余人。日军一艘汽艇前往救援时,又触雷被炸沉没,死亡30余人。

日军第一次攻打长沙失利后,筹集了大量前方急需的物资,由大型运输船“凤阳丸”号运往武汉。船长山田龟二身经百战,驾船去过世界各地。出发前有人提醒他,在长江上一定要对中国的水雷多加小心。但山田根本没有放在心上。1940年3月上旬,“凤阳丸”号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长江,顺利地通过了下游。到了南京,有人再次告诉他中国海军的布雷队非常活跃,但不可一世的山田龟二还是没有把布雷队放在眼里。3月19日,“凤阳丸”号逆江上行,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漂浮在水面的水雷。正当前方一片开阔,山田龟二松了一口气时,“轰”的一声巨响,隐蔽在水下的定雷爆炸了,跟着船上的弹药也炸了起来,很快“凤阳丸”号就在爆炸声中沉没,这位不可一世的船长也随船葬身江底。

对于中国海军开展的水雷游击战,日军感到十分苦恼和无奈,也想了种种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5月22日,日本海军长江舰队司令部不得已下发了4条训令:一、禁止集结航行;二、凡行

驶芜湖以上商船须由兵舰护航;三、舰轮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间;四、凡舰轮行驶芜湖上游时须加速驶过,违者苛以重罚。虽然日军倍加小心,也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但基本上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舰船触雷沉没,损失极大。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吉川来中国采访时,专门写文章警告日本海军一定要重视防范中国水雷的袭击。日本读卖新闻社的著名随军记者若月就是在乘舰采访中,被水雷炸沉随舰死亡的。在打捞其遗物时,日军发现了一本“长江作战日记”,上面尽是

描写中国布雷队神出鬼没、水雷游击战防不胜防、长江上的水雷如何如何可怕的文字。

日军对中国布雷队恨之入骨,于是加紧对布雷游击区的扫荡,同时张贴告示:对提供中国海军布雷队行踪的人给予重奖,发现1名布雷兵赏大洋500块,发现1名布雷军官赏大洋1000块。1940年6月,布雷队侦察员陈木生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时,由于汉奸出卖被日本海军抓获,日军对陈木生用尽了一切最残酷的刑罚,但陈木生坚强不屈。日军竟残忍地用锯将他活活锯死,抛尸江中。日军的残忍,激起了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的极大愤慨,他们的斗志越来越高昂,作战越来越勇敢。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湘北会战,沿江运输频繁,中国海军布雷队协同友军守卫长沙,加紧了敌后布雷游击战。9月28日晚,中国海军两个布雷大队在行动时被日军发现,布雷队官兵冒险突破日军火力封锁线到达江边,发现事先准备用于布雷的小船都已无影无踪。大队长林遵带领官兵跳下江去,泅水推雷入江布放,天亮前完成了布雷任务。但当他们泅到北岸时,发现已被日军占领,而南岸的日军也源源不断向江边涌来,中国海军布雷队36名官兵被围在江边,之后被冲散,潜伏在芦苇丛中。日军派出汽艇在江中搜索,用机枪向芦苇深处扫射。林遵、程法侃等12名官兵在江边潜伏5天后逃回部队,其他24名官兵下落不明。

海军布雷队的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专门给海军总司令部及各战区司令长官发了手谕:以我军采取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

通,消耗敌人力量,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飭各战区长官转飭部队,对于布雷官兵要特别保护。之后,海军又从陆军抽调了一批素质较高的士兵,经过短期培训后,补充到海军布雷队中。

据不完全统计,从开展布雷游击战到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仅第一游击区就布雷1370具,炸沉日军大小舰船114艘,伤亡日军5000余人,破坏其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战果辉煌。

宝岛60年前被中国海军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侵华日本海军开始在南京、武汉、青岛、上海、厦门、广州、台湾等地向中国海军投降。

在南京、武汉等地的接收工作很快就展开了,但接收台湾的工作却没有马上进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强行霸占,到抗战胜利已经整整50年。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人民饱受日本殖民主义的迫害和摧残。如今抗战胜利了,中国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接管台湾海防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重要象征。9月底,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电令,由正在厦门接收日本海军的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少将去台湾负责接收日本海军的工作。

1945年10月初,重庆方面宣布,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统一领导接收台湾的工作。陆军第70军军长陈孔达、62军军长黄涛,空军中校张柏寿、林某,分别在台北和台南负责接收日本陆军和空军,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负责接收台、澎日本海军。

李世甲赶到福州,即在福州《中央日报》上发布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命令,通知所有旧海军人员回军服役。几天后,审查录用请求重新归建的旧海军官兵200余人。之后,李世甲命令海军陆战队第4团团长达熙愉率该团和海军布雷中队及新征录用的旧海军官兵共1500余人,于10月16日乘20余艘大帆船出发驶向台湾。19日晚,李世甲率队乘“海平”号炮艇到达基隆,第二天一早进入台北。

李世甲一到台北,就立即给日本海军驻台湾司令长官福岛中将下达了命令:(一)尽快出具台湾日本海军投降官兵的花名册,对日本海军在台湾的所有舰艇、炮械、弹药、财产、物资以及各种档案、图表、文件资料等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听候中国海军点收。(二)禁止日本海军与外界通信联系,所有电台均由中国海军负责监视,人员不得随意走动,等候集中收容遣返。(三)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在台湾海峡及各港口所布的水雷,要尽快排除,不得有任何遗漏。

1945年10月25日,是一个永远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上午9时整,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隆重举行。坐在主席台上受降的是以陈仪为代表的9位中国高级官员,主席台两边坐着来自美英法等盟国的来宾和中国方面的其他官员。在主席台的正对面,坐着代表日本投降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等日本陆海空军将领。陈仪在仪式上宣布: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霸占50年的宝岛台湾,从今天起正式回归祖国了!顿时上台台下一片欢腾。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受降之后,中国海军开始了对日本海军的接收工作。李世甲任命参谋长彭瀛为台北地区接收日本海军的负责人,并保持与行政长官陈仪的联系。在基隆港设立办事处,负责接收在基隆的日本海军。并派海军陆战队及布雷队进至左营军港,令该港日本海军司令黑濑贺少将把武器、物资悉数交出,所有日本海军官兵送入战俘营,等待遣返。11月初,李世甲率部队渡海到澎湖列岛接收马公港和左营港,并设立了马公办事处,负责接收澎湖列岛的日本海军。不久,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决定成立台澎要港司令部,任命李世甲为司令,下设台北、基隆、马公三个办事处和马公造船所。至此,中国海军接管了日本在台湾的全部基地、港口、装备、设施,并承担起台湾沿海的全部防务。

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虽然中国海军力量太弱,无力与日本海军正面交锋,也没能阻止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并沿长江向内地进犯,但对抗击日军,迟滞日军侵略速度,以至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责任编辑 李晨)

三五九旅南征记

● 王人广

1944年11月,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由延安出发,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到1945年8月抵达广东省北部地区,执行在华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进军途中战胜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越过了山岳河流的险阻,克服了严寒酷暑和饥饿病伤的困难,辗转行程一万余公里。毛泽东称赞他们的南征为“第二次长征”。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359旅南征60周年。特写此文,以兹纪念。

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1944年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胜利地发展。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为了打通补给东南亚各地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兵数十万,丢掉了华中、华南、西南的大片国土。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则展开了大规模的局部反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发展南方的战略决定。

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于10月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10月3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和湘赣的问题。在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

这时,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屯垦练兵。为了更好地完成南下任务,毛泽东向王震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形势,并进一步地交待了任务。毛泽东说:当前不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中国革命空前有利,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国共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要胜利,中国人民要解放,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目前,我们就是准备如何迎接胜利。但是,战争还要打下去,战区还可能扩大。美国的强大海军可能在菲律宾登陆,切断日本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队就只有打通大陆交通线。现在粤汉路日军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的企图,下一步还可能进攻贵州、四川、云南。这样,战争也可能还要打两三年。一旦美军迫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就可能从印度支那、暹罗、缅甸后撤,从华南收缩兵力,退守上海、山东和辽宁。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毛泽东进一步对王震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作为中央的部署之一,是由你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并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到山东等地沿海地区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线,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为了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部队在南征前

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在敌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0月25日给训练班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



1944年11月，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征

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应该这样做。其次，连以下干部学习《军队政治工作》等文件，并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此外，给部队补充了武器、弹药、服装、粮食和经费。

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参加南征的主要领导人列席会议。会议决定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8人组成支队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王震为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为支队政治委员。支队下辖4个大队，共4200人。359旅留下的部队，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中央派往鄂豫边区工作的干部900余人，编为两个大队随同支队南下。

南下支队誓师出征

1944年11月1日上午，南下支队全体人员集中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举行誓师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部队。毛泽东勉励部队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

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用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全体指战员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王震带领全体南征战士庄严宣誓：“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1月10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踏上征途。

支队离开延安后，经延川县到达清涧，休息了三天后进驻绥德，准备东渡黄河。在这里，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再次进行政治动员，并布置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11月20日，支队离开绥德，次日到达黄河岸边，然后渡过黄河进入晋绥边区。为了查明前进路上的敌情，支队在边区吕梁山区的刘家会停留了七天。11月30日，支队从刘家会出发，冒雪通过离（石）临（县）公路和离（石）岚（县）公路，到达离石县的鸦儿崖，准备越过同蒲铁路。

日军在同蒲铁路沿线及其附近派有重兵把守。同时阎锡山所部在孝义县兑九峪一线构筑工

事防备支队越境。12月2日,王震、王首道请示中共中央“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4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事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支队绕开阎军防区,从日军控制的汾阳、平遥地区越过同蒲铁路,在过路时打退了日军铁甲列车的阻拦。

越过同蒲铁路后,不久即进入晋南的太岳山区,准备南渡黄河。行军中由于天下大雪,异常寒冷,支队多人冻伤,脚部冻伤残废者30多人。经过侦察发现,在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黄河渡口已结成厚二尺、宽一公里的冰桥。12月27日,支队顺利地越过冰桥,到达黄河南岸,当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喜讯。30日,毛泽东复电王震、王首道,庆贺南下支队经过50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并指示:“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环境决定。”

越过黄河,支队便离开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河南地区。河南省境内的平汉铁路以西的日军占领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有30至40公里的间隙地带。在此间有地主恶霸、封建帮会组织的杂色武装盘据。支队决定对这些武装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在支队通过这一地区时,他们大多让开了通道。但是,当12月29日支队在千秋镇附近通过陇海铁路时,受到了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所部的阻拦,当即将其击溃。当天下午,支队徒涉了冰冷的洛河。31日,支队进到宜阳县境内,度过了1944年除夕和1945年元旦。这里的群众十分贫困,支队大部分连队以小米粥加红萝卜度过了新年。

经过在日军与国民党军间隙地带的10天行军,支队逐渐进入了敌占区。1945年1月7日,在鲁山城西之耿集附近,打退了日军百余人及坦克、装甲车7辆的阻拦。支队第3大队以一个加强排占领有利地形坚决抗击,掩护主力通过。在战斗中,全排有18人牺牲,其中战士杨正春以手榴弹炸毁日军3辆坦克后英勇牺牲。此后,支队经过几天的雪地行军,通过日、伪、顽结合部,到达确山县的仪封镇,16日,在确山县以西的瓦岗寨附近击退了与支队遭遇的百余名日军。19日,

支队在确山以南越过了平汉铁路,26日,进入新四军第5师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

南下支队与新四军5师会师

南下支队于1月23日、25日,先后徒涉淮河和蕲河后,向豫鄂边境进发。当支队接近鄂北礼山县(今大悟县)三里城,正准备与新四军5师派来的接迎部队会合时,突然受到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的阻拦。两军部队当即共同对日军发起攻击,迅速全歼日军。两军会师共同打了胜仗,真是双喜临门。

1月27日,支队到达礼山县的下家河。在这里,王震集合全支队人员讲话。他强调说:现在我们就要同兄弟部队新四军第5师会合了。5师的战友们在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同豫鄂皖湘赣人民一起,在敌后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创造了中原解放区。他们已成为不可战胜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王首道向部队讲话,宣布了有关注意事项,要求部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注意向新四军第5师的战友们学习,搞好团结,并肩战斗。

1月29日,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5师举行会师大会。李先念首先致词说:“八路军老大哥在北方打了许多胜仗,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我们5师总想学,但是在见到你们之前总也学不像。这一次同志们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学,加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接着王震讲话,他风趣地说:“同志们,昨天我留着一脸大胡子,好像个老大哥的样子,今天我把胡子一剃,实际上只算得上个小弟弟。”场上发出一片掌声。王震接着说:“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这次南下和新四军5师会合,决心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成为5师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就加入5师了。我们决心狠狠地打击敌人,保卫鄂豫边区,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后去!”王首道也讲了话。大会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

随后,南下支队向5师和边区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全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17天,接着又踏上新的征途。

2月14日,南下支队告别了5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向鄂南挺进。5师派第14旅旅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第40、第41团配合南下支队渡江和在鄂南建立敌后根据地。此时,长江两岸主要城镇和要道均为日军控制,其余地区为土顽盘据。南下支队的先遣部队预先在黄冈及其以东准备好渡江器材,并控制了滩头阵地。支队主力则于19日至23日分批顺利地渡过长江,接着迅速南进。

支队渡江以后,被日军发觉紧紧追赶。2月26日下午,大冶日军300余人尾追支队至大田畈。支队命第1、2大队与日军激战至午夜,歼敌百余人。支队伤亡30余人。1大队2连连长朱新阳身先士卒,夺敌马刀杀伤敌10余名,身负重伤后壮烈牺牲。

大田畈战斗后,支队继续南进。在张体学部协同下,3月3日一举攻占大幕山,6日又攻占金塘、大源。支队计划在湘鄂边界地区工作一个月,准备夺取平江、浏阳建立小型后方。支队在金塘、大源休息10天后,分两路向平江开进,3月26日进占平江城。

支队占领平江后,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群众奔走相告:“当年的老红军又回来了!”支队将占领平江的喜讯报告中共中央。3月30日,毛泽东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力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你们究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电报强调指出:“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31日,毛泽东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占领平江、崇城及人民欢迎你们之

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然后再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根据原定计划和当前情况,南下支队决心在湘鄂赣边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南发展。遂将南下支队番号撤销,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下简称“抗日救国军”)。将原4个大队扩编为5个支队,并颁布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以此向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地表达抗日救国军的性质和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聂洪钧为行署主任,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军区下辖湘北、鄂南两个军分区。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地执行进剿抗日救国军的计划。平江城陷入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合击之下,抗日救国军不得已于4月15日撤出平江城,并将部队主力分散到岳阳、临湘、平江、通城和崇阳之间广大地区内,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



1946年8月31日,南下支队胜利返回延安

级抗日人民政府和地方武装。国民党顽军合击平江扑空后,又举兵北犯。抗日救国军给顽军以重大杀伤后,暂时向鄂南地区转移。为了巩固和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边区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将鄂南划分为4个分区,边区党委转移到咸宁、崇阳和蒲圻地区工作,并决定王震率主力一部挺进到湘中之湘阴到衡山铁路两侧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

1945年5月10日,王震率部由鄂南出发,沿粤汉铁路东侧敌占区前进,16日进至平江以西的栗水港地区时,国民党顽军4个团阻住去路。王震即率部队返大云山、茨姑山展开剿匪作战,待机南进。5月下旬,抗日救国军占领大云山之后,国民党顽军两个师向其发动新的进攻。6月6日晚,部队与顽军1个师遭遇,激战一夜,终于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2支队支队长陈宗尧腹部中弹牺牲。

6月下旬,王震率部由湘北地区再返鄂南。部队自从来到湘鄂赣边以来,一直处在同国民党顽军反复周旋中。天气渐热,指战员们感到十分焦虑。这时,得到中共中央及时的指示。6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的长篇指示电,电文摘要如下:

“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扩大解放区,综合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的有利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

“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切,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的地位,甚至被迫北返的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

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

“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结,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唯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

抗日救国军挺进华南

湘鄂赣边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第3支队留在临乡以东之茨姑山执行协助鄂南发展湘北的任务,主力部队即刻向南进军。7月5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并告,继续南下的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南下部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并获悉359旅第2梯队已出发南下,又听到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部队在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以后,冒着江南酷暑,于7月7日开始了向湘粤赣边区的长途进军。

南进部队从鄂南的通山、咸宁地区出发,沿粤汉铁路两侧经蒲圻、崇阳、临湘、岳阳、湘阴、平江、长沙、宁乡等县,于7月30日进至湘潭以南的上方桥一带。在这里,决定将第4支队留在湘潭地区发展抗日武装,主力于8月5日继续南进,从湘潭、衡山间渡过湘江。在进军途中,接到了毛泽东7月22日发出的指示电:“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

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

8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慰问：“祝贺部队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20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告知王震、王首道部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部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广东区党委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的兵力及领导，并从东江纵队派出一有力支队，于半月至一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美国也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

8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南下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欢庆抗战胜利声中，继续火速南进，至攸县地区时，受到国民党顽军的阻击；进至永新东北地区时，又受到国民党顽军的进逼。为了摆脱顽军的追堵，继续南进，乃转道东南，翻山越岭，冒雨行军，于8月17日进到桂东西南的八面山。国民党顽军又集中了8个团的兵力围攻八面山。部队于19日夜越山岭，走小路离开了八面山，24日进入江西省境内的崇义地区，并继续向汝城、仁化地区前进。25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部队接着摆脱了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和追击，进入粤北之南雄、始兴地区。

这时，广东区党委所派之东江纵队一部已开始北上，前来迎接南下部队。但在此时，南进部队的困难处境愈加严重。国民党顽军从南北两面围追堵截。南进部队就地立足困难，继续前进又不可能。于是决定挥师北返，并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29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

部队在北返期间，继续受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穿过江西、湖南两省边境的崇义、桂东、永新、莲花、萍乡、浏阳、平江等县境，经过24天的艰苦行军，于9月23日返回鄂南地区。接着渡过长江，胜利地回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5师第二次会师。

9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王震、王首道：“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5师主力会合，甚亟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王震：“南支在王、王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

（责任编辑 李晨）

敬告读者

2004年合订本已装订成册，请速汇款邮购。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2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1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2000年精装 无； 简装 70元

1999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 袁伟时

20 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 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 4—5 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 年举内债近 8 亿,外债约 10 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决定性的是经济。

1928 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 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 年以后,直到近 20 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海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

参加 WTO 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

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疑难杂症的百宝箱,惟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

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与传统思维方法结合,演出连台好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非此即彼。你主张吸收西方主流文化吗?准要骂你是买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追究你姓社还是姓资!说不定再加上一顶卖国帽子。认识的分歧,提升为政治对立。虽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风余韵不可低估。

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 1/6 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 1/3。今天则分别是 22%和 10%。说起来更令人心酸的是,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相应的数字是 25%和 5%。

落后了,怎么办?要是说 19 世纪的中国人还

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时至20世纪,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几近绝迹。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性化解,卫道心切。有的则热衷追赶时髦。他们染上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国心态。不过,现实是这样无情,不建立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就无法告别落后,摆脱困境。

什么是现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缺一不可。这些制度和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人们结合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而与实行什么主义无关。

中国人渴望统一。其实,随着大陆推行市场经济,海峡两岸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统一进程早已开始。形势比人强,政治家的作秀,挡不住这个进程。参加WTO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助推器,长远看无疑将造福所有中国人,促进两岸融合。

当然,光这样也不可能万事大吉。竞争如此激烈,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发展,非完善制度环境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澄清吏治、扩大个人自由;而这些又要民主政治为之保障。

不管姓社姓资,要富强、统一,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这是百年中国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均8%—9%,可谓不俗。考虑到在中间又恰逢世界经济大危机,则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1) 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大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2) 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3) 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民间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公民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4) 蒋介石政府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日中国远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一些善良的朋友开出种种药方,希望对救治时弊有所裨益。这些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应该考虑的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有的着眼于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后现代理论、道德规范,如此等等。应该提醒这些朋友不要忘记三个情况:1、20世纪上半叶的统治者,无不口口声声子曰诗云,中华道德文章,世界第一。2、我国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任何族群都无法割断传统;加上现代公民意识觉醒,价值取向成了不容干涉的私人空间;靠思想文化如何凝聚统一?3、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没有健全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各种思想观念无所附丽,亦无从传播、讨论、发展。

“经济改革”大约是目前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这当然是好东西。睿智如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撰文指出:不是资金、科技,而是制度才是决定因素。不管政府的意愿如何,资金和人才总是在国家和地区间流动。流向自由,流向法治,流向美好的环境,流向廉洁、高效的管理。

“环境保护”,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科技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资金也不可缺少。但关键仍在制度。中国的环境为什么破坏得如此严重?

首先,没有确立健全的民主和法治制度。一个代表(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讲人口问题,居然成了弥天大罪!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议员(代表)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是不受追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的一些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带来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那时我们在“人多,热气高”的吆喝声中,多生了几亿中国人。要活下去怎么办?造田!湖泊,山林,草原,江河,一一遭灾。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建立了一个命令经济体系。那时领袖和领导的指示就是真理。于是,大跃进、大干快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界史上罕见的资源、环境稀奇古怪的大破坏,一一见诸神州大地。时至今日,不少地方,我以为仍是

权比法大,领导拍板,环保部门不敢说话;加上黑箱作业,公民和传媒即使有勇气也无从监督。

再次,资源、财富,那时样样公有,常常又无人负责,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不花白不花!许多是掠夺式经营,化公为私,哪里还顾得上环境?

第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关起门来我最大。老子的制度无比优越,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与我无关。翻一翻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报刊,领略当日嘲笑别人的豪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这种闭关锁国,文化教育不发达,目光短浅的弊端,时至今日也并未绝迹。

所以,我以为我们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学不到足够的东西,不是勇敢地去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地“与国际接轨”,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我国的建设成功率不会很高。

(转自《 改革内参》2005 年第 10 期)

(责任编辑 杜 晋)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6.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陋室漫笔	靳树鹏	21.8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5.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红色第一家族	马社香	30.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 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

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 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 1600 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陈独秀风雨人生》 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 60 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 30 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在刚过去的 20 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红墙大事》 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 20 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城乡身份推算

● 吴 思

2005年春节前后,我参加白南生教授组织的农村调查,追访十年前访问过的300位进城打工农民。在四川渠县的三个村庄,我访问了17户人家。问卷上有近百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农民还是工人?

结果,无论是建筑小工,还是外资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无论是牙医,还是小老板,他们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是农民,乡下人。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回答。我追问每一个访谈对象:十多年来,你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靠务工或做生意养家糊口,脱离了土地,甚至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农民?就凭户口本上那张纸?

一位在成都当油漆工的小伙子答道,我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那时我就要回家种地。我问:城里人也可能失业,那么多人下岗了,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他说,那可不一样。城里人有房子,开销不大,失业了心里也不慌。我们在城里没活干了,整天花钱不挣钱,就得赶紧回乡来。

实际上,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死抠户口本。我们访问了一个紧邻小镇的村子,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已经并入街道居委会,所有村民都转为城镇户口。但我访问的户口意义上的城镇人依然说自己是农民。一位在一家深圳公司“跟单”的基层管理人员,操着一口广味的普通话,给出了和那位油漆工一样的理由:我没有工作就要回家种田,老板不要我了也不算下岗。

顺着他们的思路想下去,假如他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失业后也算下岗,因而得到救济,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会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下岗后也未必都能得

到救济。他们的本意似乎是强调一道底线: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如果要成为城里人,那么,即使遇到一时困难,也必须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城市工作的总收入应该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总支出。

追到这一步,我忽然冒出一个猜想:说不定这是一道关于身份认同的条件的公式,即:城市收入 $\geq$ 城市支出。一旦条件成熟了,这道公式成立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为城市身份认同。当然,所谓收入和支出应该覆盖整个人生,“收入”应该指人生总收入,“支出”应该指人生总支出,包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有城市住房意味着日常开支的下降,有失业救济意味着收入增加。收入增加这边还可以包括工资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个人素质提升、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等项内容。支出下降这边可以包括城市学校借读费降低、医疗费用下降、城市棚户区或曰贫民区的合法化等项内容。

从我访问的样本来看,这道关系式很难做平。更准确地说,在我负责的一次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在过去十多年里,这个村只有4%的人家可以做平,他们或多或少发了财,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不会再回农村续走人生之路了。至于绝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农村,他们身份认同也死死贴住农民。对他们来说,用城市打工收入支持他们在城里安家、买房、供孩子读书,同时给自己留下养老金,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其实,深入追究下去,这些人对农民身份认同也是一种错觉。在当代四川农村,如果没有进城打工的收入,农村收入真能支撑农村生活的开支吗?即使一部分人目前可以,一旦进城打工者大批归来,就凭人均六七分的那点田地,连糊口都难,

更别提盖房结婚和送子读书了。

传统的“农村收入 $\geq$ 农村支出”已经无法成立,现代化的“城市收入 $\geq$ 城市支出”尚未成立,只有目前的“城市收入 $\geq$ 农村支出”可以成立。于是,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身份,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他们的两栖生活恐怕是历史注定的。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将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像两栖动物那样的新物种。从四川调查的情况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中青年已经步入中老年。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开始退回农村,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又踏上了前辈走过的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两栖状态依然存在。

如何准确命名这种两栖身份?周朝有所谓“氓”,汉朝有所谓“流庸”,唐朝有所谓“雁户”,这些称谓都不如当代的“农民工”准确,尽管“农民工”听起来不伦不类,自相矛盾。语言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恐怕无法靠语言技巧解决。

根据身份认同的公式,城乡身份的大规模转化其实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只要计算出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变化趋势,再计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总开支的底线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就可以预测农民将在什么时候并以多大规模转化为城镇人口。

在想象这种转化所牵涉的各种因素的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到,城市的棚户区能否合法存在,对转化进程影响极大。棚户区是踏入城市的最低台阶,是一个过渡地带,它的存在可以使农民工节省大笔路费和农村建房费,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可是按照目前的政策,即使农民自发创造出棚户区,例如北京的浙江村或新疆村,也难免遭到政府部门的扫荡。消灭棚户区固然有利于城市居民,维护城市生活质量,但是其代价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我在农村见到许多空荡荡的新房,花两三万元建成,作为结婚实力的证明和未来养老的保险,这些房屋的主人却年复一

年地挤在城市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或者另外付给城里人一笔房租。闲置的房屋吞噬了上千万人多年积攒起来的血汗。这种遍及全国的资源浪费,就是农民为城市利益付出的代价。这笔钱本来可以成为城市建设至少是棚户区改良的动力。

另外一个因素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民这笔名义上无须支付的开支,实际上吞噬了农民工的大半剩余。这意味着农民工真实收入的下降或积累的减少,从另一面削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

还有一个因素,涉及到敏感的工会组织问题。在我的访问对象里,有两位参加过罢工,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罢工的目標都是提高加班工资,减少加班时间。他们的劳动时间平均每天十一二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两天甚至全无休息。这样的生活让人无法尽父母之责,更不敢有在城市养儿育女的奢望。对中国农民工来说,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所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我访问的两个案例中,带头“闹事”的工人都被开除了。早期美国的罢工组织者也是这样的。美国工人的对策是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被开除的工人领袖干脆以此为业,工人运动因而前赴后继。但在当代中国,这是更加遥远的梦想。于是,罢工的组织风险很高,罢工自然减少,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水平方面也缺乏谈判的实力和手段。在身份转化公式里,这意味着农

民工的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就业不稳定,收入难以提高,城市难以成为安身立命之地。

假如上述因素向有利于农民工的方向转化了,我们就有理由预测,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临界点越来越接近。那时候,农民工集团将根据收支水平分为几个梯队,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将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梯次行进。于是,有那么一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工人,是城里人。

那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



川西农民新居

“中国式”思维杂拾

• 李 普

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登了一篇《由厕所里看思维差异》，介绍青年作家余杰的一番议论。余杰到美国，看到美国差不多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他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看到公厕的男厕和女厕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唯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没有人。“于是，我的‘中国式’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厕所没人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队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他的美国朋友连连摇头说：“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是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残疾人的权益？”余杰写道：“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地没有‘文化’。”

余杰不愧是余杰，由思维想到了文化。文化这个东西很怪，我们的先民，在他们创造出文字来以前，也有他们的文化。文化又是群体的事，它同某个个人读书多少和学问深浅并没有直接关系。余杰大有学问，我们可以认为他这样说很谦虚；也可以说他讲的是实话，因为厕所里那件事确实表现出他缺乏那种美国文化。

文化这个题目太大太复杂，我们还是只来谈思维吧。不过“中国式”的思维这个题目也很不小，可以写一本大书。至少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我也做不出来。余杰的议论很有吸引力，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报刊文摘》又常出现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给了我一点资本。凭这点可怜的资本，我能说一点感想，也只能说一点感想。

余杰的见闻是一个例子，现在请让我再举个例。原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后来当了英国

诺丁汉大学校长。他说：在诺丁汉，本来以为，这一校内至高无上的身份意味着很多权力。但实践告诉我，校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可以说“既有权，又无权”。

一则，他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属于校务委员会，而校务委员会的决策，又必须他签字才能实施。在校委会，他有发言权，也要接受反驳。对于校委会的最后决定，哪怕他反对，他也得执行。

二则，他的执行权，也是受制约的。他曾经邀请中国一位德高望重、职位也很高的学术权威偕夫人访问诺丁汉，按“我们的习惯思维”，校长请客人访问，学校报销差旅费总没有问题吧？但是校长们没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在校长们的下属财务总监手里，他说行才行。财务总监同校长们一样，都是校委会选举产生的，他要向校委会负责。

这位校长没有用“中国式思维”这个词，他说的是“我们的习惯思维”，我想意思是一样的。还有一件事，大概也可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确实存在。

中国驻联合国的曾任常驻代表凌青在回忆文章里说，我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原先国民党政府是4%、5%。我们进去以后，“说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定为5.5%，后来又增加到7%，每年要交几千万美元。凌青说，本来，联合国会费按国民收入计算，收入少的可以少交，“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不实事求是。到凌青当常驻代表，我国才按实际情况办，于是会费大幅度下降，降为0.9%。

这也是中国式思维。不实事求是，表现之一是打肿脸充胖子。

中国式思维或者我们的习惯思维还有些什么,它有些什么特征?我回答不了。但是这个问题很有趣、很有价值。我想不妨试试看,努力想一想、找一找。

首先,我想,人家是有“法”,而我们是“无法”。我不知道美国关于公厕是不是立了什么法。英国的大学,比如诺丁汉,想必早就有法规管着。其次,我们不仅“无法”,而且有法不依,也由来久矣。新中国初年,毛泽东就只要政策不要法;后来进步了一点,也只要刑法不要民法。至于有法不依,说“联合国会费我们应当超过国民党政府”的,也是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他还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荣,这句话是他说话第二天就登了报的。这种情形本来不光彩,不料他老人家竟十分得意,大概认为很有面子。爱面子也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之一。这种思维习惯并不以伟大领袖个人为限,不过他表现得很突出。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伟大传统。在大清乾隆皇帝在朝的时候,英国国王派使臣带着礼物来谈判通商,只因为来使不肯对乾隆行跪拜大礼,一切免谈。把人家的礼物叫做贡品;回赠的礼物叫做赏赐,当然要加番加倍,显示大皇帝至高无上和富有四海。

说到“法”,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很有趣。凭人家的习惯思维,人们想到的首先是立法。这里说的“人家”指的是英国。有一个患有“肺结核病”的男子拒绝在医院接受治疗,到处跑,传染了十二个人。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人们的热点话题是:是否应当修改法律,迫使传染病人接受治疗。原来,按照英国的现行法律,如果证实病人患上了传染病,可以强迫病人留住医院,但不能强迫病人接受治疗。

《报刊文摘》还登了一篇文章摘要,标题是《香港人的公德意识 饮食亦须看场合》。摘要开头说:“不久前到香港开会,印象最深的是香港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公德意识。”文中说:“比如饮食吧,规定公共场合严禁饮食,喝饮料吃东西都有固定场所,真是令行禁止。”“第一天开会乘汽车时,看到车窗上贴着‘请勿在车厢内饮食,面斥不雅,请自重’,感觉很新鲜。”作者“印象最深”、“感觉很新鲜”,言下之意十分明白,大陆人的思维里缺少这种公德意识。

香港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何以区别这么大?粗浅的解释可不可说,大陆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社会,或者刚刚离开农业社会,我们还保留着农民的许多思维和习惯意识,基本上还是如老祖宗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农民,还是那一袋子土豆。土豆是不管别人的,他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只顾自己一时的方便。他更想不到,损害了别人,最终可能损害自己。

《报刊文摘》还摘载了这样一件事。南京街上某一天有一对夫妻打架,妻子遭到痛打。围观的很多,没有人出来干预。一位意大利旅游者看到了,马上用生硬的汉语报了警,又向赶来的警察提供了他的证词。西方人不是很重视个人隐私权的吗,是不是由于这件事闹到了街上,就不属于个人隐私了?或者,一个男人痛打一个女人,他就非干涉不可?(我这里用“隐私”而不用“隐私”,是赞成亡友李慎之的意见。他说,“隐私”,特别是“阴私”,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所以他主张用“私隐”,我很赞成。)

我不知道那位意大利旅游者究竟是怎样想的,也许是道德的力量,是那无声的命令叫他这样做的,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也。

说到道德,本来我们中国是很重视道德的。这几十年我们的道德被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尤其登峰造极,扫地以尽。造谣诬蔑成了时尚;揭发至亲好友乃至家属向自己说的私房话,包括一时的牢骚、偶然的气话,揭发这些都是觉悟高的表现,而不是“出卖”。总之,对道德的破坏是几十年中最大的罪恶。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强调“六亲不认”,文革中成了一句正面表述的为人准则:“亲不亲,阶级分。”文革开始前不久,有一位青年到我家来,他说:“刚才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位老人,而且可以肯定是病号。我正准备让座,忽然一想,如果他是地富反坏右,我不是丧失阶级立场了吗,结果我就坐着不动。”这肯定是文革以前或文革初期的事,以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再没有独自一人敢到我家来的了。我这里要说的是,可见思维也很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记得文革前还有一句最高指示:“打倒封资修”,或者“彻底清除封资修的一切影响”。“封”者“封建阶级”也,指我国古代的一切传统文化;“资”者“资产阶级”,指一切西方的文化;

“修”者指苏联东欧的文化。苏联东欧本来是我们的中国的大哥哥、好兄弟，忽然都“修”了，成了修正主义。这样一来，一切文化传统彻底清除了，剩下的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好啊，“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不要一切传统，当然一切从头做起，当然越原始越好，越野蛮越好，越粗鄙越好，越残酷越好，越血淋淋越好，这才叫“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文革中我们常常听得到这句话。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创造或发展，马克思早就教导：无产阶级必须同剥削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彻底决裂。

说到文革，我手头还有一张剪报，可能是从《每日电讯报》剪下来的。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第二天，在卡特总统为他举行的国宴上，同席的一位著名影星告诉邓小平，她几年前访问中国农村，曾经问一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学教授，到乡下干活是什么感觉。这位教授答道：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谈笑风生的邓小平马上正色说道：这位教授在撒谎，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看了剪报中这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同情那位大学教授，他是被迫的，他撒谎是出于无奈。接着一想，不对。如果他说真话，他可能要受到惩罚。但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应当有这个准备，人们应当准备为说真话而付出代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准则。前些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把这一切好东西抛弃光了。所谓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首先是由于对权势的崇拜和迷信。党史专家何方最近提出这个观点，我很赞赏。这种情形的发生，权势者当然要负责，但是我们自己要负更大的责任。为什么我们要崇拜和迷信权势，首先要拷问我们自己！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这几十年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难堪，很可耻。我们既崇拜权势又屈服于权势，把好传统丢

光了，把好传统的好道德规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推到别人头上。当时那位教授有三种选择：一是说实话；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三是撒谎。不料他竟选了第三条路。

不过也许他并没有撒谎，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也许他确实认为大学教授应当下放劳动，确实认为他从贫下中农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更可悲。这位堂堂的教授先生，这位大知识分子，而竟同那些年幼无知的造反派一样，完全接受了命令“造反”的那一套！

现在回到中国式思维上来。它的表现还有哪些？其故安在？能不能给它下个定义，能不能分类？我那个土豆说能不能成立？还有，我国没有自然科学的传统，没有尊重人权、自由民主的传统，何故？我以为法和道德的规范都不可太滥，怎样才适度？以及两者如何分界？如此等等，问题很多，希望哪位专家加以研究。我这是抛砖引玉。

（2005年6月15日，沈容去世半年之日）

（责任编辑 叶 方）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源于种书刊精华 创编家选刊气象

好看、权威、典藏

一本无法替代的权威选刊杂志

人无我有

“文本典藏”——名家评点名著 珍藏大家思想、手迹

“特别推荐”——畅销书快选

“东张西望”——观文坛风云、览作家轶事

人有我快

最优秀中篇小说——我先推荐

最新文坛动态——我先掌握

2006年，
我们将是您
最明智的选择

正文152页 定价7元 全年84元 国内邮发代号 82—106

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 北京文学杂志社

邮编：100031 订阅电话：010—66076061 66031108



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

——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 王也扬

邓野先生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国内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学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识，记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段政治历史。书中有个关键词：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当时博弈于中国政坛的国共两党无不深谙此一逻辑。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蒋介石则死死扭住中共的军队和地盘问题不放，非欲除之才能心安。这使得国共和谈反反复复，极为艰难，形成了一个“怪圈”：和谈的目的是取消武力，但和谈的本身却又是武力的派生物。于是和谈双方便“绕这个圈子不休”。

作为和谈调停者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怎么也搞不明白：国共两党既然在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异议，何以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按照马氏的理念，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他对周恩来说：“我惟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惟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

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然而，马氏的设想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国民党的眼中，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像民盟那样的非武装党派，其反对党的地位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在中国则必须拥有武装。

那么，按照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不是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枪杆子就可以得天下呢？不尽然；还有一条更深刻的政治古训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对此，国共双方的领导人也都是知道的。然而，谁能真正得到人心，则要看各自政治能力的高下了。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国，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并非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同意开政协会议，也支持国方代表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制宪。他在内部会议上解释说，抗战八年，劳者思息，“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心以武力来戡定内乱，战事延长下去，则共产党一定到处造谣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社会的秩序，引起民众对于政府的反感。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存在了。”可是国民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恰为民国政治的逻辑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如蒋介石所说，本党一般同志的普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既然不愿与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须用武力来剪灭异己，国民党内主战派十分猖獗。其实，

“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蒋氏自己大肆加以贩卖的。1944年,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批了共产主义,又批民主主义,反复强调的只有一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的这种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的说辞,引起国内各界的普遍不满和批评。

与国民党比起来,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则要高明得多。其高明之处正在于准确把握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人心,并且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所欲所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在政治上,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文化上,建设为民主政治和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进而中共把“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毛泽东语)作为自己的斗争方针,在国内外舆论界占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中国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但近代以来,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被国人作为一种普世的进步价值观所接受,国民党搞专制独裁是很不得人心的。而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腐败成风,用不受制约的权力胡作非为,更为百姓大众所不齿。中共高张反专制、争民主的大旗,具有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周恩来说:“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黄炎培的提问,以用“民主新路”走出腐败政治“周期率”的高见,如一股清风扑面,给人民带来无限的希望。著名中共党史学家胡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看清楚了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所谓中间势力,除了资产阶级,实际还包括大多数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众,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对社会民意的判断与把握,往往愚蠢错误。1946年二三月间,因对占领东北的苏军逾期末撤、中方接收代表张莘夫不明被害和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烈不满,国内一些城市发生学生抗议游行事件,许多

大学教授、社会名流也卷入其中。国民党对此竟判断为是社会民意对它内外政策的支持,加之四平战役一时得手,于是发动内战的决心大增。殊不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孪生兄弟。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满,并不等于就赞同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武力伐异。事实是,内战爆发后不久,“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就席卷各地,“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响彻全国,国民党最终完全失掉了民心。1947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内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后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不远的事情了。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政治历史中,很值得记述的一节。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又是需要不断温习的课。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欢迎订购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节日,由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监制、中国国际钱币有限公司承制特发行纪念珍品一套。包括:(1)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战争浮雕”铜质金砖一块,长方形50mm×80mm;(2)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卢沟桥醒狮胸章一枚,圆形,直径25mm,均采用铜质24k包金精制而成,并配以精美包装。为提高收藏价值,该套珍品全国限量发行8000套,附有统一编号的收藏证书。

定价:98元(含邮挂费)
汇款请寄本社发行部



芮杏文

问计于民

• 钟朋荣

我是1987年开始认识芮杏文同志的,自那以后,我们经常见面,直到今年他去世以前。

198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接到校方通知(那时我还是中南财大的一位研究生),说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同志要见我。

第二天,我到东湖宾馆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当时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现任贵州省省委书记)主持,湖北省的几位知名经济学教授参加了座谈。

座谈刚开始,芮杏文同志从文件包中取出一份《经济日报》。这张报纸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文章。文章上面画满了红色圈圈点点。芮杏文同志就文章中的重要观点,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听取我的解释,并听取参会专家的意见。会议开了一上午,很像一次论文答辩会。第二天,湖北省所有报纸都在主要位置作了报道。

这次接见,在我的母校很快产生影响。师生们都在议论,作为一位中央领导,还那么认真地看经济方面的论文,并专门与作者交谈,虽然这个作者是一位普通的研究生,真是不容易。

随后,我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组织的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工资、价格改革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林子力任课题组长。芮杏文同志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参与讨论。

此后,我被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在此期间,我很少与芮杏文同志见面。

1989年以后,芮杏文同志离开了书记处(他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工作。自那以后,我



芮杏文

和他见面反而多了起来。每逢年节,我都去看看他。有时,他有些想法,也跟我打电话,让我去和他聊聊。他对其他问题似乎兴趣不大,主要关注经济问题。因此,我和他所聊的基本都是经济问题。十多年来,聊过的话题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亚欧大陆桥沿途经济发展的问题。十四大以后的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他的办公室(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或去他家,他都要拿出那张图,就有关问题与我讨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虽是经济学讨论的老话题,但他所感兴趣的不是谁为主,谁为辅这样的大概念,而是在投资、金融、产业结构等重大经济工作中,如何具体处理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为此,他专门画过一张很细致的示意图,图中对若干重要经济部门如何进行计划与市场的对接进行一一勾画。从图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

亚欧大陆桥的沿途经济问题,也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不是因为他担任了亚欧大陆桥促进会的会长才对此感兴趣,相反,是因为他对亚欧大陆桥特别感兴趣,才牵头成立了亚欧大陆桥促进会(具体名称记得不太准确)。在他

看来,党中央在前十多年,主要是实施沿海开放政策,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带动了我国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国家应该对沿途经济给予高度重视。亚欧大陆桥从江苏连云港往西经中亚地区,直到欧洲。加快沿途经济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与中亚及至欧洲的经济合作,都有重要作用。亚欧大陆桥在中国横穿西北数省,国家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对充分发挥亚欧大陆桥在拉动中国西部经济的作用,对缩小中国中西部地区差距,非常重要。因此,他提出,应当视沿途为沿海,给予沿途地区相当于沿海地区的支持。

在我与芮杏文同志十多年的交往中,给我的印象,他不像是一位高级领导,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他思考问题那么深入、细致,他在探讨问题时那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能与对方展开平等的交流与讨论,这一切对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芮杏文同志既是一位经济专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毕竟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因此许多思维方式,甚至表达方式,都是一般专家教授所不具

备的。他思考问题,不仅要考虑理论上的科学性,也要考虑实践中的可行性。我和他曾多次一起参加研讨会,研究同一个问题,听了专家们的发言,甚至国内很知名的专家的意见,常嫌空洞些,而听了他的发言,却感到一句一句都是很有分量,很有着落。

芮杏文同志经常跟我谈到,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有思想,还要善于表达,特别是向领导汇报,更要简单明了,因为领导都很忙。他曾举过一个例子:他在国家某部委工作期间,有一次邓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听取关于导弹的汇报,他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专家讲。结果,讲得小平同志不想听了。他急了,便自己亲自讲。他说:“第一代导弹很大,打得很近;第三代导弹很小,打得很远、很准。”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第三代导弹好。”于是,他一介绍了第三代导弹的特点。他的这番话对于我后来的写作和演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芮杏文同志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会永远怀念他。(责任编辑 李晨)

(上接第19页)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呢?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1995年夏天,肖蓉同志要我去莫斯科查找她父亲邓小平同志三十年代在苏联学习时的档案。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的所有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吸收张学良将军入党是重大事件,当然要请示了。由此可见,张将军当时希望加入中共,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党,并报告了共产国际,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至于结果如何,那只有等待将来宋黎和叶帅谈话的记录揭密以后才知分晓了。1991年,张汉

公到纽约访友,吕老受中央的委托,带着邓大姐给汉公的亲笔信,去看望汉公。在此期间,吕老同汉公数次促膝长谈,两位老人都没有谈起这件发生在55年前的事。最近,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东北军史和“西安事变”的张友坤教授拿了台湾出版的张学良将军所著、张之宇教授校注的《杂忆随感漫录》一书给我看,其中说到张汉公1992年同张教授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张汉公的上述讲话是我从《杂忆随感漫录》摘抄的)有的海外学者对汉公的话解释为,他向来敬仰周恩来,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英勇的长征向来赞不绝口,说共产党是“爱国的”,他自己也是“爱国的”,所以他“就是共产党”。我以为,一生光明磊落的汉公,在摆脱了蒋氏父子对他的半个世纪的禁锢后,利用“口述历史”的机会,堂堂正正地宣布了“我就是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方 徨)

我的父亲程子华

● 程海燕

那一年,我28岁。父亲程子华安详的躺在灵柩里,像睡熟了一样。握着父亲那双冰冷残废的手,千呼万唤,多么希望能够唤醒他。我不愿相信,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了我们。父亲说过,他对这一生是满意的。但是,我是遗憾的,命运为何让我和父亲这么早分开?泪眼望着礼兵们抬着父亲的灵柩缓缓走出总后礼堂,我的思绪却好像随着父亲最后的人生历程漂移,追忆着父亲的一生。父亲出生在山西省解县一户苏姓人家。由于父亲的姨家没有孩子,把父亲过继给了姨家,从此父亲改姓程,名世杰。父亲七岁开始读私塾,十二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十七岁考入国民师范,在那里,父亲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二十二岁考入黄埔军校,从此开始了他戎马奋斗的一生,改名程子华。

父亲58岁时有了我。那时父亲任职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想必配合李富春伯伯主持国家计委工作的父亲是极其的繁忙。然而,我是幸运的,也许是家里多年来又有了孩子的哭声?也许是父亲结束了几十年南北征战?妈妈说,每次夜里哭闹,父亲总是一起起来,细心的呵护我。在父亲的战友里,我可以说是岁数最小的孩子,因而我得到了很多的疼爱。妈妈告诉我,吕正操伯伯总是一下班就先来看我。1965年,父亲调任西南局书记并且主持三线建设,那时我还不到3岁,父亲经常把我抱在胸前。有一次邓小平、贺龙等伯伯来视察西南三线的建设情况,是父亲抱着我去看望邓伯伯、贺伯伯的。

幼年的记忆大多来自于家人的回忆,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那时我四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们一家也经历了抄家、父母被关、

一夜之间被赶出家门的动荡岁月,我和阿姨相依为命。那时成都武斗非常厉害,在我们先后住过的医院心电图室,图书馆里,房屋的窗上都有弹孔,晚上的天空能清楚的看见一条条红色的弹道。白天阿姨带着年幼的我在外面闲逛,几次路过西南局的大礼堂,那里人山人海,年幼的我总是想去看热闹,每次阿姨都会将我强行带走,因为那里在批斗父亲。我是家里第一个看见狱中父亲的。那时阿姨带着五岁的我去给父亲送衣服,大概看守所的团长看我年幼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带着我去看了父亲。记得当时父亲微笑着看着我,我虽然不能理解但是我很欣慰,这一年多来,我终于见到了亲人。临走时,父亲掏出手绢,用他那残废的双手小心的为我包了一个桃子,几颗糖。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无疑于奢侈品。后来才知道,那也是父亲过节时发的,他每天也只是用来当营养品限量吃。在以后的探视中,印象中父亲总是和蔼可亲,没有沮丧,没有抱怨,没有怨恨,父亲告诉母亲他会再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在关押期间受到的非人待遇。

1973年,父亲被“解放”回家。苍天助我,我终于可以像其他的小孩们一样,有了一个有父亲也有母亲的家。虽然我对父亲为什么被关起来,又为什么被放出来并不理解,我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在身边的父亲。我并不理解父亲那代人的经历,也没有想去知道父亲那代人干出的非凡的事业。因为在我的眼里,我的父亲是一个和其他人家的父亲一样的父亲。在以后的两年里,我慢慢地了解了父亲。我看到的父亲就是在我患伤寒时,用麦乳精筒作道具,给我讲述他们那代人奋斗的片段经历;我看到的父亲就是每天用残废的双手捧着在街头买来的烤红薯给我吃;我看到

的父亲就是每当我感冒发烧时，笑咪咪地说，“来，让我试试”，然后轻轻用他的额头碰我的额头……慢慢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才领悟到，我有一个特别的父亲，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成功并且可以成为大英雄的父亲，每每想起这些，我就会感到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父亲在少年时期也有他的偶像，就是戚继光，一个抗日历史英雄。父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进入黄埔军校，在那里他的大队长就是徐向前元帅，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辈子的知己。父亲所在的部队没有赶上八一南昌起义，而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父亲几经磨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发动了著名而成功的“大冶兵暴”，为此父亲被授予二等红旗奖章，随后父亲与何长工的红五纵队会合。由于在上海疗伤，父亲没有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但是作为红军师长的父亲参加了第二到第四次反围剿。在长征之前，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父亲去鄂豫皖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父亲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和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一起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艰苦的战役中，政委吴焕先牺牲，副军长徐海东受重伤，父亲的双手被子弹打中，昏迷不醒。看着战士们轮流抬着他，父亲几次要求截肢，是钱信忠保住了父亲的手，但是双手终身残废了，像鸡爪子一样。每当父亲提起他的手，他总会很诚恳地告诉我，他在受伤之前脾气很不好，但是看到那么多人为了他出生入死，他看待事物和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脾气也小了很多。父亲总是告诫我们，想想他的亲密战友吴焕先以及牺牲的烈士们，他是很知足的。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是平和和平衡的。长大了以后，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人的一生要做到平和和平衡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常常可以看到、听到人们对于父亲的评价，最常听到的就是父亲功高不居，资深不做，不计名利和任劳任怨。这些高尚的为人品质，说说容易，做起来，尤其是在一生中做到，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但是父亲做到了。我总是在想，每天父亲看到他那双严重残废的手，他会不会想到他自己一生所作的非凡的贡献呢！我从来没有找到过答案，因为父亲几乎没有和我提起过他的那些经历。后来我浏览了很多党史出版物，父亲经历了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但是父亲很少提起过，父亲也很少去注意这些事情。我想这来自于父亲的性格，来自于他务实的本性。父亲一生做到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这也是父亲留给我最大的遗产。

父亲从来不让我们说他参加了长征，在这里我也尊重父亲的意愿。父亲在“小长征”中受伤，那年他才三十岁。当时有十个伤口，因为没有药物，只好用盐水煮了布条往伤口里来回擦。那时父亲躺在担架上，失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时常昏迷。看着抬他和保护他的红军战士，父亲要求截肢，这样可以好得快一些，可是没有得到医生的同意。到达陕北时，父亲已瘦得皮包骨，身上的褥疮让他的脚脱下了整整一个壳，双手也落下终身残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一路上向红二十



程子华夫妇和女儿程海燕

五军指战员讲解了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条例被程坦、刘华清谱上了曲,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父亲就任红十五军团的政委,和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等人一起巩固、加强了陕甘宁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终立足于陕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秋,红十五军团与东北军相遇。激战一天后将敌全歼,同时俘虏了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是东北军的一个优秀团长,与王以哲军长的关系很好,父亲亲自和他谈话,高福源留了下来。不久,周恩来总理派高福源回东北军,通过王以哲介绍给张学良,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后来的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父亲和军团长徐海东代表红十五军团赠予了中央红军急需的经费,并且父亲和徐海东带领红十五军团联合林彪和聂荣臻的红一军团成功地打赢了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奠基。之后,父亲和徐海东带领红十五军团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洛川会议以后,由于父亲受伤严重,需要手术,父亲没有加入八路军。手术后,因为父亲是山西人,和邓小平等被派往山西和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了和薄一波牺盟会齐名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简称动委会),父亲出任人民武装部长兼高级党团书记,牺盟会和动委会为抗日战争武装力量和中共军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的作用。1939年1月,父亲又受命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出任冀中军区政委,加强敌后抗日的力量。在冀中,父亲和黄敬、吕正操等带领冀中军民开展游击战和敌后作战,大力推进了著名的“地道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战争形式。著名的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就是父亲领导下的一支优秀的抗日队伍。在冀中的几年里,父亲领导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兵斗争,他还专门总结斗争经验,写成了《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的文章,中央和总政治部将其发表,广泛推广冀中的工作经验,对当时的抗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成功地粉碎日寇的“五一一大扫荡”就是父亲主持冀中抗日战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3年8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和刘澜涛一起配合聂荣臻工作。在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父亲出任晋察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和军区司令员萧克一起主持晋察冀的工作,以后萧克也去了延安,父亲又代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这两年期间父亲不仅主持了晋察冀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还全面主持了晋察冀的经济工作,兼任第一任工商局长和经委主任,为晋察冀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聂荣臻惊叹道:“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解放以后父亲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原因。1945年抗战胜利前,父亲预见到了冀察热辽边区对于东北和华北全局的重要性,派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等赶赴承德,筹建热河省委和军区,并且命令李运昌率队挺进东北,全面开展冀察热辽的筹建工作。1945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东北局委员、东北野战军副政委。1945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任冀察热辽军区政委,司令员为萧克。从此开创了解放战争初期最大的根据地,父亲主持了冀察热辽的土改运动,此运动以后成为了土改运动的典范。1946年父亲协助乌兰夫解决了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在两年时间里,冀察热辽的部队从3万人发展到30万人,党员发展到10万人。1946年到1947年,父亲领导冀察热辽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1948年父亲亲自指挥贺晋年的十一纵队开展了著名的隆化战役。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知道董存瑞的故事,电影《董存瑞》里董存瑞高举炸药包炸碉堡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父亲1978年调任民政部长后,到地方调查,回来后将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调到了民政部,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英雄董存瑞是父亲树立的。父亲说,他希望为英雄的家里做点事。父亲发现了董存瑞的英雄事迹,并且亲自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表彰他的英雄事迹,董存瑞被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冀察热辽前敌指挥部改称为东野第二兵团,父亲出任第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八、九、十

一纵队和三个独立师进行大兵团作战。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战役,而锦州战役是辽沈战役的关键。就在锦州战役中,父亲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当时蒋介石调来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同时叫来海军、空军司令与自己一起在葫芦岛亲自督战。阻击战打了六天六夜,战斗异常惨烈,但敌军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从而保证了锦州战役的成功。也许是对塔山战役的奖励,平津战役后,父亲率领塔山英雄团所在的东野四纵率先进关,在进入北平时,东野四纵代表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上世纪80年代,当父亲负责黄埔同学会工作时,与昔日的对头、当年塔山阻击战国民党东进兵团首领、国民党著名将领侯镜如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侯镜如大概也去过塔山阵地,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小小的塔山何以能阻挡得住蒋介石陆军空军这么多精锐部队的联合进攻,这大概也是他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战。他问父亲,你是怎么守塔山的?父亲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很少提起这次战役,也很少提起在战争时期的贡献,他把一切都归功于他的战友,他的部队。

和平解放北平,父亲的东野第二兵团和萧劲光东野第一兵团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父亲被任命为北平第一任警备司令,协助市长叶剑英和市委书记彭真维护首都的治安。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身为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的父亲率部南下,这支部队后来成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在他的部队里就有著名的“万岁军”三十八军。父亲率部解放了襄阳、樊城,发起了著名的宜沙战役,打败了宋希濂所部,随后解放了湖南常德地区。父亲的最后一战就是彻底打败白崇禧的著名的衡宝战役。衡宝战役以后,父亲奉命出任山西省政府第一任主席,省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一年以后,父亲又奉命调往北京,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经济工作生涯。看看父亲一生的经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的经历,我总是感到眼花缭乱,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到底有多少呢。历史将父亲那一代人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父亲一辈子满足的根源呢。但是直到父亲的晚年,他还在为国家发展的事情而操劳奔波,他好像并没有满足他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又是那样平凡的一生。父亲对于物质生活本身是没有什么追求的,他一辈子朴实、勤俭。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在家中见过高档的家具,我也很少见到父亲为自己添置什么新的衣裳。印象中只有一次父亲和吕正操相伴逛北京百货大楼,两个人各自为自己买了一件很不适用的的确良背心,成了我们的话柄。除了工作,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台球,他和邓小平、段君毅、张廷发等打了十几年的台球,父亲打台球讲究精益求精,听说他很少输球,所以很少钻桌子。父亲年轻时是很好的足球运动员,他一生都对中国的足球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毕生的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1982年,在父亲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期间,那年中国队和香港队的那场比赛,是决定中国队能否冲出亚洲的关键。赛前,父亲特地把全足球队的队员请到家里来,在客厅里铺开战局商量对策,赛后总是认真总结经验,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们。那时宋任穷是中国排球协会的名誉主席,宋伯伯经常调侃父亲说:怎么我的排球队总赢,你的足球队老输,而父亲总是报以笑容。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愿意给别人和组织增添麻烦,就是他双手残疾,他也是能自己干的就决不麻烦其他人。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常常笑咪咪地对我说,《红灯记》里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要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父亲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他对残疾人基金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车子,就是哥哥结婚也是一家人骑车将嫂子接进家门。我在家里年纪小,父亲对我给予了很多的关怀和照顾,并且有机会总是将我带在身边,我是家中唯一可以经常和父亲开玩笑的人,但是父亲对于这个他快60岁才有的小女儿也是要求很严格的。记得在考高中时,由于我家从组织部招待所搬到了北长街的四合院,我也要由育英学校转到离家近的学校,别人给联系了北京四中,四中要求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入学,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父亲注意到了我的态度,对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虽然经过统一考试,我被四中录取了,但是父亲的那句话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使

我永远记住父亲一生都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全是普通的人,他希望他的子女们自食其力。

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我们都认为父亲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从小我就很幸运地一直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在父亲刚刚被放出来以后,我正好患伤寒,是父亲每天陪着我,给我讲很多的故事,鼓励我战胜疾病。从四川回到北京以后,也是我经常陪着父亲。我那时上学,只要是放假,总会陪同父亲到各地视察,亲身体会了父亲对于中国的了解,父亲不用看地图就知道是哪个县在哪里。走到各个地方,父亲仿佛都有很多的老朋友。我从没有看到父亲对于地方的干部提出过任何要求,总是要求地方按中央规定的四菜一汤规格接待。父亲也和其他的父亲一样,有我这么个女儿在旁边照顾他,扶着他走路,感到很骄傲。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时常问起我的功课,有了疑难的问题,父亲也会亲自上阵帮助我解决问题,无论是数学,还是语文,父亲让我很是吃惊,他的学习功底很过硬,并且很严谨,使我总是在想,要是父亲生在和平年代,他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教授。在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时,父亲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父亲是一个很平等和民主的人,这体现在他愿意听也容忍一切不同的观点,并且他从不强加于人,就是对我这个最小的女儿也是一样。我年轻时愤世嫉俗,有时会与父亲激烈的争吵,但是每一次,父亲总是笑眯眯地听我讲完,再发表他的见解,他不是要说服我,他是想让我从不同角度来问题,给我一个成熟的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父亲总是注意我的身体健康,就怕我瘦了。我出国以后,每一次打电话,他都会问长问短。在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看到哥哥的女儿可以随意指使父亲,而父亲乐在其中。看到我消瘦的样子,父亲每天晚上都会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的生活情况,有时就会不停地说道:“看看瘦的,还不如回国来呢。”那一次回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回国的当天,父亲和母亲正在承德疗养,计划要过几天才回北京,但是父亲等不及了,当天就回到了北京。在我在北京期间,父亲不顾重病在身,执意要陪我去北海看灯会,父亲坐在轮椅上,拉着我的手,我感到幸福无比。每

一次父亲看不到我,他就会让身边的人去找我,直到我回到他的身边,然后笑眯眯地、深沉地看着我。那目光中没有功绩,没有资格,没有骄傲,就是一个父亲看着自己心爱女儿的恩爱的目光,那个目光我至今难忘。我没有想到这个深邃的目光会在我 28 岁时就永远地离开我。再见到父亲,他老人家躺在那里,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抚摸着父亲的脸颊,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父亲累了,他的一生干出了很多人几辈子才能做的事情,他需要休息了,这就是我安慰自己的话。

在父亲去世以后的这些年里,人们总会问我对于有这样一个父亲的感受,也曾经有人问我如果我可以和父亲说一句话我说什么,慢慢地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有个爸爸真好!

(责任编辑 李 晨)

书屋 2005 年第 8 期目录

湖湘人物	“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	傅国涌
书屋品茗	回望协和 ——读《林巧稚》 诗名应共宦名清 ——读《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	耿 法 张国功
其人其事	书生论政是书生 ——真实的陶希圣 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	范 泓 张家康
报人春秋	千秋白水文章 乱世飘萍	王开林 曾以亮
灯下随笔	帝王政治“隔代亲”	孙克诚
说长论短	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	宣炳善
尘影斑驳	《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 艰难的抉择——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	吕明清 于继增
编读往来	二战岂儿戏?焉能“乱弹琴” 正月剃头妨舅舅	戴问天 犀 泽
专栏集萃	动物笔记(八)	张 翔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 址:长沙市韶山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 话:0731-5791300 5563097 传真:0731-5790197		

著名音乐教育家江定仙

• 陈宜平

在即将迎来 21 世纪的前夜——2000 年 12 月 23 日,我国音乐艺术教育界又一位巨匠和他的时代一起殒落了。他就是音乐教育家、著名作曲家、社会活动家、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教授。为隆重纪念这位 20 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第二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江定仙教授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江定仙学术研讨会、作品音乐会,出版了江定仙音乐研究论文选《春雨集》。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齐集一堂,热烈而广泛深入地研讨了江教授的学术成就、教育特色和他的历史功绩;大家一致确认江教授是我国教学时间最长、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二代作曲家;他将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音乐艺术和教育事业。从他最初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歌开始,发展到后来能充分展现宏伟革命内容和气魄的交响诗,体现了 20 世纪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发展的一个侧面。而他长达六十年不间断地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艰辛历程,更贯穿了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从简陋起步到繁荣发达的整个过程,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往无前地踏上了音乐之路

江定仙 1912 年 11 月 10 日出生在武汉市桥口江家墩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上高师附小时除了会唱当时流行的《明月之夜》《葡萄仙子》外,还学会了吹竹笛、铜笛和箫,并参加了高班同学组织的丝竹乐合奏,演奏诸如《梅花三弄》一类的乐曲;后来又学会了五线谱和弹奏风琴。

父亲江家瑞曾参加辛亥革命,由于共同的理想,1920 年与老同学和挚友陈潭秋、董必武等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伐前后,革命形势高涨,武汉成为革命的摇篮。而高师的政治空气又尤为浓厚,学校各种政治运动十分活跃,因此虽在小学就读的江定仙也学会了《工农兵联合起来》《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革命歌曲。因为包括江家瑞在内的大多数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少年时代的江定仙在高师附小、附中、武汉中学学习期间深受家庭和大革命时代的影响,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为陈潭秋当过小交通员,做些递送密信、传单等工作。

江定仙上高师附中不久,因学生反对石瑛(日后的南京市长),学校也因此遭到查封。他只有转到武汉中学就读。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紧接着夏斗寅在武汉叛变,制造了“七·一五”事件。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白色恐怖弥漫江城,许多共产党员遭到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人不得不疏散和隐蔽起来;江先生一家也辗转了好几次并改名换姓来到上海。

江先生是以李仲超的名字进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的。这也是一所进步学校,夏衍、郭沫若等都在此兼职,因此半年后又遭查封。1928 年他又考取了上海美专音乐系。一年半后因他们七位同学反对



江定仙教授

学校解聘一位钢琴老师冷韵琴,而被学校以“闹风潮”罪名全部开除,并通报上海各校一概不得录取这些学生。但也坏事变好事,江先生便借此机会恢复了自己的原名并重新报考当时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上海音专。1930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音专,并师从开创我国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代作曲家黄自先生。除系统学习理论作曲的全部课程外,他还同时获准以钢琴为副科插班在大名鼎鼎的俄籍教授查哈罗夫班上,成为唯一的双科学生,同时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大学学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也是唯一的例外。

江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创作了《挂挂红灯》、《南乡子》(合唱)《何处望神州》《静境》等一大批歌曲和钢琴曲;其中《摇篮曲》还曾荣获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曲创作二等奖。他24岁写的《岁月悠悠》竟在五十七年后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而载入史册。同年还为电影《生死同心》谱写了主题歌《新中华进行曲》;为曹禺的话剧《原野》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塞上风云》等配写了音乐。

为民族而战斗为时代而讴歌

1937年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江先生立即中断了学习,勇敢地踏上了抗日救国的第一线,当月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战歌《打杀汉奸》(胡然词)。这也是我国第一首抗战歌曲。其旋律铿锵有力,节奏坚决果断,一气呵成。其中“大汉奸卖国求荣,小汉奸卖身作狗,蠢汉奸认贼作父,准汉奸妥协求和”的唱段,充分揭露了民族败类的罪行和丑态,而“肃清自己的阵线”,誓除“心腹大患和亡国祸根”则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当上海沦陷,南京失守,30万同胞惨遭杀害时,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江定仙的满腔愤怒与仇恨,他又创作了气势磅礴的混声合唱《为了祖国缘故》(田间作词)。歌曲以不可抑止的冲动,急促地唱出了“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们要战斗!我们的热血沸腾了,准备牺牲!”这是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多年来一直郁结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日本军国主义强烈仇恨的总倾泄,以势不可挡的气势扑向敌人的总冲击!具有动人心弦的震撼力!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说:音乐铿锵有力,格调鲜明,既悲壮豪迈又极富感染力,真正体现了热血青年的赤子情怀和报效祖国的一片忠诚,充分显示了江先生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与全国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大无畏精神。

这之后,江先生辗转于湘、鄂、川等省开展各种救亡活动,发表了《抗战到底》《碧血》《国殇》等一系列激励民族感情、坚定全国人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的战斗篇章,并大力支持、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顽强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以“江家班”学生为核心,成立了“山歌社”,主要探索民族音乐的发展之路。江先生非常支持学生开展民歌运动。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西方音乐先进,中国音乐落后,民族音乐不能登大雅之堂。同学们广泛收集了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各地民歌,记谱整理后配上钢琴伴奏,并组织同学举办民歌演唱会等。这在当时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反应非常强烈,并从此使民歌进入了音乐学院的课堂和重庆的舞台。而且

重庆的声乐教授或歌唱家,凡举办音乐会必有民歌节目,如伍正谦教授的独唱音乐会的“压轴戏”就是江先生编配的《康定情歌》。这首歌不但受到热烈欢迎,也从此让“跑马溜溜的山上”唱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教授回忆说:1947年在南京国际俱乐部我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此后在全国各地以及1949年在巴黎和伦敦的独唱音乐会,节目单上都少不了这首歌;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还让我将此歌录制成唱片。可见当时流行之广,也充分证明了民歌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江先生不但支持学生的探索,还亲自指导、校订和配写伴奏、作“序”,使中国有了第一本配有钢琴伴奏的《中国民歌选》。这对后来的民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奠基作用。

抗战胜利后,江先生随国立音乐学院由重庆青木关迁到南京。在国民党加强镇压民主运动的严峻政治形势下,他仍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当学生遭受迫害时,他总是首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毫不顾忌自身的安危。1947年爆发的“5·20”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学校当局准备实行“逮捕令”;在校务会上,江先生既合情合理地劝解校长、据理力争,又义正词严地向校方提出抗议,在以他为首的进步教师的保护下,使许多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免遭国民党迫害。

解放后,江教授曾多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并广泛接触研究民间音乐,使其作品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质的升华,创作了许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音乐艺术精品;他的代表作有:表现大革命时代气势恢宏的交响诗《烟波江上》(命名为《沧桑》的三乐章交响曲),有钢琴伴奏的《民歌九首》、钢琴变奏曲《十送红军》、合唱曲《在新建设的城市》等,均收集在1992年出版的两部《江定仙作品集》中。他写的艺术歌曲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在抒情性与戏剧性相结合的创作上,被誉为中国作曲家第一位热心追求者,被尊称为学院派作曲家的代表。

他在管弦乐作品中所体现的和声与配器艺术也十分令人赞叹,特别是为表现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而精心创作的电影《早春二月》的音乐,充分反映了他对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突出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上朱

工一、周广仁两位著名钢琴家的弹奏和由韩中杰指挥的中央乐团等一流演奏家的通力合作,使这部电影音乐更加丰满完美,使其鲜活的人物性格极其生动地跃然画面,充分体现了音乐的想像空间和与视觉完美结合的无穷魅力。这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音乐中是不多见的佳作,因此特别受到观众的喜爱,并成为日后专业电影音乐教学的经典范例。但不幸的是此时恰逢“山雨欲来风满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也是严厉批判文艺界的那一年。江先生正好撞在“刀口上”。结果影片还未上映就被康生宣布为“大毒草”,几十篇文章连珠般地围攻长达八个月之久。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又同样遭受迫害。《早春二月》连总谱也在那混乱的年代中丢失殆尽。但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年后,该影片仍然获得了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又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在美国二十多个城市相继举办的中国电影巡回展中,《早春二月》是唯一一部60年代的影片。非常遗憾的是此时江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他与日本作曲家共同创作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音乐,更是影响深远,家喻户晓。

为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江先生被誉为黄自先生的“四大弟子”中年龄最小、也是基础最好的;在其他同学才初学钢琴时,他已在公开演出中担任独奏了。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兼任两江体育师范学校的钢琴教师起,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多个春秋的教学生涯。而从1942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起,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长达40年;包括1961年担任副院长后仍然兼任。1993年又被聘为终身教授直到临终。因此他的学生吴祖强说:江先生的教学活动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毫不夸张的。

江教授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音乐教学岗位上始终忠贞不渝、勤奋耕耘,体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他最大的功绩是担负了我国专业作曲教育从学科建设、充实发展到不断完善的历史使命,并把这里锻造成为我国作曲家的摇篮,已经培养和造就了几代音乐教育和作曲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其中不少是一个地区、

一个部门或音乐院校的领导人,更多的则成为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

江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建树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一位品格高尚、忠厚朴实、无私奉献的一代宗师。在专业技术上他功夫深、底子厚;在艺术表现上他又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学识;但他又是谦逊好学、淡泊名利、以诚相待、视学生如亲人的师长。他在教学上一丝不苟,非常严谨和严格;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和基础理论学习,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学好音乐史论课和钢琴;他要求学生不但能写,还要能弹。他主张因材施教和采用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从音乐的感受中去评价音乐。在教学内容上首先强调少而精,把最主要、最根本和必不可少的东西用最经济的办法学懂、学会。为避免单纯技术观点,他强调感性与理性并重的教学方式,强烈主张在中小型作品中严格训练学生的作曲能力;他是把作曲教育放在对音乐艺术的整体理解中来设计的。江先生始终把课堂作为师生之间探讨学问的园地,彼此融洽平等。他鼓励学生要有自我追求精神,他始终认为,基础根底不深的作曲家,即或名噪一时,其作品终究会被历史遗忘。

江先生领导的作曲系始终坚持了:1 中外音乐的广泛继承,2 严谨的教学体系,3 风格多样化的教学内容,4 三位一体的作曲教育等,因此大大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牢固的、宽厚的根基。所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来人才辈出:从早期出类拔萃的严良堃、杜鸣心、吴祖强等到如今享誉中外的后起之秀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瞿小松、陈其钢……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天下桃李红。

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说:六十年前,作为“江家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跟江先生学习了五年;是在非常艰难的抗战时期完成学业的。江先生最大的特点是治学的精通和开通;除了授课时要求非常严格外,所有的习题都是由我们师生“共同”完成的;因为先生每次都当场为我们弹奏、讲解和批改;这种既灵活又高效的教学方式,使我们很快就心领神会;而且非常扎实地训练了我们的音乐专业能力。

江定仙教授作为进步的著名音乐家,在

全国解放前夕,作为国统区音乐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在北平隆重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也是对他生平最早也是最大的认同。解放后,他作为文联委员参加了一至四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一至四届音协理事、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被邀请担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代表我国音乐界出任波兰世界青年联欢节评委,出席匈牙利巴托克、李斯特纪念会,出席亚洲作曲家大会等众多的国际社会的活动。

江定仙先生对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博大精深的艺术修养,献身事业的崇高品德,淡泊名利的坦荡胸怀,学者风范的精神境界,都极其深刻地影响和造就了几代人。他不仅是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二代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更是一代德艺双馨的崇高典范。比起他的事业来,其人格的大家风范则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震撼力!他不愧是一代宗师,必将流芳百世。

安息吧!江定仙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选择健康——最小的投资,最大的回报

大理由订阅《中老年保健》

- 创刊20载
- 权威专家
- 正确保健
- 倡导理念
- 个人经验
- 关爱父母
- 自订送人
- 备查备用

精益求精
篇篇倾情
长寿经验
科学养生
一吐为快
孝心一片
温馨首选
蔚为文库

全彩印刷

"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刊物
首届卫生部医药期刊优秀期刊奖

邮发代号:
82-221

价格:每月3.2元 全年32.4元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街北口中日友好医院内
邮政编码:100029
订阅热线:010-64284311 84205154
传真:010-64206649

蓝翎的坎坷人生

• 季音

蓝翎走了。他走得那么突然。前一天我遇见他的夫人张岫云女士，问起蓝翎的健康情况，她说他病情平稳，情况尚好。不料次日病情突然恶化，终至不起。可惜啊，中国文坛上又失去了一个才华横溢、正直而富有战斗精神的文学评论家和杂文家。

—

蓝翎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他1931年出生于山东单县杨集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父辈在地里爬，土里滚。这儿是华北大平原地区，平日干旱少雨，遇上灾荒年头，人们甚至剥树皮、挖草根充饥，生活十分困苦。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读完了小学和农村中学。幸亏那个地方解放得早，他17岁那年，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一所训练班式的干部学校在当地招生，他幸运被录取，从此，蓝翎走出了度过童年时期的农村。

后来这所干部学校并入山东大学，他转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当年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就在这时候，好运突然降临到了这个年轻人头上。原来，他和山东大学的同学李希凡两人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几经周折，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本来，这是关于红楼梦研究不同意见的一般讨论。不料，这件事竟传到了当时正热衷于抓意识形态斗争的毛泽东那里。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其他同志，尖锐地把



青年蓝翎

这件事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信中还把这件事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联系起来，“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毛泽东在信中的批评相当严厉。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红楼梦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了一件轰动文坛的大事，报刊上一面继续大批

《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一面围攻与《红楼梦》事件有关的人。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以显著地位刊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为何不及时处理“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的文章，《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公开在报上检讨，承认错误，不久即被撤职。

从此，报刊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红楼梦》讨论后不久，紧接着又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拉得越来越紧了。

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蓝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若干年后，他曾对人说，他原先打算，他们写的这篇文章，只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供人们探讨。想不到经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么一点拨，竟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由此伤害了不少长辈和同志。比如冯雪峰一向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他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文艺报》转载，冯雪峰曾把他请去长谈，并且逐字逐句帮他改正文中的错别字和一些标点符号，以及一些提法不当的地方，热情地对他多加鼓励。想不到冯雪峰不久即为此而受到撤职的沉重打击，以后又被划为右派，这使蓝翎深感不安。

二

《红楼梦》讨论使才23岁的“小人物”蓝翎一举成名。一向爱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经过多方设法，把蓝翎调到了《人民日报》社，分配在文艺部当编辑。蓝翎的命运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有一段时间，部领导要蓝翎负责杂文专栏的编辑工作。搞杂文，在那个年代是既有战斗性又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蓝翎在这方面毫无提防，他真诚地相信党提出的“双百方针”是会真正付诸实施的。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毫无顾虑地积极工作起来，组织文坛上的知名人士写稿。那时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舆论界思想活跃，有些人提出要独立思考，意思是遇事不要盲从，更不要跟着某种号召就“起哄”，要经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形成自己的见解。这无疑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思想。《人民日报》的文艺副

刊上围绕这个中心，不断地发表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杂文，其中有茅盾（笔名玄珠）的《谈独立思考》，巴金（笔名余一）的《“独立思考”》，叶圣陶（笔名秉承）的《老爷说的准没错》，等等。这些杂文大受读者的欢迎，也给蓝翎很大启发。于是他一面继续组织作者撰写杂文，同时自己也动手写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料到，不久，就是由于一篇自己写的没有发表的杂文招来了大祸。

1957年上半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突然变成了朔风怒号的寒冬。整风运动转变为一场无情的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编辑部各部门纷纷起而抓右派，大字报贴满了楼道两侧。但斗争发展不平衡，有的部门的领导人斗争性强，揪出的右派就多。比如记者部领导人，一贯以整人狠而著称，因此挖出的右派最多，属全社之冠；而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为人厚道，对部下从来和颜悦色，不整人，部里只勉强揪出一个右派漫画家沈同衡，他的右派材料还是美术家协会转过来的。沈同衡的主要“罪行”是，他曾经画了一幅讽刺官僚主义者的漫画，画中的人事干部戴着一顶乌纱帽，怪模怪样的。这不是攻击和丑化党的人事制度又是什么？外加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曾经对美术界的领导提过一些意见，于是，他被划为右派。

到1957年下半年，运动相对进入低潮。可是，某些反右积极分子于心不甘，他们在底下说，别的部门右派揪出了七八个，五六个，为何文艺部只有一个？显然部领导人有右倾思想。这些人扬言，“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

事有凑巧，国庆节前，编辑部收到了《北京文艺》杂志社的一封检举信，检举者本人已被打成右派，他在信上说，《人民日报》蓝翎曾经给他们写过一篇杂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他们未采用，退还给了作者，“这篇杂文恐怕有问题”。反右积极分子拿到这封检举信如获至宝，他们既不去向蓝翎核对事实，也不问原稿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上刊登了检举信。紧接着，就在编辑部大楼里贴出了大批大字报，责令“蓝翎必须低头认罪”。

一天上午蓝翎上班，一看这景象不觉傻了眼。不过他并不慌张，一则这篇杂文后来他再没

有拿出去发表，二则文章虽然写得尖锐些，但内容并无错误。几天后，部里领导反右派的负责人才找他谈话，要他把原稿拿出来。蓝翎回答说：“原稿早已撕掉了，但我还有个草稿本，可以交给领导上。”后来蓝翎对人说，我当时不把草稿本拿出来，甚至把它毁掉，他们也没有办法。我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老实，才这样做的，谁能想到会招来这样严重的后果呢。

蓝翎的这篇杂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56年10月10日的《辽宁日报》上刊出了一篇《小兰之死》的报道，揭露了辽宁绢丝厂严重的官僚主



蓝翎在书房里

义，把一个19岁的女工迫害致死的事件。《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作家菡子写了篇《为小兰呼冤》的杂文，由蓝翎编发，在《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也博得了好评。蓝翎觉得菡子的文章意犹未尽，他就又写了一篇，在本报不便发表，刚碰上《北京文艺》来约稿，就给了他们。这篇杂文的意思是，官僚主义不仅是一般的作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它还会酿成流血惨剧的。尽管蓝翎的文章并无错误，可是整人整红了眼的反右英雄们，却把文章掐头去尾，硬是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加上他写的其他几篇杂文，一概如法炮制。不久前曾经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年仅26岁的蓝翎，终于被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本报消息”，肩题为《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伍》，正标题是《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消息宣布《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消息里有关蓝翎的一句是：“右派分子杨建中（按：即蓝翎）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的描绘成到处‘血迹累累’，漆黑一团。”

呜呼，堂堂大报，竟然发出了这样违背事实的报道。

三

我与蓝翎，是在那场“扩大化”灾难里，同在《人民日报》有相同遭遇的难友。他是1957年10月被打成右派的。我是在1958年6月，以类似的莫须有罪名，被推入右派深渊的。据说，那时上头传来了一种新的精神，说是反右派斗争要防止温情主义，就是说斗得还不够狠。《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要克服温情主义的社论。于是，《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又掀起了新高潮，那些早已摩拳擦掌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士气大振，又在国际部、记者部等部门，挖出了一批以副总编辑黄操良为首的右派分子。1958年初报社宣布的右派人数是13人，到1958年底右派人数已上升到29人，约占全社职工人数的5%（按：这些被整同志在1978年已全部改正）。

我与蓝翎被划为右派后，开始都被分配到本社图书馆劳动。蓝翎年轻力壮，又读书甚多，知识渊博，这个工作对他很合适。他经常值夜班，接待来借书的人。一天晚上，电话铃响，是一位社领导人的秘书来电话，说是首长要借一本金圣叹批的《红楼梦》。蓝翎干脆回答：“没有这本书。”

“怎么会没有这本书呢？你还是找一找。”对方有些不耐烦了。



蓝翎(右一)和朋友在扬州

“金圣叹没看见过《红楼梦》，他死的时候《红楼梦》还没出世呢，金圣叹批的是《水浒》。”蓝翎断然回答了对方。

对方语塞，狠狠地挂上了电话。后来蓝翎受到了批评，说是他服务态度粗暴，看来对划为右派还不服气。

1958年初冬的一天，我和蓝翎等几个人一起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被分配在三分场。柏各庄是在一大片盐碱荒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国营农场，主要生产水稻，农活相当重，尤其是农忙季节，日夜加班，更是累乏不堪。分配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都来自中央机关，其中多数又是文艺界人士，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估计多数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因此，不少人在劳动中不免出洋相。作家萧乾在割稻子时因为腰痛，干脆跪在稻田里干活，后来受到批判，说是“丑化了劳动人民形象”。在我们这批人中，唯独蓝翎是例外，他刚刚27岁，正是年轻力壮，又从小在家里干过农活，什么农活都拿得起来，农

场的各种活他都能胜任，在劳动中，他经常走在我们的前面，多次受到表扬。

蓝翎在农场改造中也有“落后”的一面，这就是在思想斗争中，他不是个冲锋陷阵的积极分子。领导右派改造的农场干部宣布，在这里改造的右派不能只看他在劳动中的表现，主要还得看他在思想改造中是不是对罪行真正“心服口服”。右派是集中住在一起的，这主要是为了便于开会，进行思想斗争。在紧张地劳动了一天之后，农场工人们都倒头大睡了，我们却得开会，汇报一天的思想，相互展开揭发与批判。特别是到了月终改

造小结的时候，斗争就更为激烈，有些想早日跳出右派苦海的积极分子，便一桩桩一件件的起来揭发别人的反改造言行，并且无限上纲，把在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套极左做法，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平时批判斗争的对象主要是陈企霞、钟惦棐、萧乾三个人，有时候陈企霞不服，当场和积极分子争吵起来，空气分外紧张。在这种场合，蓝翎多半是不吭声，蹲在屋角落里埋头抽他的闷烟。

领导右派改造工作的农场干部，根据平时每个人的表现，把右派内定为三类。一类是口服心服的，这类只有少数几个积极分子。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的，这一类人大多参加思想斗争不积极，对罪行嘴上认错心里不服，我与蓝翎都被划入这一类。第三类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的，被农场干部视为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陈企霞就是突出的一个。

在农场改造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天天盼，日日望，一心期盼摘帽子的这一天早日到来，好回

归人民队伍。1959年国庆前夕,果然传来了天大的喜讯,为庆祝建国10周年,党中央与国务院决定特赦战犯,同时宣布给一部分已经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农场落实中央的政策,召开大会,宣布给少数右派摘帽子,统称他们为“同志”。全农场共摘帽10人,三分场轮到4人。1960年,农场又宣布第二批右派摘帽子,这次人数稍多些。但两次摘帽,都没有蓝翎和我的份,因为我们对罪行“口服心不服”,我们只能徒呼奈何。

1961年4月,我们先后被召回报社。我与蓝翎都还戴着右派帽子,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我们都被重新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河南商业部门,改了行,我被留在报社。从此一别就是十余年,我一直深深怀念这个耿直而富有正义感的共过患难的朋友,我估计在10年“文革”里,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1976年,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结束了厄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途。1978年,党中央宣布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人民日报社29个右派全部回归人民队伍,

蓝翎当然也不例外。整整二十年苦涩的右派生活至此结束。值得玩味的是,曾经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那篇倒霉的杂文《在血迹面前的沉思》,在改正结论里是这样写的:“他是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小兰之死’等材料写成的,是针对当时辽宁绢纺厂护士兰培初被逼自杀等具体事件而发的议论,并没有把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和整个党等同起来,也没有把此事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严惩杀人者。”看,实事求是来得多么不容易啊!

如今,蓝翎已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想,他撒手西去时的心情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在改正后的十几年里工作得十分出色,担负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出版了多部杂文集和其它著作,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他去世后,报社党委给予了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很高评价。

我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二〇〇五年五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李晨)

按需出版 征稿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引进全新数码印刷设备,为广大作者提供最新式的出版服务——“按需出版”。

按需出版三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 各类论文;● 影视剧本;● 楼书、少量印制的宣传画;
- 个人自传、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
- 单位自用、专业性强、由于量少而用传统印刷无法解决的或市场无法大量销售的图书;
- 已经出版的需要少量重印的图书。

资金投入:自费。收取标准:32开内文每一面黑白页0.125元(70克胶版纸),彩色页2元(128克进口铜版纸);封面彩色每个6元(157克进口铜版纸),黑白每个1.5元。装订费:胶订一本10元,骑马订一本2.5元。版式设计、审稿费500元(一次性)。50本以下加收20%。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能出版。此类图书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也就没有定价,可以作为留世或赠送。费用的文字基数是20万字,每增加1万字加收100元编辑费。

印制质量:上乘,完全可以放心。

要求:需要作者提供齐、清、定的稿样和光盘或软盘一份(包括内文和封面设计,录入排版采用的软件基本没有限制,凡国内现行的均可,封面设计需有书脊和封底)。如是手写稿则另外收取录入排版费,一般每一面4元(32开),校对费每千字每校次1元(负责3个校次)。封面设计如委托我方负责,设计费为800元/个。

作为一种新的出版形式,按需出版主要解决印数在1000册以下的图书出版的困难,超过1000册的还是应该按传统出版运作(我公司也可作为作者联系其他出版社以传统出版方式出版正式出版物,有书号。比如为企业、各级机关政府部门及负责人在新华、华龄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邮编:100088,热线:010-62359410(传真同),联系人:张三杰。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欢迎来电来函联系。本广告一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论司马迁冤狱

• 戚 文

他,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一位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旷代奇才,一位绝代奇文的作者和中国纪传体史学体系的建构者,竟然为一个不同意见,被一位大皇帝凭其封建专制的权威,横蛮无理地押送暗无天日的蚕室,残酷地处以比死刑更耻辱的腐刑。

百代千秋,中华民族的子孙读到这位大文豪纵横跌宕、激昂悲情的文章时,想起他悲惨的遭遇,心中都会有一种隐痛。是的,司马迁的冤狱,是我们民族永恒的痛!

一、汉武帝在战争失败责任问题上的恶劣作风和司马迁的不幸

司马迁的冤狱是由李陵与匈奴浞稽山战役的失败而引发的。应该对这一丧师辱国的战役负领导责任的是谁呢?是汉武帝。李陵提出的那种孤军深入,率五千步兵“涉单于王庭”的作战计划是根本错误的。可是他竟轻率地加以赞许。他被不久前抗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得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忘记了。他不知道,不久前的军事胜利是将近百年来全国人民长期备战的结果,是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将领认真组织、规划的结果,是数以几十万计的士兵勇敢作战的结果。他作为战争战略方面的最高决策者,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有在战争客观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规定,他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挥,对战争非但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而要起破坏作用。当他昏昏然地,以为以往的军事胜利是他天才头脑的产物时,他的头脑也就走向了反面。所以,李陵那种无知的狂妄建议,正好

适应他那种狂妄的心态,两者一拍即合。他一听这个建议,马上就被鼓动起来。长期在西域作战的将军路博德看出了李陵作战计划的致命弱点,千里上书提出不同意见。他非但不听,反而给李陵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这个命令甚至把千里之外大军的行军路线都预先规定好了,他以为只要他向天空划一道弧线,敌人就灰飞烟灭了。

他期待着胜利的捷报,却等来了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他主观主义的热昏计划全部破产。他该引咎自责了吧!不,他是天之骄子,一贯正确,他怎么能引咎自责呢!统统是李陵的罪过,把他的老母、妻子抓了起来。

根据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自叙,公卿王侯,几天前在李陵送来行军报告时,还在宴会上向皇帝奉觞上寿,歌颂皇帝指派李陵深入漠北的壮举。现在又在揣摩皇帝推卸战争失败责任的心理,一齐攻击李陵。他对大臣们随风转蓬的作风很不满意。正好皇帝征询他的意见,他就说李陵原来表现不错,这次深入戎马之地,“足历王庭”,打了败仗,但“所杀过当”,现在身虽陷敌,也许别有意图。司马迁的这些话,同汉武帝企图重责李陵、推卸战争失败责任的意图完全相反。

汉武帝勃然大怒了,以“为李陵游说”的罪名,将司马迁逮捕入狱。那些为虎作伥、专会揣摩皇帝意图的刀笔吏给司马迁拟就了最高罪名:“诬上”,即攻击皇帝。判处的刑罚是最惨无人道、最侮辱人格的腐刑(即宫刑)。这一年司马迁才四十六岁。

二、司马迁为什么要替李陵辩护?

司马迁究竟同李陵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



司马迁画像

无端地出头为李陵辩护,承担这样大的风险呢?

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他们只是青年时代的同事,但“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司马迁《报任安书》)。他为李陵辩护的动机,就是前面他自己说过的两条:(一)不满于大臣们的随风转蓬,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二)他觉得李陵过去的表现尚好,作战有功,可能事情尚有曲折,想说一些公道话,以利于问题的正确处理。这在不了解李陵兵败陷敌具体经过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性格正直的没有处世经验、又不会耍滑头的书呆子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自叙是完全可信的。

在汉王朝已得到李陵兵败陷敌的消息以后,司马迁还出来为李陵辩护,这样做难道不是非常错误的吗?难道不是包庇在反匈奴侵略斗争中的叛降者吗?

不。我们认为,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不能认为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是什么非常错误,更谈不上包庇问题。

这是因为在古代的战争中,不易区别战败被

俘和投降附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在历史记载上常常把这两种不同情况的不同行为混同一律。但在处理上,无论是战争的哪一方,在弄清情况时,都是有区别的。李陵身陷匈奴之初,就是汉武帝也弄不清他究竟是无可奈何的被俘,还是真心实意的变节投降,而只是怪他没死。试问司马迁又怎样弄得清具体情况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尚不了解李陵陷敌的具体情况时候,根据李陵以往的表现,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报任安书》),这并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既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更谈不上包庇。

在判明李陵确实投降敌人之后,司马迁对李陵的态度如何呢?司马迁对他进行了很严厉的谴责。司马迁在《史记·李广列传》的结尾,附了李陵的简单事迹,说:“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又说:“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司马迁一贯主张砥砺气节,他对李陵“生降”敌人,“隳其家声”的谴责,在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上是极其严厉的谴责。

有人说,既然司马迁谴责李陵的投降,为什么在《报任安书》里,又为李陵说好话呢?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确讲了李陵有“国士之风”,“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他当时为什么为李陵辩护,说的是他当时对李陵的看法,没有这些看法,他怎么会惹怒汉武帝,受那么大的迫害呢?因而不能视为又替李陵说好话。在《史记·李广列传》中,他对李陵就没有那么写。那里,他只是在叙述李陵兵败的过程中写了一句“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接着就是对他投降匈奴的谴责。而且,就连这句话也是对于历史过程如实的叙述(他订正了以前的“连战十余日”的说法),并不能理解为为他说好话。一个人过去好,后来变坏了,他在历史上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承认他过去做过的好事。对于抗击匈奴侵略事

业中的背叛者李陵,司马迁一方面在总的论述中给予严正的谴责,一方面又在有关章节中记叙了他未背叛前的抗敌战斗,一是一,二是二,这种客观求实的论史态度是司马迁一贯的作风,是他忠实于历史科学优秀品格的表现。从汉王朝的正统观点看,项羽是刘邦的敌人,韩信、英布等是大逆不道的人,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或者根据他们的实际错误,或者根据当时的传统观点,对他们进行了历史谴责,但也如实地记叙了他们的历史活动,并对他们的历史功绩给予了评价。如果没有这些如实的记载,大概我们今天很难知道反秦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历史真貌。

三、在李陵之祸中,司马迁有没有自己的责任

难道李陵之祸中,司马迁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吗?难道全是汉武帝的过错?对的。全是汉武帝的过错,司马迁没有责任。

首先,事情的起因,即决定李陵孤军深入漠北,给军队造成覆灭性灾难的是汉武帝,与司马迁无干。正是由于他的狂妄无知,轻率地决定用没有战骑,没有后勤,没有配合的孤军去袭击单于王庭,才造成了战争的悲惨结果。要是一个大臣犯了这样的错误,不杀头也得逮捕法办,可是皇帝犯了错误,连个检讨都没有。非但没有检讨,还要借名士的血去堵塞别人的嘴。文过饰非到了这般地步,真是恶劣之极了。我们承认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抗击匈奴侵略,发展国家经济、文化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从他对李陵案件和司马迁问题的处置上即可以看出,他不仅具有一般统治阶级野蛮、虚伪和极端利己的本质,而且在精神世界的某些方面,还具有与他性格相适应的极渺小的东西。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专横跋扈,暴虐贪鄙,一发火就要残酷整人,没有起码的民主。他在性格上却与秦始皇一脉相承。他们是封建主义历史发展中必然产生的同一类型的专制主义者。秦始皇反儒,他尊儒,方向虽异,实质则一,都是为了加强自己□己的专制统治,而不准有反对声音,这叫殊途而同归。

在李陵投降事实确定以后,谁都可以看出司

马迁为李陵辩护以及为此惨遭迫害是不值得的。这一点司马迁也认识到了,他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但是因此就可以要司马迁对这场悲剧负什么责任,从而为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减轻罪责吗?不可以。原因是我们不应把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到在此以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时候,事情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事情做一点好的估计,希望在处理上留一点余地,没有什么不对。而且,那还是皇帝自己征求人家意见,人家才讲的。你要人家讲意见,人家如实地讲了。言者无罪。为什么要翻脸整人呢?一切都要顺着你的意图讲,不对就要惩办,那还征求什么意见!

辩护错了,就不该负责吗?不,在汉武帝整治司马迁的时候,还没有证据证明司马迁的辩护是错了。即使当时有证据证明司马迁的辩护是错了,也不能整人。为什么一个人有了罪就不能为他辩护一下呢?

还有,错误的辩护永远不应该与辩护的错误等同。既然有辩护,就会有正确的辩护和错误的辩护,这是辩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只准正确的辩护存在,不准错误的辩护存在,就等于不准辩护。错误的辩护只是一种意见错误,它可以受到质询、批判、谴责、驳斥,但辩护不能构成罪状,不应受到惩处。而且,即便是错误的辩护,也要比没有辩护优越千百倍。因为没有辩护,则不能纠正错误,而错误的辩护,亦能反证正确。为什么要害怕它呢?

大概后来,汉武帝自己也意识到在李陵问题上对司马迁的处置是太残酷了,太不得人心了,于是又提拔司马迁为中书令。有的史学工作者说,这个任命表明了汉武帝的胸怀宽广,爱惜人才;还有人在新编历史故事中,描写汉武帝如何大力鼓励和支持司马迁写《史记》;甚至在有人攻击《史记》时,还出来为司马迁主持正义,并检讨了自己对司马迁处置的错误,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粉饰之词,统统不符合历史事实。汉武帝只是在晚年时,对自己用兵过多,群众负担过重,以及处理太子案件和迷信方士等问题上的错误,作过一个检讨。这就是史书上有名的“轮台罪己诏”。这个检讨尽管是被当时群众造反的形势逼

出来的,但是毕竟表明汉武帝尽管不及他的乃祖刘邦,可是比起后来的那些昏庸皇帝高明多了。只是这个检讨并没有涉及司马迁的问题,这是不能随意编造的。

四、司马迁冤狱的深层原因和司马迁悲剧的历史回响

司马迁的冤狱是汉武帝的错误处置造成的,但这只是浅层的原因。

造成司马迁冤狱的深层原因是像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专制制度。

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人民受尽了苦难,社会要求稳定。秦以及代秦而起的汉王朝,适应了这种要求,以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

但封建专制制度,很快就在历史上显现了它那种与历史进步并存发展的反动性和局限性。

中国幅员辽阔的封建王朝,是建立在汪洋大海似的、分散而落后的地主(或领主)家长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方式是以简陋农具为生产力的的小生产经济。这种汪洋大海似的、分散而落后的小生产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他们也要牺牲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密如蛛网的封建专制特权政治。

村级是家长、族长、亭长(小地主或小领主)——乡级是三老(大地主或大领主)——县级长官是地方和中央政府任命的县令——州级、郡级长官是皇帝任命的州牧、郡守。

封建专制特权政治是一座多级宝塔,宝塔的顶尖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在这个制度下,所有人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奴仆,皇帝一个人主宰着千万人的生死荣辱。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孔老夫子创建的儒家学派,为了建构为封建专制特权政治服务的伦理道德体系,便大力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儒家学派提倡的这个伦理体系强化了封建专

制的政治体制,极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推行和巩固,所以汉武帝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可怜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人,那时就像站在葡京大酒店赌台上的赌徒一样,一切都要靠那捉摸不定的转盘。如果转上个好皇帝,中彩了,那歌舞升平,一切都好。如果转上个“功大于过”,基本上还好的皇帝,也可以混混。虽然有时不免困难、坎坷,亏了肚子,掉了眼泪,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除了不幸死去的人,其他人总还能逢凶化吉。最糟糕的是转上个坏皇帝,那就输惨了。那时,活都活不下去了,只好像陈胜、吴广那样,扯旗造反,最后是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即使打倒了坏皇帝,小生产的经济土壤,一时也孵不出民主色彩斑斓的金凤凰。尽管如此,新出的皇帝,总能汲取前朝被打倒的经验,讲究治国之道,把小老百姓的生活弄的好一点。

其实,好皇帝和坏皇帝都好办,或者欢呼,或者打倒,就是了。对人民来说,最难办的还是汉武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帝这类“功大于过”的皇帝。扯旗造反,绝不应该。他办了那么多好事,特别是抗匈战争的胜利,一雪高祖白登被围之耻,了不起呀!他也关心民瘼,鼓励发展经济。但他的错误也忒多了,征赋过度,冤狱甚多,刚愎自用,不肯改过。所幸他还有点自知之明,晚年知道老百姓反对自己,下了个“罪己诏”,缓和了与人民的对立。否则,只能像后世的乾隆皇帝那样,等自己死了,让下一个皇帝替他清理旧账,封建专制制度,就这个样,有啥办法。

所以司马迁这类冤狱,其形成的深层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是的,从根源上说,都是封建专制制度惹的祸。要从根本上杜绝或大大减少司马迁这类的冤狱,就要铲除封建专制制度。但封建专制制度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要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就要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方式,还要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文化、新思想,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

司马迁冤狱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启导了中国历史上一切有良知的人去思索这一切。

这就是司马迁的悲剧,几千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强烈回响的原因。正像鲁迅所说,实际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被撕毁,常常要比文学作品

中的悲剧作用更强烈。真实的历史悲剧,也是如此。司马迁的血,没有吓倒为思想解放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勇士,反而变成烛照黑暗天空的历史烛光。虽然它的光亮是那样的微弱。

司马迁的历史悲剧就这样成了历史觉醒的清新剂。

我们听听明清之际思想解放先驱战士黄宗羲惊天动地的呼喊吧!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了一个君主,“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此书写于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

这是早于公元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之前约256年的呼喊。在封建时代最黑暗的王国——监狱里,“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惨遭“最下腐刑”,“函于粪土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受尽“縲绁之辱”的伟大史学家,不仅以他著名的历史著作遗留后世,也曾以他无辜的血浇灌了被封建专制禁锢的民主初苗。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今古傳奇 2005年全新改版
【单月号】

新悬念文本 网络互动
引领中国传奇文学潮流

三大举措确保悬念品质

- 最顶尖的作家: 固定10位悬念小说高手, 签约为本刊倾力打造传奇精品
- 最惊爆的稿酬: 开出千字500元最高稿酬, 重金将天下传奇佳作一网打尽, 让读者大饱眼福
- 最超强的阵容: 设立传奇作坊, 一流策划, 一流作家, 一流加工, 一条龙打造一流作品

邮发代号: 38-83, 每期定价9元, 全年54元。逢单月1日出版
垂询电话: 027-86782453 (读者服务部)
86797217 (编辑部)
可在各地邮局订阅, 也可直接汇款邮购
地址: 武汉市武昌东湖路417号 (430077) 《今古传奇》读者服务部

欢迎订阅 **南华时刊**

邮发代号: 38-396
全国统一刊号: CN46-(Q)003
每月1日出版 国内外公开发刊

2005年9月号要目

- 一掷千金中的“酸甜苦辣”
- 150枪射杀平民! 公安局长制造假案血染都市
- 从“野照相”到汽车大亨: “汽车狂人”的三级跳
- “官司索贿”, 资深法官实施“暴富计划”爆出惊天丑闻
- “腊齿相依”, 双重楼特途释百万富姐的成功秘诀
- 侠义警察与“强奸杀人疑犯”妻子的情感传奇
- 白手兴家的侨商祝清坤
- 瞒盘于姑娘: 外交部长为我做红娘
- “血债”的背后: 不堪重负的爱妻你在哪里?
- 恩怨孽情, 县委书记续杀二奶内幕

本刊除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报刊点零售发行外, 全国各埠邮局均可随时订阅; 读者也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汇款订阅。
本刊每期4.8元, 全年订费57.6元。

联系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15号国信大厦10楼
邮编: 570125 联系人: 冯小梅
电话: 0898-66101935 66101936 66101997
传真: 0898-66101998

诚征各地广告
发行公司携手合作

严复仕途乖蹇之谜

• 李 钧

林纾在祭严复文中曾说,严复当年在英国求学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等同窗数载,归国后,伊藤博文所学成大用,而严复则至死不过是一个“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的空衔闲职。这常使后人为其抱“怀才不遇”之不平。但追究严复生平,他并非没有机会“一试其长”。之所以仕途坎坷多艰,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打开严复仕途乖蹇之谜,不仅对研究晚清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价值,对确立现代知识分子价值本位也具有参考价值。

一、郭嵩焘的“知遇之恩”

严复 1854 年 1 月 8 日(清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初十)生于福建侯官阳岐。严氏是中国传统的“官宦之家”。但从其曾祖开始弃儒从医,其父严振先则以仁义精术有声州里间。严复早慧,幼得故乡高士、五叔祖严燧昌和福建宿儒黄昌彝调教,颇得中国文化根基。然而不幸的是 1866 年福州流行霍乱,其父严振先是年六月被霍乱夺去了生命,此时严复只有十二岁,孤儿寡母苦苦支撑。

1866 年春天“中兴将军”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他上书清政府创办福州船政局以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并保荐林则徐之婿沈葆楨为总理船政大臣。在得到清政府批复后,这年冬天,沈葆楨即奉旨在福建创建船政并在当地招收英少。因为学员是官费,并且可得些银钱补助家用,因此严复决定前去应试,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沈葆楨赏识,遂于 1867 年春入马江船政学堂习海军。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李鸿章从 1871 年始实施“派遣留美幼童”计划。沈葆楨受此事启发,于 1872 年提议清政府向英国派遣海军留学

生。清政府同意并拨专款后,1876 年底,严复等 12 名学生赴英国深造。他们于 1877 年 5 月 11 日抵达伦敦后,严复与方伯谦、萨镇冰、林永升、叶祖焜、何心川等 6 人先期考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严复在伦敦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郭嵩焘。1878 年 2 月 2 日是中国农历春节,严复六人至中国使馆给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拜年。据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严宗光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等,可见严复一开始就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六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的交往。后来郭嵩焘与严复“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勿休”,郭嵩焘甚至时邀严复“小酌”或“晚酌”,可以说郭氏对严复的才学大为激赏,二人遂成忘年之交。1878 年夏天,严复完成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最终考试,郭嵩焘此时已兼任中国驻法公使,便携严复等同赴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二人回国后也时常书信往还。

郭氏因受保守派攻击,驻英仅一年半即被迫奏请辞职。清政府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任驻英法公使。但直至 1879 年 1 月 25 日离开英国,郭嵩焘一直恪尽职责忠于其事,包括认真做好留学生安置事宜。他在广泛征询校方意见的基础上,给所有海军留学生写出评语和推荐意见。他认为刘步蟾、萨镇冰等均成绩优秀,已能胜管带(舰长)之任;而严复学识特优,“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遂照会英国新任外相沙里斯百里,请他安排刘步蟾等五人在一年学习期满后上舰实习,而严复则继续留校研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得到英方同意后,郭又照会英国外交部和海军大臣感谢他们对严复的关照。不仅



严 复

如此,郭嵩焘甚至“致函枢近某公: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语。”其中不乏希望清政府破格任用严复的意思,当然也暗含对曾纪泽等人的影射。没想到此举给严复后来的仕途留下了隐患。

郭嵩焘这种开放型的官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甚至被保守派视为“异端”,因此就难为传统“主流”派所容。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称:“他(郭嵩焘)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写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可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直到1893年郭嵩焘卒,也没有再被起用。

郭嵩焘因其思想超前而“谤满天下”,他举荐的人也一样受到排挤。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丹崖)对郭氏给予严复的高度评定和举荐皆“不

采”;曾纪泽则因为严复议论他“天分低,媮懦事,于使事无裨益”,而对严复极为不满。1879年8月9日,已返湘乡的郭嵩焘得读曾纪泽出使日记,日记中讥讽郭嵩焘之处“凡数端”,其中就有“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郭嵩焘不得不承认,曾氏所言“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郭嵩焘8月28日的日记也记道:“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矣。”其实郭嵩焘也早就发现了严复的这一性格缺点,曾在日记中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后来严复的命运似乎被郭嵩焘一语成谶。

二、与李鸿章交恶及科考梦想

1879年8月,因福州船政局急需教习,严复取消预定的一年实习提前回国。同时回国者还有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严复回国后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正是这年冬天,对严复极为赏识的沈葆楨谢世,这对急于建功立业的严复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位仕途上的“领路人”。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落成,由吴仲翔任总办。严复的朋友陈宝琛将严复引荐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再由张推举给李鸿章。李鸿章“伟其能”,破格聘任28岁的严复为“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也算是“重用”吧。严复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服务北洋水师的经历。

应当说,严复得遇“实力派”李鸿章,有了一个新“靠山”,可能会有更快的发展。但严复的性格又一次妨碍了他的大好前途:“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而先生勿屑也。”因此,李鸿章也就不把他当作嫡系。此其一。其次,曾纪泽到英国后就对严复表示出了一种恶感,其出使日记在国内广为传读,极有可能将此感受传达给了李鸿章。以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曾纪泽的话不可能对李鸿章没有影响。第三,1885年4月,李鸿章与法兰西公使会谈于天津,处理中法战争善后事宜,却被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欺瞒,“皇遽定约。慧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以严复

的狂傲性格,当他看破现象的时候,很可能会口无遮拦地说出来。因此,他是一个“明察秋毫”的智者,却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官场上的幸运儿。因为在中国政界有一个不证的规则,即“为尊者讳”,这种“误会”在官场上是致命硬伤,恐怕时间也难以愈合。中国人又讲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一个下属不能过于聪明。想一想曹操杀杨修,也许我们还可能会觉得李鸿章“开明”呢!

中国历代官吏升迁与任免中,格外重视“师生”之谊。严复既然不愿做李鸿章的“门生”,那么也就怪不得他老人家“不预机要”;何况李鸿章毕竟是个传统官僚。

严复也意识到与李鸿章的关系不会再深入发展,因此他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与其做李鸿章的“门生”,不如直接做“天子门生”。严复从此开始了科举之途。1885、1888、1889(恩科)、1893年四次参加乡试,但均名落孙山。1898年光绪帝为变法又开“特科”招集人才,严复又一次应试。吴汝纶劝他说:“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愿执事回翔审慎,自重其才,弗轻一出也。”但是严复急于用世,不听。果然,随着变法失败,特科作废,严复参加特科考试也成了笑柄。严复通过科考功名进仕途的梦想与实践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逃出“武学生”(武夫)的身份,没有被时人看作是由“士”而致“仕”的“文明人”,因此也就不被重用。直到1909年,詹天佑与袁世凯共谋,赐十九位留洋学生以“进士”出身,55岁的严复列名其中,但此时的严复心灰意懒,对“功名”已没有多大的兴致。

三、“舆论动天听”:另一条终南捷径

李鸿章这个“靠山”靠不住了,科考梦想破灭了,严复此时找到了另一条“终南捷径”:通过办报纸与发表文章“上达天听”。19世纪90年代,变法风声潮起,尤其是甲午之战使思想先驱者认识到,仅仅是器物的变革是无法救中国的,因此维新人士主张政治变革以救中国之“陆沉”。“西学”出身的严复也投入到办报之风中。

1895年严复一口气在《直报》发表了《论世

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写下《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等文,开始发愤译介《天演论》并作《拟上皇帝万言书》。此举果然引起了光绪的注意,严复1898年应诏陈言,但应光绪约誊抄上呈的“万言书”却“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变法失败后,不仅没有得到“圣主”的重用,反而险些因之陷于牢狱之灾。

不仅如此,他“舆论动天听”之举却无意中切断了仕途上的最后一条退路。严复“非孔”“非君”、反对愚民政治、反八股文以及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等激烈的“异端”思想,颇令士大夫侧目。尤其是1895年3月13、14日在《直报》发表的《辟韩》一文,对韩愈《原道》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及其愚民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番“非君论”和人民本位论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南辕北辙,因此“鄂督张公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孝感屠君守仁作《〈辟韩〉驳议》”进行反击,后来在朋友郑孝胥的调解下才作罢。严复一年前还盘算着投奔“香帅”,认为张香帅“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现在不仅李鸿章“不之近”,把个“香帅”也得罪啦!

严复的“舆论动天听”计划里,除了在报章上发表“策论”外,还有一张王牌就是译介西学名著,这一招可以说是舆论界其他人士无法做到的。1897年译好了《天演论》,严复请“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作序。请吴先生作序,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桐城派”最后掌门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位“吴挚甫京卿”近在皇帝身边,若得他推荐给皇上,那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严复的译笔果然引起了吴先生的好感,序言中极力褒奖,使《天演论》一时洛阳纸贵。

吴汝纶劝严复不要进入官场,而把心思多用于中西之学:“时局日益坏烂,官于朝者,以趋跽应付,善候伺,能进取,软媚适时为贤。持清议者,则肆口妄诋谏,或刺取外国新闻,不参彼己,审强弱,居下讪上以钓声誉,窃形势,视天下之亡,仅若一瓶盆之成若毁,泊然无与其心。其贤者或读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绝域之言语文字,无从能晓;或习边事,采异俗,能言外国奇怪利

害,而于吾土载籍旧闻,先圣之大经大法,下逮九流之书,百家之异说,瞋目而未尝一视,塞耳而了不一闻。是二者,盖近今能弊,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因此鼓励他,“执事之自待,不得不厚,一时之交疏用寡,不足芥蒂于怀,而屈、贾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伤心之事,举不得援以自证。尚望俯纳刍蕘,珍重自爱,以副见慕之徒之所仰期。”1898年,当严复要参加特科考试的时候,吴汝纶也曾劝告严复不要参加,但是严复不听。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吴汝纶对严复性格才情的把握要比严复对自己的了解更深一些。如果说郭嵩焘对严复有“知遇之恩”,那么真了解严复的却是吴汝纶。

四、私德不“严”:终成遗恨

严复仕途不顺,固然与其遇人不淑及清末的政治腐败有关,但是也与其性格缺陷及私德不“严”有极大关联。

首先,严复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早在1880年,他“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纆我如老桡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这就是他恃才不羁的一个典型例证。至于以后的激烈言论更是不胜枚举,如他1916年说:“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眈筐之傀儡,以云爱国,邈乎远矣。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所可忧者,吾国政界,往往应于俗谚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吾国武人……大抵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所谓新式军人,新于制服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不凋敝。”一俟“革命”成功,虽然“党

徒之中,驴夫走卒,目不识丁,但前有摇旗呐喊之功,则皆有一啖分尝之获。”……

其次,“吸鸦片”给严复一生中留下最坏的名声,更影响了他的仕途。严复1890致四弟观澜信中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但是严复并没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他1919年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此真沉痛之言。事实上,他在安庆学堂受到攻击以及教育部驱其辞北大校长时,“吸鸦片”都是其中的一条理由。

无法克服自身的欲望,这本身就与中国传统的禁欲主义传统道德相背,很难为“道统”所容,何况严复除吸鸦片外还有嗜赌、占卜、吃花酒等恶习。在清末官场,私德不严的大有人在,而严复本来不为当权者所容,他的私德就成了别人压制和打击他的把柄。

五、“智者”而非“圣人”

严复仕途乖蹇,还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新思想的极不宽容。

一种文化当它充满生机和自信的时候,它是开放的、自由的、兼容并包的。而一旦它出现了超稳定结构,那么它就开始进入僵化和衰退期。有研究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代以后就失去了创新能力。虽然这种说法有些绝对,但是至少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过程是相对较慢的。在这种情形下,面对外来冲击就显得相当被动。严复之不见容于这个社会,实际上就是“新学”不见容于“旧学”的一个见证。晚清“旧学”家们盲目自大排外的故事并不少见。比如仍认为“天圆地方”、“天朝型模”、中国处于世界中心等,都是传统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心态的典型显现。这种心

态一直持续到甲午海战以后。连李鸿章也感叹当时的社会“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变,遂不可支。”正是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主张整体性的破坏性的社会革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主张“打倒孔家店”以推翻旧文化根基。因此,严复作为“新人”不能仕途通达也是必然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际遇,第一代留学生容闳、第二代詹天佑等也大都如此。直到“民国”以后,留学生才在社会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严复急于用世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一种表现。“官本位”即权力本位。严复那一代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深处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官情结”,认为只有做官、进入“廊庙”才算是实现了个人价值。因此从引进新思想、输入新学理方面说他们是中国现代第一代知识分子,但是就其“官本位”思想以及私生活方面讲则仍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正因如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这一代“新学家”称为“失败者”,并分析其“总根源”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十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论。其高秀者,则亦以‘致用’为信条,谓必出所学举而措之,乃为无负。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谓为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不敢轻许也。”梁任公的这段论述可谓一语中的,不仅是对那一代人的概括,对当今乃至今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

这也就更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本位”的问题。笔者认为,“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知识分子本位”。在那一代学人中,王国维主张重视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学术研究要努力做到“非意识形态”化,把学术从政治、道德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他反对学人鼠目寸光的急功近利思想和政府“以官

奖学”的做法,而呼吁学界树立“学术本位”的思想:“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这种思想对中国固有的“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为政治上之手段”的“学以致用”、用政治取消学术独立地位的思想是一有力反驳,其现实针对性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了时代进步要求。王国维先生一生研究均在于拯救家国、解放人性,反对“曲学干禄”,在启蒙与救亡中指向深远“功利”的根基,实为学术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其实严复也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98年7月28日、29日《国闻报》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指出“夫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也;使毕士马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今新立学堂皇,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



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得,天下之事去矣。”“今日学校官制之大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一念耳。以坐言起行合为一事,而责以人人能之。”实际上这也是对“学”与“官”的区分,奈何严复学人没有持守这一基本点。因此有研究者称他的急于用世和私德不严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的败笔”。

再次,严复的仕途乖蹇及其后来的“落伍”,也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立场有关。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为中国输入了最早的自由主义原理,他自身也形成了一定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实验主义态度,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学说并不轻易相信。这使他不仅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建设”、“对话”、“改良”;他晚年不仅反对俄国十月革命,也对中国国内军阀混战表现出莫大反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的唯科学主义的现代化感到失望,走到“道德救国”的途径上来。应当说,就国际和中国自由主义历史来看,自由主义是一种和平建设方略,在乱世均显得衰微无力,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均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就说明了这一点。丁

文江曾不无感慨地对胡适说,自由知识分子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而不能成为治乱世的“奸雄”。但一旦进入和平年代,自由主义就会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的复兴就是一个说明。实际上我们不妨反过来推说,当一个社会没有自由主义的时候,往往是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经济进步的时代。因此,严复之“败”,时代之败也。

严复仕途的乖蹇是对一个时代进步与否的检验,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本位提出了“学统”的标高。严复仕途不畅,中国历史上只是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僚,而多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思想者。后人不该为他也为这个国家而庆幸?不该为“知识分子本位”而额手称庆吗?!——晚清以来的达官不亦多如牛毛,然而谁还记得他们,谁又忘记过严复,尤其是他1894年之后那一篇篇救国救亡的战斗檄文,一本本震撼人心的典雅译著,何啻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天演论》、《原富》、《自由论》、《穆勒名学》、《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为本刊明年调价致读者

《炎黄春秋》自1991年7月创刊,至今已度过了15个春秋。十五年来,我们在编辑工作上,团结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包括很多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和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刊物提供很多高水平的文章,使读者能开卷受益;在经济上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节俭办刊,尽力减少读者的经济负担,确定较低的定价。

近些年来随着出版成本的增加,杂志社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困难,不少熟悉本刊情况的热心读者来信,有的亲来杂志社,建议提价。他们的心和编者是相通的。社委会经多次研究,都决定通过内部节约挖潜,弥补亏损,不提价。从1998年至今已7年了,每期每册定价一直是

4.8元。

但节约的潜力是有底限的,去年以来,亏损有所增加。于是提价成了不能回避的选择,社委会经反复研究、比较,决定自2006年1月起,每期每册提价一元,这个价位仍低于相同页码、相同印制质量刊物的定价。相信这个涨幅是读者可以接受的。很多读者曾表示,他们关心的是能在刊物上读到更多的好文章,而不是每期涨了1元钱。在杂志社方面,提价增加了收入,加以进一步的节约措施,就可以维持刊物正常出版。希望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支持。

《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

读者来信摘登

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是日本关东军

《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刊发的陈敏先生撰写的《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一文,在谈及张作霖死因时这样写道:

美国如是,苏联更无道义而言。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那么如何化解来自东方即来自日本的压力呢?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

在这里,陈敏先生将希特勒执掌德国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法西斯统治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五年!众所周知,希特勒于1933年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并兼任总理。而且,希特勒欲称霸世界,本身也有一个国内扩军备战推行纳粹化,以及吞并周遭弱小国家的过程。在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等人推行的绥靖政策的纵容下,直到他出兵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之后,一个入侵苏联的计划方得以酝酿成功,此时已经到了1939年了。对于希特勒侵略扩张的阴谋,苏联政府于1935年始有察觉。这一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制定的首要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那么,陈敏先生又何以认为张作霖被炸死的1928年6月,苏联就感觉到了“德、日两国夹击”的巨大威胁了?此为其一。

其次,且不论西方学者和前苏联学者论著的认定,连当年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皇姑屯爆炸案和柳条沟事件的日本军方决策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的供词中,均众口一词承认炸死张作霖为日本军方所为!

让我们先行回顾一下历史。

1927年夏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成军

政府,控制了山东、河北、平津和东北整个地区。从历史上看,张作霖的上台曾经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也希望借此机会利用张作霖的势力进一步霸占东北。但是张作霖的民族之心尚没有泯灭,对于日本人日趋过分的要求,他不是予以拒绝便是借故拖延。日本关东军决定除掉张作霖,进而控制东北,就是张作霖作出将其军政府从北京撤回奉天(沈阳)的决定的时候,日本决定在沈阳车站西北处的皇姑屯附近桥洞炸毁张作霖乘坐的专列。1928年6月4日晨,关东军的阴谋得逞——在皇姑屯一举炸死了张作霖。这就是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皇姑屯事件”。

由日本关东军制造的“柳条沟事件”,则是发生在三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即震惊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用武力占领我东三省的不宣而战。

自1946年6月起,由美、中、英、法、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起诉。法庭首先进行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部分,而这部分首先面对的就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美国检察官达尔西第一个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长春溥仪傀儡政府,揭示了日本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过程。

谁炸死了张作霖?

1927年由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来华,曾任战时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的田中隆吉中将当庭作证道:

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爆炸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第二天就死了。

田中隆吉还进一步指证道:

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共十几人。当时,河本大佐命令紧急集合关东军,以便和张作

霖护卫部队交战。我对河本大佐十分了解,河本大佐说过,当时他们所用的炸药,是日本工兵用的方形炸弹,一共 200 个。

田中隆吉还指证了策划皇姑屯爆炸案、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的“九·一八”事变、绑架溥仪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一系列事件的元凶主谋:原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原关东军参谋(后于 1938 年任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

法庭上,皇姑屯爆炸案的直接指挥者板垣征四郎作了如下的供词:“皇姑屯事件”,即成为后来柳条沟“九·一八”事件导火索的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东北军处于 1 对 20 的劣势,所以必须采取自卫行动。

板垣征四郎还供认,早在皇姑屯事件前,关东军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确保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并报告日本国内大本营得到了批准。

正是基于上述一系列确凿证据及战犯自己的口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 1948 年 11 月 4 日判定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两名甲级战犯在对华侵略战争中策划并参与包括皇姑屯爆炸案在内的中国满洲一系列事变、阴谋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及扩大侵华战争犯有严重罪行,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及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松井石根等五人同处死刑。

总之,日军炸死了张作霖,地点是在皇姑屯,而陈敏其文所云的柳条沟,则是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地,两者地点不一,时间也相隔了三年零三个月。

秋 石

关于《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的一处疑点

《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2 期《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作者杨军戈)一文第 21 页写道:“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里指的是 1967 年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据我所知,毛主席 8 次接见红卫兵都是在 1966 年,所以该文中这个时间有疑点,希望作者能解释一下。

读者 黄丹曙

作者回复

这段引文我摘自《傅崇碧回忆录》第 194—195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我也怀疑这个时间有误,但我是摘引原文,因此无权对此事作出“更正”,我以为《炎黄春秋》也无权“更正”。希望研究“文革”史的专家能澄清史实。

作者 杨军戈

对《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一文的补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 7 期刊登的《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中写道:刘伯承“指导他的老部下秦基伟将军统帅部队十几天便打到距印度首都几百公里的地方,还俘虏了印军的一名少将。”(28 页右栏)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现根据有关资料,对此予以补正。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于 1962 年。为了实施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西藏军区组成“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则由新疆边防部队组成“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尔后,为了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又设立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等人组成。这次自卫反击战从 1962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至 11 月 21 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主要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这次作战,总计歼灭入侵印军 8900 余人,俘、毙印军准将旅长各一名。

又 新

本刊更正

2005 年第 1 期《邹韬奋为民主理想拼搏终身》一文中,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的时间应是 1936 年 6 月 7 日,刘少奇的那两封信也是 1936 年写的。

2005 年第 6 期 69 页右栏 4 行“宋钦宗赵恒”应为“宋钦宗赵桓”。

2005 年第 7 期 12 页右栏 13 行“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应为“汪志华(科学院计划局长)”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

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

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

“中国式”思维杂拾

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

严复仕途乖蹇之谜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